

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

邱秀华 章毛平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 阳 •

© 邱秀华 章毛平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 / 邱秀华, 章毛平著. — 沈阳 :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6.9

ISBN 7-81102-326-1

I. 张… II. ①邱 ②章… III. 张学良 (1901~2001) — 教育思想—研究 IV. G40-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877 号

出 版 者 : 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3 号巷 11 号

邮编 : 110004

电话 : 024—83687331 (市场部) 83680267 (社务室)

传真 : 024—83680180 (市场部) 83680265 (社务室)

E-mail : neuph @ neupress.com

http : // www. neupress. com

印 刷 者 : 沈阳市政二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 : 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 : 140mm × 203mm

印 张 : 7

字 数 : 156 千字

印 数 : 1~1000 册

出版时间 :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 刘 莹 刘振军

责任校对 : 张淑萍

封面设计 : 唐敏智

责任出版 : 杨华宁

定 价 : 20.00 元

汲取历史智慧 创获当代灵感

——研究张学良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纪念西安事变七十周年和张学良逝世五周年之际，由东北大学张学良研究中心邱秀华等撰写的《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付梓，我为他们庆幸、向他们祝贺。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将军，是一位“武人”，作为接受过现代教育和颇具文化素养的将军，他可能有一些关于教育的认识和想法，但因此可以说他具有教育思想吗？而且具有研究价值吗？即使具备，那也是已逝的过去，是“过去存在时”，而不是“现在进行时”，对此进行研究，具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等等。这些也许是人们初步接触到这本著作时，会自然产生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有根据、负责地给予肯定的回答。

张学良将军的确具有教育思想，而且是系统的、具有理论体系和理论构造的；其内涵既具有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又具有现代思想背景；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品

性，其理论付诸实践的成效，都颇为可观，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引人注目的“教育—文化景观”。而且还须指出，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果实，对于我们现在，仍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认识价值和指导意义。

张学良参与创办并曾亲任校长，后又任名誉校长的东北大学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体现着张学良的教育思想。关于这方面的事实，我们从张学良的生平资料中，从东北大学校史中，都可以看到，无须赘述。

但这些事实也许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印象、一种认识，归其总，是“张学良的办学思想”。不过，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是一个证明、一个象征、一个实体，具体地表现了张学良的教育思想。我们将在历史的论述中，展开这方面的记叙和论证。

但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事实，包括有关的文件、指示、讲话、谈话和实际的行动、作为，体现并证明了张学良教育思想的整体状貌。本书在这方面尽力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上，加以展示与证实，并予以诠释和论证。我们在研究大量有关材料的基础上，感到张学良教育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 他的教育思想烙印着鲜明而突出的时代特色。他认识很明确：教育“以适合现代潮流”为标准。从适合时代到兴办教育，他形成了这样的思想逻辑和发展路径：国际竞争→振兴民族→兴办教育→培养人才→达到发展目的。这说明张学良教育思想既反映了时代潮流，

又适应着时代需要。他走在当时时代思想潮流的前列。

② 张学良教育思想高扬爱国主义旗帜，震响着民族复兴的音符。他的教育思想形成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正是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时代，人民既痛处水深火热之中，又落后愚昧，但却奋起反抗侵略。民心愤激昂扬，民族救亡思想激荡。救亡图存的呼声响遍中华大地。张学良教育思想作为这种民族时代精神的反映与回应，强调教育救国，爱国主义成为兴教的母体和主题。“重教→兴国”是教育的重要与首要目的。他向学生提出：“求学事小，国家事大”，明确地把“国事”放在“求学”之上。这是张学良教育思想的鲜明人民性。

③ 张学良教育思想具有可贵的全面性和全民性。这是他的教育思想人民性的必然表现和自然延伸。他不仅大力办好东北大学，而且注意并私人投资兴办小学和中学，使从初级教育至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的全民教育系列与体系遍布城乡。同时，他还注重平民教育、社会教育；当然，作为军事领导人，他还十分重视军事教育。

④ 张学良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兼容并蓄”的特点。他既接受和重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又接受过和重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现代教育的可取经验；也同样注意吸取欧洲、美国的西方式现代教育的经验。建设东北大学的实践具体体现了他的这种兼容并蓄的教育思想。

⑤ 张学良教育思想坚持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他确立的德、智、体、美、群的教育内涵中，将“德”放在第一位。他指出：“培养人才以德为基”，他教育学生“自己看守自己的人格”。他追求全面发展的人才，注意人才素质教育。

⑥ 张学良教育思想坚持学以致用原则。这个“用”的最要紧处，就是为了国家，就是以兴国为己任。“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这是他对学生的教诲。

从以上简略记叙中可以看到，张学良教育思想是比较丰富的，作为一种历史的认知、思想的资源，不仅具有研究的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兴办教育，进行教育改革，仍然具有参考意义。归纳以上所述，其六个方面的内涵与特色，对于我们仍然具有启发意义。诸如教育兴国、全民教育、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注重德育、强调爱国主义、注意人格养成，以至注重师资、资金大投入，等等，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教育的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和启迪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教育思想不是一种孤立自生的现象，而是时代的反映，是历史的回应，也是一种集体思维的集中。张学良身处东北这块面对强敌侵略、国家濒临危亡的次殖民地，又身负领导全责，抗敌、强国的强烈愿望和坚定决心，迫使他思谋振兴之道；振兴、强大，首要的是各种人才，由此而注目倾心于教育。而

东北有识之士也奔走呼号，兴办教育。他们的共识是：欲救东北，必振实业，必振教育。他们的言论、他们的献策，以至他们的“耳提面命”，都深刻地影响了张学良，成为他的教育思想的文化—思想资源。这说明，研究张学良教育思想，同时就是（也必须）研究当时的时代特点、文化环境、历史人物、教育状况，是通过“个体”研究社会—环境—历史。而研究这些“外部环境”“社会状况”，也就加深了张学良教育思想的研究。这可以说是研究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延伸意义和“附加值”。

以上是我读了《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书稿的一些感想，算是为读者提供一个“阅读路引”，仅供参考。

彭定安

2006年8月10日

让张学良研究更加 专题化、系统化、特色化

——读《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有感

邱秀华和我都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她晚我两年，是我的师妹。我们毕业后分别在两所学校里任教，由于专业相近，经常一起参加学术会议或者社会活动。每次见面，她都是那样精神饱满。已经进入中年的她，活跃、青春、上进的精神风采一如既往。她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令我敬佩，她曾获得辽宁省优秀教师称号，科研又不断推出新成果。这部《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是她近年来研究张学良的最新成果。

关于张学良研究，在近二十年来，虽然有诸多的成果面世，但多是以传记为主的一般性研究，还未能真正开展专题性、系统性、特色性研究，这部《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的出版，是专题性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张学良的教育思想研究，在张学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张学良既是一位反对内战、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爱国主义军人，也是一位关心和重视教育的教育家。在他

的诸多方面论述中，关于教育的论述占有较大的比重，涉及到教育与人才、教育与国家复兴、教育与社会进步等诸多方面。邱秀华等著的这部《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由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形成、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张学良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张学良教育思想的时代意义等几部分构成，颇有新意。

张学良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外部受列强侵略、内部纷争不断的时代。所以，张学良的教育思想是在期待国家和平、统一、强盛的心态下，在抵制外敌入侵的危机感中形成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张学良教育思想内容集中体现在他为东北大学确定的“德智体美群”的办学宗旨中。德育思想在张学良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所提出的德育教育中，特别强调做人和爱国两点，“修养人格，将国家看大些”“有人格方能期诸久远”的德育观，在当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在智育教育方面，张学良特别强调“安心向学”和“精学各门专业”，并能学以致用，“学的是工，就要作工，学的是农，就要作农”。张学良认为，体育代表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提倡和重视体育的目的，不仅具有造就民族复兴的现实意义，还具有强国保种的战略意义。张学良为东北大学确定的“德智体美群”的办学宗旨，实际上已包含了我们现在强调的素质教育，以及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丰富内容。他经常以饱满的爱国热情

和高度的责任感激励学生，为国家、为民族而努力学习，争取做一个德才兼备、情操高尚的现代青年。

《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在深入研究张学良教育思想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张学良教育思想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即教育的适应性、时代性、战略性；深入探讨了张学良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即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教育价值论、以“振兴国家”为导向的教育核心论和以“任用贤能”为中心的教育主体论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强调了张学良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发展的启示。这样，就使张学良的教育思想研究具有了更强的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

邱秀华在完成《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初稿后，发给了我一份，嘱我写个序言。序言不敢当，从学术角度评判这部专著，更不敢发言，只能作为读后有感而发吧！

胡玉海

2006年8月15日

前 言

张学良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提到他，自然会想到在我们国家蒙受内忧外患时，张将军大义凛然，以气壮山河之势，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得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了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但很少人知道张学良将军在教育事业上的建树和重教兴国的远见卓识。其实，张学良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热心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他视教育为中国之希望、东北之希望，视人才为中国之未来、东北之未来。在他看来，“教育为神圣事业”“教育是建国之本”。

张学良特别重视教育。他先后提出了“教育系乎国本”“培养实用人才，促成国家现代化”“修养人格，将国家看大些”等重要主张。主政东北后，他始终坚持把“教育兴国”与“实业救国”作为重要方针政策，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兴办高等教育、创办中小学基础教育、重视军事教育、支持社会教育等，从而使

东北地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至九一八事变前，在张学良直接创办或间接支持下，东北地区已初具现代教育规模，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令人遗憾的是，张学良一系列先进的教育理念，在 1936 年被幽禁后，便无法得以亲自实施。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学术界对张学良的研究逐渐展开，目前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就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与他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史实的研究上，而对张学良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学界关于张学良教育思想的著述只散见于一些学术期刊，主要有：盛雪芬、车树实的《张学良教育主张初探》（《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 年第 2 期），毕万万的《张学良教育思想论纲》（《社会科学战线》1995 年第 6 期），王岚、王元琪的《张学良的现代教育观》（《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王爱光的《张学良教育思想探索》（《辽宁教育研究》2001 年第 9 期），魏向前、丁晓春的《对张学良教育思想的探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肖建杰的《张学良教育思想论析》（《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等。这些文章对张学良的教育思想做了初步的归纳总结，从不同侧面对张学良教育思想进行了简要勾画，对系统开展张学良教育思想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应当说，目前关于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全面、系统的研究还很不够，特别是关于张学良教育

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实践特点、张学良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张学良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启示等方面，亟待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书正试图在这些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作 者

2006 年 9 月

目 录

第 1 章 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1
1.1 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1
1.1.1 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启示	1
1.1.2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对东北地方教育的关注	3
1.2 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5
1.2.1 力行“实干兴教”	5
1.2.2 倡导“学以致用”	9
1.3 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思想来源	11
1.3.1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1
1.3.2 外来西方文化的熏陶	11
1.3.3 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引领	12
第 2 章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德育与智育	25
2.1 “修养人格，将国家看大些”的德育观	25
2.1.1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	26
2.1.2 张学良教育思想中的人格教育	38
2.2 “教育系乎国本，培养实用人才”的智育观	45
2.2.1 强调智育教育的根本目的	45
2.2.2 提高智育质量的各项举措	48
2.2.3 建立较为完整的教育系统	61

第3章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体育、美育与群育 68

- 3.1 “健身强国，抵御外侮”的体育观..... 68
 - 3.1.1 重视和发展体育的目的与作用..... 69
 - 3.1.2 举办或承办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 74
 - 3.1.3 加强体育“软”“硬”环境建设 79
 - 3.1.4 重视体育道德精神的培养..... 81
- 3.2 “潜移默化，以陶冶于无形”的美育观..... 83
 - 3.2.1 美育的基本特点..... 83
 - 3.2.2 美育的基本任务..... 84
 - 3.2.3 美育的基本要求..... 85
- 3.3 “缩小自己的占有领域，以扩大群众利益”
的群育观..... 87
 - 3.3.1 群育的基本内涵..... 87
 - 3.3.2 群育产生的基础..... 89
 - 3.3.3 群育的主要内容..... 90

第4章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 97

- 4.1 突出“教育救国”的爱国主义主题..... 97
 - 4.1.1 “教育救国”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色..... 97
 - 4.1.2 “重教兴国”是张学良教育思想的主线..... 99
- 4.2 贯彻“五育并重”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100
 - 4.2.1 “五育并重”是张学良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 ... 100
 - 4.2.2 “五育并重”是对兴学育人规律的正确反映 ... 102
- 4.3 提倡“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 103
 - 4.3.1 培养实用人才是张学良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 ... 103
 - 4.3.2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的基本原则 104
- 4.4 坚持“兼收并蓄”开放式的办学理念 105

4.4.1	提倡学术自由	105
4.4.2	主张男女平等	106
4.4.3	重视社会教育	107
第5章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	109
5.1	教育价值论——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	109
5.1.1	教育价值论的理论探讨	109
5.1.2	张学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教育价值论	112
5.2	教育核心论——以“振兴国家”为导向	121
5.2.1	教育核心论的理论探讨	121
5.2.2	张学良以振兴国家为导向的教育核心论	123
5.3	教育主体论——以“任用贤能”为中心	141
5.3.1	教育主体论的理论思考	141
5.3.2	张学良以任用贤能为中心的教育主体论	142
第6章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当代思考	148
6.1	张学良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	148
6.1.1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的现代化	148
6.1.2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的公平化	153
6.1.3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的“人性化”	160
6.2	张学良教育思想与当代社会	169
6.2.1	张学良教育思想对创办一流大学的启示	169
6.2.2	张学良教育思想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的启示	172
6.2.3	张学良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家的启示	176
附 录		179
A	张学良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论述（摘编）	179

B	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聘任的部分主任教授 以上的著名学者	188
C	《汉卿捐助奉省中小学教育基金董事会章程》	193
D	张学良创办的三所著名中学	195
E	张学良亲自担任校长的两所大学	197
参考文献		199
后 记		203

第 1 章 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当今，世界各国执政者及世人，大都已经认识到教育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内在关联。但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此有正确认识者，却为数不多，张学良可谓少许慧眼卓识者之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人民既痛处水深火热之中，又落后愚昧，但却奋起反抗侵略。张学良作为当时的时代精英，不仅实践着精武抗敌的思想，而且大力倡导教育救国，并把爱国主义作为兴教的母体和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教育思想正是一种民族时代精神的反映与回应，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来源和实践基础。

1.1 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1.1.1 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启示

张学良教育思想根植于中国土壤，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土壤。

张学良出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日益加深，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他降生的时候，正是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

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那一年。俄国军队在参加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天津的同时，又单独出兵 17 万人，占领东三省。

东三省在历史上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角逐的主要场所。沙俄最早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窃得了在我国东北的许多权益，把东北视作其势力范围。它曾强行在我国东北修筑了“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所到之处，掠夺了我国东北大量的财富。

日本对中国东北早有侵略野心，1904 年 2 月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败了沙俄，从此，沙俄在我国东北南部地区的许多特权被日本取而代之。诸如，日本占据了“中东铁路”的长春至大连段，改称“南满铁路”；日本还取得了旅顺、大连租借地的权益，等等。日本以旅大、南满铁路沿线为据点，不断扩大其侵略势力。这场战争不仅是对我国领土、主权的践踏，而且也使东北人民遭到了空前规模的浩劫。1917 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多次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取得的特权，日本趁机将其魔爪伸入东北北部，还制造“满蒙特殊”的舆论，说我国的东北是它的特殊“势力范围”，伺机侵占整个东北地区，成立“满蒙帝国”。

从 1894 年的甲午战争，到 1904 年的日俄战争，相隔 10 年，而张学良恰恰就出生在这两次战争的中间年代。从这一深刻的历史背景看，他后来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和“爱国狂”，就不是偶然的了。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对于中国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面对日本要霸占我国东北的严峻形势，东北地区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官绅，

如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等，多次向掌握东北大权的张作霖提出“办大学、培养人才，以抵御侵略”的建议。所提建议的关键词语有：“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西洋各国之所以号称文明，主要在于学术发达”。对此，张作霖接受了创办东北大学的建议。由此可见，当时面对外来侵略，特别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现实，办大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富强东北，培养人才，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历史背景，既是当年张作霖等人主持、创办东北大学的主要目的，也是后来张学良“重教兴国”思想形成的深刻历史背景。

1.1.2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对东北地方教育的关注

1916年4月16日，张作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北历史进入了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在奉系军阀统治的12年间，东北地区的教育较以往有了明显的发展。其实，张作霖是靠枪杆子起的家、靠武力得的“天下”，在他未掌握奉天统治权之前，对于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是很不够的。但取得地方政权以后，出于统治的需要，他才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把教育摆在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只靠一些草莽英雄是不能成其大业的，还必须网罗文人谋臣，培植自己的舆论人才，这样才能纵横天下。他重用了文人王永江、杨宇霆、袁金铠等。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注重文治，与张作霖的长远称霸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对地方教育有所重视。当民国教育部决定全国分为八大学区、各区均应建立一所大学时，在谢荫昌、王永江等人的极

力倡导下，张作霖欣然同意成立东北大学。实际上，张作霖就是东北大学创建时期的主持人。因为东北大学成立时，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张作霖是奉系军阀首领，北洋军阀的北京政权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是东北的最高掌权者。创办东北大学的一切事宜均由张作霖主持批准。正如中国香港凤凰卫视台的评论员所说，这是“军人办大学”。

东北大学的承办人是王永江。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王永江曾任奉天省财政厅厅长、代省长职务，是一个既掌握财权，又掌握政权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有时能左右张作霖。他一贯主张“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对于奉天教育，王永江投入精力最多的要算东北大学的创建。1922年8月成立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时，他是主任委员，具体负责筹办各项事宜；1922年12月25日，经过筹备委员会公推，张作霖任命他兼任东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此外，当时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中，痛感必须改变国贫民愚、受人欺侮的现状。他们幻想通过振兴教育，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而把振兴教育的希望又寄托在军阀身上，这当然是行不通的。但目睹了惨痛的现实和在各方面的压力面前，奉系军阀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要作用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张作霖也承认：“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意教育与实业会能成功的呢？”因此，他积极赞成创办东北大学，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由于军政当局和各界人士对教育的重要作用有深切的认识，所以重视教育的行动也超过了以前的封建时代。奉天省长公署和教育厅三令五申，各地用于教育

的经费要占财政总支出的40%以上。尽管实际上多数未达到这个标准,但奉天教育经费当时在全国也是解决最好的省份,官方每年用于每名学生的平均教育经费大约是:农村小学三四元、城市小学五六元、高小十来元、中学五十元、师范一百元。东北大学经费在全国58所大学中,居第四位。

张学良从青少年时期就随父从政,耳濡目染其父对培养人才、发展教育方面的重视。基于上述历史环境,张学良等人认识到,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没有人才,便没有社会的进步,而人才又必须靠教育来培养。东北易帜后,在1928年召开的辽宁省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上,吴家象代表司令长官张学良在讲话中说:“现在世界上的竞争,是非常剧烈的,因为人类是永远竞争的,自然不能停息;愈竞争,愈进化,文明现象便愈显著。然而无论武力竞争和文化经济等竞争,其中都有一个竞争的主动要素。主动要素是什么?我们若详细考察,一定要承认是‘人才’。所以,又可以说世界上因人才而有竞争,无人才不能竞争,不竞争一定不能进化了。”“我们既然知道人才和社会进化关系极重,当然要希望人才辈出。人才又由何而出呢?这个问题,不必思索,我想任何人一定要说是‘教育’。”“教育确是造就人才的泉源。”

1.2 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1.2.1 力行“实干兴教”

张学良提倡“重教兴国”是以爱国主义思想为主旋

律的。他在实施这一策略中，反复强调“培养人才要以德为本”，尤其是进行正规人格教育，他深知“人无德，不能成器也。”“非才无以报国，非学无以成才。”“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才实学，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责任。”实施“重教兴国”，他清清楚楚地阐明“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之方法的出发点”，强调“重教的目的在于兴国”。由此可见，张学良提倡“重教兴国”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思想，这既是他办学主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其教育思想的一条主线。

张学良在 1928 年对东北大学学生讲话时会指出：“现在我们中国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中国，诸位同胞都得努力奋救他的危险。”^{[1]120}他希望“同学要专心研究，以图于来日造就中国人才，人民中坚，求学事小，国家事大，才不辜负国家兴学的本质。”他从教育救国思想出发，给青年学子们指明了求学方向，要以民族的向上精神，努力成为救国人才，以达到兴国之目的。在治学育人中，张学良强调“现在是为国家而求学的……不要因金钱的引诱，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又反复强调“只有学问短时间可以维持，有人格才能久远，如果有学问而无人格，终究会被淘汰”。他指出，“总之，最重要（者）约有两条：（一）自己看守自己的人格。（二）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自己看守自己的人格，就是方才说的，不要失去自己的人格，被外界引诱，昧了良心，作极恶的事，遗害于同胞。要拿批评人的话，来规戒自己。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就是说自己不要自看的太重，而有害于国家。”^{[1]122}进而他用反例谆谆告诫学子们：“看见一般学生，对于国家观念非常地热烈，比太阳的热度还要高，

至于他们进了社会，良心的温度就慢慢地降低下来。从前他在校讥讽人的话，现在他自己实行了。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将来处身社会，要本着自己的人格，拿从前在校里的热心，来处置社会。拿从前批评旁人的话，来整理社会。人人如此，则社会国家就没有不富强的道理。”这些浅显而又富于哲理、含义深远、触动心灵、感人肺腑之言，不仅令人心悦诚服，同时也向世人昭示了他教育思想的主线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重于己任。

从自身做起，主张实干兴教，也是张学良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学良虽然以“练兵”为主，却又大力“兴学”。1925年6月，他（与郭松龄一道）创办了奉天同泽中学；1927年10月，创办了同泽女子中学；1928年8月，开始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并先后向东北大学捐款现洋180万元；另捐500万元设立“汉卿教育基金”，以每年年息72万元补助辽宁省中小学教育；1929年初，开始在辽宁各县创办新民小学（计划创办73所，每所每年由张学良发给经常费2100元）。他还兴办了各种军事教育机关，等等。他指出：“国家衰弱到今日地步，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语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要努力复兴民族，整顿国家，必须由小处一点一点做起，必要用许多时间与力量。人人应抱正但求耕耘，不问收获之决心，去努力苦干，实干，而后可以有效。”“我父亲死后留下很多遗产，留下很多钱，我把这些钱差不多都捐出来了。建设东北大学是我自己拿的钱，还有教育经费，都是我私人拿的钱。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那时我的脑子里想：一个国家要强，主要靠造就人才。教育为基本。”“过去的教育路线确是不无错误，只是造就出一些只能消费的

分子，造就出来许多助长内乱、剥削民众的官僚买办，形成了今日国家的危困，真未始不是几十年来教育失败的结果！今后的中国社会需要生产人才，需要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人才。”“我看到了墙上所贴的标语：‘办教育不要官僚化’，使我想到了中国教育的现状和以往办教育的人应负的责任……中国教育界确有一种通病，就是大多数教育机关都染有一种恶习，在教育设施上整个表现了从前的腐败官署的形式。这不但不能提高教育的效率，反足以影响教育的进行。”“方今我国文化落后，危机四伏，非才无以救国，非学无以成才，往者诸兄，和衷共勉，甚慰寸心。此后尤望对于校务，努力整顿，严格管理，设系宜切合需要，不必求多。招生须程度相当，不可滥取。注重实际，增益效能，庶几在校得一真才，在国即多一救亡分子。”^{[1]673}

办教育需要大量资金，当时在东北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张学良将其父张作霖 1000 万元（现大洋）遗产捐出去。1928 年，他又带头捐献家资 500 万元（现大洋）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用以发展中小学教育。在张学良和辽宁省地方当局的重视与关心下，从 1928 年到 1929 年，辽宁省教育经费从 549 万元猛增到 1635 万元。到 1930 年，辽宁省内共有大学 3 所、专科学校 2 所、高级中学 15 所、职业学校 40 所、小学 9826 所、幼稚园 71 所；另有平民学校 124 所、学生 700 余万人。此外，还有一批军事院校。各类学校共计 10404 所，年毕业生达 24 万人之多，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培养了各方面急需的人才。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张学良实干兴教的做法将东北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向了高潮。

张学良为了提高东北大学的教学质量，礼贤下士，

聘请了全国知名教授、学者（如梁漱溟、章士钊、梁思成、曹靖华、刘仙洲等）任教。同时，他为培养东北现代化所需人才，不惜花重金将东北大学中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名列前茅的毕业生送到英、美、德、法、日等国家留学，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后来不但为东北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中，作出了贡献。

1.2.2 倡导“学以致用”

1928年年底，东北实行易帜，从此，张学良主动放弃了他父亲张作霖长期坚持的武力争夺中央政权和争当国家首领的内战政策。张学良也反对学生立志做官或争做大人物。当时，留学欧美研习农业科学的专门人才回国后，大多“奔宦途做官”，不搞农业了，张学良对此颇不以为然。早在1926年11月，他即对南开大学东北同乡会的学生们说：“诸君在校读书，希望努力研究学业，切不必学做大人物，须知大人物愈多，则国家愈乱。”1928年9月，他对东北大学的学生们讲道：“我说现在中国需要人才，不是指大人物而言，恐怕大人物多了，不但国家不能富强，反倒要乱……我说的人才，是指专门人才而言。他学的是工，就要作工，学的是农，就要作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112] 张学良认为，教育“自当以适合现代潮流”为“标准”。他所说的“适合现代潮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掌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1933年3月，张学良出国访欧前夕，曾对部下明确讲述了他办东北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而消弭邻邦之野心”。^[130] 为此，他以高薪聘请专家、

学者（其中有许多人曾留学欧美）任教，并购用列强先进的教学设备和外语原版课本，东北大学和每所同泽中学都设有校办工厂，以便让学生切实掌握科技和文化知识，成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专门人才。

张学良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国家之强否，系于吾人之一念，吾人欲其强斯强矣。现在本人最感困难者，所用之人，固多自爱之士，而大多数人，往往在学校时极有自负，而一旦进入社会，辄为利欲所诱，同流合污，此实极不好之现象。此后所应注意，一在积极谋建设；一在养育有毅力、有见地、有宏大的志愿及洁身自好之人才。中国非无人才，然一般均重小我而轻大我，眼光过浅，仅知注意目前小利，而缺乏远大思想。其实，为公众利益即所以为个人利益。故予诸同学均努力学问、道德之修养，矢志救国，以将来中国之希望为个人一己之责任，无论负何责任，均当竭尽其力，忠于职务，勿见异而思迁，勿因位小而疏忽。更以此念推及于全国四万万同胞，则国家自易臻于强盛。”

他强调说：“言建设则工业建设为首要。工业建设人才尤为重要。我国人才虽有，然全才则甚难得。所以工学院，在中国实为急需。近来在社会上做事情的人，钻营者多，能尽忠职守、完成个人使命之人少……诸君在学生时代第一要修养人格，第二要专心求学，此不但为国家应该如此，即为个人亦必须保持人格。盖仅有学问不过短时期可以维持，有人格方能期诸久远。如果有学问无人格，终要受淘汰。所以，诸位有互相劝慰的责任。本人大有所感，因为中国在今日与外人比，当然是落后的国家，其最大原因，即在教育落后。而教育之所以落后之故，实因青年不能求得相当安心求学之地……

希望诸位应勉力求学，养成人格，作一良善民。如果人如此，不怕不能赶上先进国家。”^{[1]396}

1.3 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思想来源

1.3.1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张学良独特的家庭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他的基本性格。其父张作霖虽然是称霸一方的军政首要人物，但因为没有读过几年书，他在与对手角逐中，吃了不少苦头，深感文化知识的重要。所以，在张学良刚满6岁的时候，张作霖就给他请儒学名流做家庭的启蒙教师。“先从《三字经》《百家姓》学起，后读《论语》《孟子》等，直到《史记》”^[2]。张学良15岁前接受的知识和影响基本上都是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他喜欢读中国历史中“除暴安良、保家卫国”的一些英雄故事，特别“喜欢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丁汝昌这样的民族英雄”^{[3]21}。可以说，在整个少年时期，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悌、忠、信，爱人以德，民为贵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颇深的。

1.3.2 外来西方文化的熏陶

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张学良，不仅受过良好的治国传统文化教育，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的熏陶。1916年，张学良全家随父亲移驻省城奉天府。省城的环境使他感到陌生和新奇。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优越的家庭地位，为张学良开阔视野、进行社会交往提供了条件。到省城后，他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许

多新朋友。英文教师普赖德是他的第一位外国朋友，两人既是师生，又是好朋友。普赖德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他们相识以后，张学良常到青年会参加各项活动。例如，青年会经常组织“德育讲演”“科学讲演”“辩论讲演”以及各种球类比赛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张学良又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在与基督教会员的接触中，使他逐渐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他通过对比中西方文化，特别是在看到当时中国之残弱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张学良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1921年秋，东渡日本观摩日本帝国陆军秋操之后，张学良更是对日本当局有意炫耀日军威仪、蔑视中华感到气愤，但也不得不承认日军武器好、军纪严、文化高，在某些方面，确实比我们强，并深刻认识到东北要发展、国家要富强，必须“赖于人才，赖于教育”。于是，下决心要大力发展东北的教育事业。

1.3.3 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引领

张伯苓（1876—1951）是我国著名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踣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学良曾对人说，除我父亲和郭松龄对我的影响，

还有张伯苓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张学良对张伯苓认识和了解的起点是在一次演讲会上。张学良晚年时说：“我去听过他的演讲。那天张伯苓先生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不亡吾辈在’。我对这个题目很生气。过了一会，我向张先生发怒了，‘有我在，中国就亡不了。你这是讲的什么，你把你自已想成什么人了！’我是急性子，说话不好听。我非常不愉快。张先生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有了自己，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要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我对这个话非常感动，我这个人非常容易受别人影响。我受到了强烈的感动，下了决心。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在我父亲大力庇护下的有钱的纨绔子弟。但是，我不能总是扮演这种有钱的纨绔子弟的角色。我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4]

1990年，当有人采访问起张学良“年轻时受谁的影响大”时，他还是不暇思索地说：“张伯苓先生”。张伯苓对张学良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忧患意识

张学良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日渐加深之时。当时，国运衰微，民不聊生，甲午海战惨败。作为北洋水师的一名水手，张伯苓痛感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虽然军事救国的理想破灭了，但他没有消沉，而是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他写到：“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但是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要挽救危机，复兴中华，必须造就新人！”早在1916年，张伯苓应邀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张学良是台下的听众之一，他此时虽然是个风流倜傥的少年，又贵为“张大帅”的公子，但内心充满苦闷和绝望。因为

东北屡受俄国和日本的侵略，加上内乱频繁，他深感前途渺茫。张学良听完演讲，精神为之大振，从此立志发奋救国。他对张伯苓一直感念不忘，始终以师礼事之。1930年，已是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到南开大学视察时，对南开师生深情地说：“我之所以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2）重视科学，振兴教育的理念

1903年，张伯苓有感于日本蕞尔小邦，居然胜中国，挫强俄，一跃跻身于世界列强，必有所以致此之道，不可不往一观。在严修、王奎章的大力支持下，张伯苓趁暑假航海东渡，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盛况，领略了日本对教育的重视及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启发。1904年5月，张伯苓和严修二渡扶桑，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他的宏愿。张伯苓自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每看到各届毕业生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他觉得应该向大多数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社会的需要使他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留学取经。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此时他已经41岁，但他甘当小学生，孜孜不倦地认真钻研。1918年，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12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

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在南开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设文、理、商三科，教师17名，学生96名。这第一届学生中就包括周恩来，他被张伯苓准予免试进入南开大学文科。

南开大学重视科学、算学（数学）。“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有算学系和理学院”^{[5]403}。那时北京、上海开创许多私立大学，都是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的是线装书去上课，而张伯苓专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得的。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对张伯苓来说，并不意味着兴办教育的终结。建立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才是他兴办教育的宏伟大略。张伯苓于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1928年，张伯苓又兴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对面建筑小学校舍，设立了小学部。为开展学术研究和造就高层次人才，张伯苓在兴建和完善女中与小学之后，又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既以办学为救国的手段，故早就不以在天津创办学校为满足。1931年以后，日本军阀在华北屡生事端，他看到中日两国终不免一战，而天津定首当其冲。及至1935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张伯苓深为忧虑。1935年，他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心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1936年，张伯苓多方筹措资金，在重庆沙坪坝购地800亩，建起了南渝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学校于1936年9月开学，招收学生200多名。不久，七七

事变爆发，中日全面开战，天津南开中学的师生辗转撤到重庆南开中学。随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张伯苓建立重庆南开中学的先见之明和雷厉风行，被众人称为鬼神之功！随着重庆南开中学声望大振，学生人数急剧增加，达到 1500 多名，其中竟然有香港的年轻人跋涉几千里到重庆南开中学求学。8 年抗战期间，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南开中学建校之初，张伯苓根据他对当时中国现状和中国人的深刻认识，制定了三大教育政策，即进行爱国教育、科学教育、体育和艺术教育。在爱国教育方面，张伯苓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大学校训。他说：“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南开中学建校伊始，就开设了修身课。张伯苓独出心裁，不用老一套的修身课本，而是在每星期三下午把全体学生集中到大礼堂，由他亲自登台主讲。他正采用漫谈的方式，给学生讲爱国，讲求学，讲做人 and 处世之道。除了校长亲自主讲，张伯苓还聘请社会上的精英名流、专家、学者来校演讲，梁启超、胡适、张学良、陶行知、徐悲鸿等名家都先后到校作过报告。在科学教育方面，南开中学不仅设置了全面的西学课程，而且聘请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海归教师，一些课程甚至直接用英文讲授。作为前辈，张伯苓以自己的奋斗精神深深影响着张学良，特别是他教育救国的理念也激起了张学良对教育的关注和支持。20 世纪 20 年代末，张学良个人出资捐赠东北大学，并亲自兼任校长，可以说是受其影响的典型范例。

（3）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在

南开园这块民主与科学的土壤中，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人才，从举世钦敬的革命伟人到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子，从读书万卷的文苑大师到为国争光的体坛虎将，他们都从南开园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是有一定影响的。张伯苓的人才教育信条是兼顾德、智、体三个方面，且德育观、智育观、体育观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①“德育为万事之本”。张伯苓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视“德育为万事之本”。他认为，“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而应特别着手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在他看来，德育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内容，积极的人生观、事业心、意志、社会公德、正直、善良、无私等多种素质，都是衡量一个人品格的重要尺度。他的德育之首乃是爱国主义教育。他认为，最大的公德就是爱国，学生要成为有用之才，必须“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

张伯苓是一位热忱的爱国主义者。1905年，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独霸东北权益。为了调查日本的侵略活动，1927年4月，张伯苓曾亲赴东北考察，并成立东北研究会，把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作为一个主要课题。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出于爱国义愤，根据东三省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人文地理状况，编写了一本教材——《东三省地理》，作为高年级的必修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张伯苓的独创，是对帝国主义的挑战。此外，他还经常以亲身经历向学生讲述清政府的腐败、民族危机的严重，举行各种“国耻”纪念活动，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他对学生的人格教育要求很严格。他认为：“研究

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把人格的培养归纳为立志、敦品、勤勉、虚心和诚意五个方面。他亲自抓这方面的教育工作。每逢周三的“修身课”，总是邀请校外专家名流，或者自己对学生作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授，宣传为人作事和处世治学之道。他曾不厌其烦地带着一把筷子登上讲台，向同学们做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百折不不断的演示，说明“分则弱，合则强”的道理，从而强调团结可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之真谛。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言简意赅，在许多年轻人的灵魂深处，星火般地撒下救国图强的种子。

为了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张伯苓专门在校门的一侧设立一面整容镜。镜子上刻着严修书写的：“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使学生出入校门有所儆戒。

为了禁止学生吸烟，他曾带头折断自己的烟杆，并当众销毁所存的吕宋烟，终其一生不再吸烟。他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博得广大师生的尊敬，这种榜样的作用在德育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② 注重智力的培育。张伯苓一向重视学生的智力发展。他是大胆的革新者，早在 1904 年教家馆时，就敢于冲破封建教育的束缚。他不宣传封建教义的四书五经，而致力于提倡科学，宣传西方文化，开设“算术”“自然科学”“英语”“体育”等课程。

注重教学质量是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开中学一向以教学严格认真著称，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由最好的教师开

设基础课。重视实验操作，学生从中学就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

他认为人才应具备德、识、才、学诸多品质。一个人的才干、见识、智谋和胆略应该是多方面的。智育不能单纯地被看作传授知识，不能把德、智、体看作德、知、体。他对智力教育的看法在于他不以书本教育为满足，不赞成读书死记硬背，而认为教育不能与社会脱节，求学应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他认为，教学质量提高，不只是增加知识的分量和难度，要扩大知识面，活跃思维，为受教育者创造多种活动的条件。他说：“吾国学生之最大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的状况，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开，诸事束手。”这是颇有远见的。基于这种认识，他常常要求学生多接触社会实际，深入社会调查访问，进行社会考察，提倡学以致用。为了使了解社会情况，1926年，他还特地开设“社会视察”课，定为高中必修课。每周由教师引导学生到天津及各地参观工厂、商业、司法、教育、交通、救济、新闻、卫生等机关，并通过座谈讨论，写出考察报告。张伯苓先生认为，这才是念活书，对学生大有益处。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还提出了“土货化”方案，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突出强调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主张结合课堂学的知识，组织学生参观、实习。例如，在讲到社会保险时，去参观社会保险公司的业务；讲到电学时，去参观发电厂；讲到采矿时，参观开滦煤矿马家沟矿井等。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组织各种社团，以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如成立各种学术研究会、讲演

会、出版刊物、剧团、体育队等。他认为，从这里得来的学问不比书本上的少。很多学生确是通过各项社会活动，对许多现实问题（如劳工、物价、住宅、工商机构、行政组织等）获得基本概念，认清事物本质，受到社会启蒙，进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张伯苓办教育不只是向学生输送知识，而是着眼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本领，立足于把学校当成培养社会需要实干、能干的人才来办的。

③ 提倡发展体育。发展体育，增强国民的体质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多次谈到：教育的目的是救国，即以教育来改造中国，但中心是“改造她的道德，改造她的知识，改造她的体魄。”“南开正式成立以后，体育设备渐全，各项运动、各种球类均在华北领先。民初华北运动会中，郭毓斌、魏文瀚等出名跑将均是南开学生。”^{[5]404}

张伯苓认为国民体质衰弱、精神不振、工作效率低是因为国人不重视体育。1929年，他在美国考察教育时，看到本校矿科的毕业学生原来在校读书时身体还是很强壮的，但后来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做工，身体和工作效率都比不上外国人。当时，他就认为这不仅是某一个人身体不健壮的问题，而是国民体弱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结果。他说，过去一提国家强盛，就联想到军队的多寡、军火武器的优劣。其实，国家的强弱至关重要的人是人的体质。他根据多年的观察，认为“在德、智、体三育之中，我国人最差的是体育”“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主张“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因此，他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大声疾呼：“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像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

起来。”1946年冬，张伯苓由美返国，对发展体育事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教育如果没有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不懂得体育的人，不宜当校长”。

为了强身，张伯苓十分注意体育教育的普及，在学校的各年级均设体育课，每周两小时。随着各项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校内涌现出不少优秀的运动选手和实力雄厚的运动代表队。他们多次在天津、北京、华北及全国各地甚至远东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张伯苓本人酷爱足球运动，他有时亲自带领学生踢足球或参加比赛。1935年，由南开队主力队员和著名的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张伯苓高兴地宴请了全体队员，席间，他激动地说：西洋人嘲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做事是“五分钟热度”，事实是最好的反证。足球比赛是一种团结合作性很强的运动，全队必须团结一致，顽强奋战，才能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以此来克服“一盘散沙”，不失为一副良剂。足球比赛的时间长，紧张而激烈，必须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以此作为服务于社会的准绳，就不会被人嘲笑我们是“五分钟热度”了。张伯苓一生提倡体育不遗余力。他始终把学生的健康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个思想的确立，不仅仅是出于为改变当时广大青少年由于享受不到真正的体育权利，健康状况极为低下的局面，更是基于他对体育在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在教育中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从张伯苓的办学思想及他对德、智、体三育的躬行实践来看，他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能为社会

出力、做事的实干家，而不是崇尚书本，出校执业束手无策的书呆子。

④“善用贤能，知人善任”。张伯苓办学之所以卓有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坚强意志和实干苦干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尊重人才，知人善任。他深知提高教育质量，第一要依靠学术上造诣深的优秀教师，第二要依靠擅长管理工作的行政人员。任何领导都不能把各种才能集于一身，关键在于善用贤能。张伯苓与同事之间没有狭隘的帮派观念，能倾听别人意见，发挥各人所长，做到一视同仁，量才录用。他经常和同事们一起餐叙，在和谐愉快的气氛中，商谈校务，交换意见。在他身边有一批忠于职守的人员，其中服务最久、最有名望的当属“四大金刚”，即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和喻传鉴四位先生。他们既年富力强，又是精通本职业务的行家里手。他们在南开不计较待遇和名位，矢慎矢勤，兢兢业业，终生为南开服务，其原因就是张伯苓能“知”他们，“用”他们，“信”他们，以“国士”对待他们。

选拔师资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张伯苓聘请教师均经严谨选择。首重品德，次论学识，做到适才适所，视南开各课之所需，礼聘那些最著名的杰出人才。他认为，办好学校在于执教者的真才实学和对教育事业忠贞不渝的献身精神。他用自己火一般的热情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来南开执教。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才华横溢、奋发有为，抱教育与科学救国志愿的仁人志士。他们对张伯苓的理想和事业坚信不渝，因此能为南开作出自己的贡献。

南开是一所私立学校，教师的薪金既不如其他国立大学，也不如外国教会补助的学校。当时，南开聘请教

师，要与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竞争，如何以较低的薪金维持高水平的师资，确是一门很大的学问。那时，许多知名教授不计报酬，任劳任怨，一辈子为南开服务，这不能不说是张伯苓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1929年夏，杨石先获得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张伯苓为了他的深造，不惜用美国罗氏基金团的资金资助他出国进修。1931年，杨石先取得了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德国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维兰德教授邀请他留下任研究员，经张伯苓的吁请，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重返南开教席。像杨石先这样一批出类拔萃的知名学者，宁可在一所私立学校领取较低的薪金和适应较差的工作条件，却能全心全意地南开服务，这与张伯苓的善用贤能是分不开的。

张伯苓一生对人对事都放在明处，这是一位教育家特有的品格。他常说：“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都有短处，世间没有十全十美之人，我们使用人才，要尽量使其发挥所长，避其所短，在他长处得到发挥时，短处就会退缩不显了。如果我们处处吹毛求疵，世间将无可用之人了。”张伯苓的用人曾受到不少人的推崇。

可以说，张学良的办学思想和教育宗旨与张伯苓是相一致的。他指出：“在今天，办教育的人是必须首先来培养青年纯正的人格，鼓舞青年向上的精神，那只有以身作则的从自己作起，才好作青年的模范人物。倘自身尚不能敦品厉行，又将何以教人？其每因一己的不道德，不正当，不严肃，而予多数青年以不良影响，那真不知要造出多少罪孽！会使得青年们生活堕落，误入歧途，为社会的蠹虫，且为国家之累。以今日中国，还能受得住这样的教育吗？反之，如果能因你痛下‘十年树

人’的苦心与工夫，而替国家造就出来几个人才，他们会对人类社会多所贡献，他们会作了复兴民族的战士，那不就是良好教育之所赐吗？这里有两路：切望诸位能走向救青年救国家的路径，万不要葬送青年，摧毁国家，那就要健全了自己，去推行人格教育。”^{[11]775-776}

张伯苓作为他所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其晚年，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张伯苓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张学良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以及“德智体美群”的教育方针等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正是他所身处的国运衰微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得他的教育思想打上了深深的历史和实践的烙印。

第2章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德育与智育

张学良教育思想系统而丰富，其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他所倡导的教育乃立国之本，以及培养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办学方针。在他看来，学校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全面发展的，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学校教育不仅要有以爱国思想为核心的德育和以研究高深学术为主要内容的智育，更需要促进身心发达的体育、养成群体精神的群育以及爱美、审美、求美、创造美的美育。

2.1 “修养人格，将国家看大些”的德育观

德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对受教育者心理上施加思想、政治和道德影响，通过受教育者积极地认识、体验、身体力行，以形成他们的品德和自我修养能力的教育活动。德育的基本定位是指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德育的基本功能在于：它能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施加思想影响，引导他们的道德实践，培养他们的品德。而品德是人的个性的核心部分，对人的心理发展起着定向作用。因而培养人的品德的德育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导向功能。德育的内容具体规定学生发展的政治方向和应掌握的思想观点与道德规范，它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

依据，是完成德育任务、实现德育目的的一个重要保证。集体主义教育是德育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又是集体主义教育的集中表现，而张学良德育教育思想的核心恰恰是爱国主义教育。

2.1.1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

(1) 张学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产生的原因

张学良曾说，“自己从少年步入社会起就是一个‘爱国狂’”，实际上，他也是个非常爱国的人。可以说，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张学良一生的思想和行为中，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使得他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重要性；也正是这种思想，使其在教育体系中，把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作为重中之重，并把爱国主义作为德育的核心。张学良把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其德育的核心，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其个人的成长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① 张学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文化教育落后，国民素质低下；国家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特别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事、经济侵略的深入，也带来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发展中国的民族教育，如何促进中国的民族振兴，成为当时许多有责任感的教育家们思考的头等大事。这也是张学良教育救国思想产生的重要社会基础。所以，他不但提出了一系列强国强种、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举措，而且特别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张学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始终体现在其创办学校的宗旨之中。他就任东北大学校长以后，曾一再表示，身为校长，天职就是教育学生爱国。1928年9月，张学良在东北大学的训词中说：“现在我们中国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中国，诸位同胞都得努力奋救他的危险。”正是“风雨飘摇”的中国激起了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学生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强烈情怀。为了更加广泛地普及爱国思想，张学良在东北兴办新民小学，其宗旨就是灌输爱国思想，反抗外侮。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的学生及一些中学生流亡关内，张学良要求学生更要坚定救国的决心，要有自我牺牲精神。他说：“复兴民族之责任，固是在全国人民之身上，但东北青年所负之责任，比较重大”“所以要受苦我先去，要牺牲，我先去，要流血我先去，没有这种精神，谈不到救国自强，东北大学的学生要没有这种勇气，不必在东北大学。”^[6]例如，为了时刻提醒师生勿忘祖国和家乡，他让人重新设计了以象征东北地理特色的“白山黑水”为图案，外形似盾的校徽。同时，他还专门请刘半农先生创作了校歌，激励师生肩负起救国于水火的历史重任，“痛国难之未已，恒愤火之中烧，惟卧薪而尝胆，庶雪耻于一朝。”他要求学生必需要有主人翁之精神，指出：“中华民国的教育，不像从前为个人而求学，为家庭而求学，现在是为国家而求学的。”^[12]

他所办的同泽中学，其爱国反帝的目的更明确，他把这种精神称为“同泽精神”。“同泽”二字取自《诗经·无衣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意思是谁说我们没有衣裳，与你同穿汗衣（泽：内衣、衬衣）；国王出兵把敌杀，快快修好

矛和戟，与你并肩拼到底。《无衣篇》全诗表现了为抗击共同敌人，同仇敌忾、患难与共的战斗情谊和保家卫国、共御外侮的爱国精神。张学良以“同泽”命校名，除了表现了他的博学，也充分表现出他的良苦用心，即旨在培养桑梓子弟，共报国恨家仇。

同泽女中经常对学生进行反帝爱国教育，教育学生不忘国耻。校旗由蓝、红、白三种颜色组成，蓝色表示海洋，白色星月表示夜间，中央红色圆周及其所发之光表示灯塔。航者夜间于海洋，赖灯塔之光前进，而达其最终之光明目的地。校歌歌词：“快乐之园，活泼之神，涵育我纯洁天真。深阅共思，明辨其学，秉持诚敬日日新。愿皆是他年出群英，服务社会，共履坚贞。前途无量，放大光明，同泽女校莫与京。”校训是一个“诚”字，表示无论何时何地，言论行动、待人接物，须出以诚，免去虚伪。校徽是圆形，外面有八个角，圆形白地中是“同泽”两个红字。伸出八个象征光芒的角，四个小角表示光明的意志、光明的思想、光明的作人、光明的服务，四个大角表示同泽女校光明、女子教育光明、中国青年光明、中国前途光明。对学生进行心地光明、大有前途之教育。

海城同泽中学建校所用的一切建筑材料不用日货，设计、技术施工不用日人，概用国货、国人，建筑物的每块砖上都刻有“同泽”二字。办学伊始，就本着张学良的宗旨，以爱国思想教育学生，每逢国耻纪念日，即举行示威游行，张贴标语，呼吁国人勿忘国耻，宣传抵制日货。

由此可以看出，在张学良教育思想中，首先强调的是对学生德的方面的教育，在德育中，爱国主义是其重

心，爱国主义教育观是贯穿其教育思想的主线。

张学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更主要地体现在其一贯行之中。他认为，东北大学创办的目的就是振兴国家，“消弭邻邦之野心”。张学良在一次对学生讲话中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本应为世界强国，而我们自己不振，困难重重，我辈青年均须负起救国爱国的责任，而我个人责任尤重。”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学突然“尽失所有”，被迫迁往北平。针对情况的变化，张学良要求全体师生“明耻自强”，他强调“师生来平复学，今后训练要在明耻上注意。即不徒怨恨日本人太凶横，更要怨恨自家人太不长进，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要训练东北青年知耻自强，就是要他们天天流汗，时时准备出血，这样方可达到复土还乡之目的。”

1934年12月16日，在南京的东北大学校友举行集会。当时在南京的张学良校长参加了这次集会，并讲了话。他说：“（能）与诸位同学相见，非常愉快。”接着他向在座的同学提出，“第一，你们要时时想念北陵校舍是何等完备雄壮。第二，你们要时时想念东北家乡是我们祖宗田园庐墓之所在，是何等丰富伟大。第三，比东北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放在心头，去爱护她，立志去为她牺牲。”^{[1]838}语重情深，感人肺腑。张学良将军从校到乡到国，向学生灌输着爱国主义思想。

张学良认为教育救国主要在培养人才，因此，他在一次电文中说到：“方今我国文化落后，危机四伏，非才无以救国，非学无以成才，往者诸兄，和衷共勉，甚慰寸心。此后尤望对于校务，努力整顿，严格管理，设

系宜切合需要，不必求多。招生须程度相当，不可滥取。注重实际，增益效能，庶几在校得一真才，在国即多一救亡分子。”

② 张学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其个人独特的成长经历有关。张学良成长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年代。在早年随父“从政”的生活中，作为一个具有一定民主爱国思想的青年人，他十分不满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和控制。1928年7月，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开始了他主政东北的政治生涯。于是，他积极刷新政治、统一内部、励精图治，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入手，实施其建设东北、抵御外侮之计划，努力增强东北与日对抗的综合实力，志在把东北建设成为振兴中华之基地。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四分五裂，帝国主义瓜分豆剖，任意宰割，把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别是东邻日寇侵华政策已定，虎视眈眈，觊觎东北，侵华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并且不惜作了巨大的投入，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扩建校舍，充实设备，教学条件堪称全国一流。

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既是他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核，也是其重视德育教育的重要体现。他的这种思想又是和历史传统与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以后发展过程中，既经历了从反共、剿共到联共抗日的转变，也经历了从拥蒋抗日、劝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在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和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表的“告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后，对他起

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中共中央让李克农到洛川与他正式谈判，尤其是后来他与周恩来的会谈，促使他实现了“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从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因此，张学良成为我国近现代史上被认为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这一。正如周恩来生前所称，张学良先生是中华民族“千古功臣”。

张学良总是从自身的亲身体验来教育学生爱国。他在就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指出：“论学问，我比不上诸位教授，但是我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我誓以此心引导全校师生，读书是为了爱国、读书是为了救国。”^[132]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张学良将军曾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的熏陶。他从青年时期就随父从政，耳濡目染乃父对培养人才、发展教育方面的重视，这无疑会给他的思想以重要影响，也促使张学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所有这些经历对其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不能不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张学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人民的重要思想基础。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具有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而且落实在爱国救国的具体行动中；不仅要求别人，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其中的“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既是东北大学校歌的关键歌词，也是张学良爱国思想教育内容的具体体现。

张学良把拯救国难，复兴民族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在今天的我们，个人的前途一点也没有了，有之，只是整个民族的前途。”^[8]他一直在思考，人

类全是圆颅方趾，为什么我们要受人家的欺凌？我们同是国家，同是民族，为什么我们在国际间要受这样的压迫？即使在被“管束”后，他也曾有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先研究明史，后研究清史，最后研究民国史，目的就是弄清楚近百年来总是受外国欺凌的原因。他常说：“我们的苦痛都是我们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债，我们今后万勿再给子孙留下去。”^[6]我们凭着什么去抵抗这一群逼在门前的债主，凭的就是从自己做起，从即刻做起。他教育他的部下：不可自暴自弃，以为谋国有人即可袖手旁观，而存偷安苟活之心，须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民一日不安全，国家一日不稳固，我们就应当引为奇耻大辱；要时刻牢记，这个国家是谁的？我应如何完成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要有“中国不会亡，何以不亡，有我在；中国能复兴，何以复兴，有我在”的舍我其谁的精神。

张学良把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容体现在他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之中。一方面，他认为个人在国家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说：你是中国四万万人中的一个单位，这犹如细胞对于一个生物全体的组织，每个单位都能表现出他的力量，则整个国家当然可以强盛，缺了你或你不能在集团中表现出作用，则必然于整个国家中减少了一份生力。个人在国家里面诚极渺小，但没有一个一个渺小的个人，也就没有国家了。所以，个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任何个人不应当轻视他自己。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国家的问题高于个人的问题。自然，没有自己焉能有国家，但没有国家又焉能有自己？如国家问题不解决，则个人问题永无解决之日，正如一株树不能根深，焉能蒂固？我们应当视国家问题高

于个人问题。总之，在他看来，个人是国家的单位，国家是个人的集体，所以，每个人对于国家的复兴都有很大的责任。这正是他为什么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到整个教育体系中，为什么要普遍办学、兴学来提高学生素质的真正原因。

张学良的爱国教育思想与实践使东北较早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教学规模与质量得到空前的扩大与提高，爱国、救国、抗日御侮的思想得以广泛深入的传播，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全面发展的实用人才。特别是自1935年起，团结在张学良身边主张抗日乃至联共抗日的文武官员绝大部分是东北培养的，这说明效果是显著的，成就是巨大的。然而，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教育难以为继，只有少数学校流亡关内。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要想真正发展教育，必须首先取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事实证明，教育救国在当时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张学良的教育是建国之本、教师是教育之本、强调爱国主义和人格教育、消费教育转为生产教育、重视农村教育、对教育高投入和对教师高待遇等一系列思想，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 张学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积极作用

由于张学良坚持实行爱国主义教育，所以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绝大多数学生都先后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与实践，使东北较早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教学规模和质量得到空前的扩大与提高，爱国、救国、抗日御侮的思想得以广泛深入的传播，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全面发展的实用人才，特别

是东北大学学生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大学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校长张学良和教师们的教育下，充满爱国激情的东北大学学生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先锋和骨干。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提到了东北大学和东北大学学生宋黎的名字，那么，东北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一，东北大学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重要学校之一。《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指出，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校有“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显然，东北大学被列为参加运动的各校之首，可见其作用之大。其二，东北大学参加学联的代表自始至终参与了一二·九运动的组织和发动工作。这场运动的组织发动者是北平学联，当时学联的领导人主要是来自女一中的郭明秋（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秘书）、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纠察）以及燕京大学的黄华（交际）等。其三，东北大学学生在一二·九运动的全部过程中，始终起着领头作用，并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以12月9日当天的游行和请愿为例，这天早晨东北大学已被军警包围。然而，东北大学300多名学生，在学生会主席宋黎（任总指挥）指挥下，同学们手挽着手，冲破军警对学校的包围，走上街

头。当传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学生被军警拦截在西直门外、不能进城消息时，东北大学队伍不得不单独向目的地进发。上午10点，各校推举代表到居仁堂请愿，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自由”等要求。但新华门紧闭，卫兵枪口上了刺刀、机枪架在了摩托车上，学生的请愿被拒绝。在请愿不成的情况下，改为示威游行，东北大学的学生仍然走在最前列。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东北大学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先锋和骨干作用体现了东北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在全社会的地位与影响。

东北大学学生请愿活动还对西安事变具有促进作用。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早有论著阐明。大都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抓捕蒋介石的深刻社会背景是中日民族矛盾日趋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抗日、全民族抗日呼声日趋高涨的产物。近几年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抗日、联共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直接导火线则是1936年12月9日东北大学西安分校（东北大学工学院和补习班）学生、西安市民向蒋介石的请愿活动。这一观点提出的依据是根据当年参加这次请愿活动的回忆资料，特别是依据张学良自己的口述历史资料。

这次请愿活动的目的是反对蒋介石“剿共”内战政策，要求蒋介石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参加请愿人员近万人，早6点开始集合，先到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请愿，但未获满意答复。下午3点，学生决心徒步到距离西安50里的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在向临潼进发的队伍中，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学生走在最前面。蒋介石派

重兵在霸桥设防，欲镇压请愿学生。为了避免发生血案，在西安东郊的十里铺，张学良追上了队伍，并对学生进行劝阻。他说：“我不是来阻挠你们的救国请愿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站在队伍最前面的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们听到要流血牺牲的话时，高喊：“难道要求抗日救国有罪吗？”“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这时，张学良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继续向群众说道：“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我不是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你们。”^[654]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他的要求，回去听候满意事实的答复。

但是，当天晚上，张学良却遭到了蒋介石的训斥：“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上？”还说，“今后不管在哪里，凡发现有搞示威游行而不听劝的，就坚决镇压，就用机关枪扫射！”^[655]张学良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听蒋先生这话，真的火了，”“我下了决心，要教训教训这个老头子。”西安事变就这样发生了，张学良以实际行动兑现了他对东北大学学生们许下的诺言，回答了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当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们得知西安事变消息时，奔走相告、兴奋万分、相互拥抱，有的同

学甚至喜极而泣。

从这次东北大学学生的请愿过程可以看出，请愿活动促进了张学良下决心发动这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中表现的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影响和鼓舞着东北大学的学生。由于日寇不断西犯，兵临潼关、威胁西安，东北大学于1938年4月由西安迁到四川三台。此时，张学良已失去自由，不能复出领导和主持东北大学工作，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已深感人心，东北大学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没有丢。当时的流亡学生面对国破家亡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秘密地组织起来，经常传阅一些进步的书刊，议论国家大事，探求救国真理。他们对国民党当局在九一八事变中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以及他们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异己的反动政策痛心疾首，特别是对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阴险狡诈以及他以后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极为痛恨；对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中表现的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分敬佩，深受鼓舞。学生们发愤图强，刻苦攻读，积极参加大后方的抗日救亡民主运动，通过举办墙报、讲演、街头宣传、文艺演出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政治宣传，并积极开展社会教育，传播革命思想，促进了地方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由中共三台县委党史研究室和县政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东北大学在三台》一书中写道：“东北大学在三台长达八年的日日夜夜里，广大青年学生在缺衣少食的艰苦条件下，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为抗日民主而英勇战斗，他们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大后方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1.2 张学良教育思想中的人格教育

张学良在对学生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

研究张学良德育观中的人格教育，首先需要界定人格的含义。人格一词，从心理学角度讲，主要指个人所有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它包括行动、认识、智能、思想、情绪和身体结构等方面内容^[10]。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尤其是指人的道德品质。人格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人类社会中最具感染力的一种精神力量和内在素质，它要通过人的行为和活动予以表现。人格的魅力是巨大、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对于社会成员具有明显的示范和激励作用。所以，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具备健康完美的人格，既是人生中孜孜渴求的目标，也是整个社会极力推崇和弘扬的内容。简言之，所谓人格，就是协调统帅一个人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力量，是人的特质的独特模式，而张学良的这种“综合性力量”和“独特模式”主要表现在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淡于名利等方面，张学良正是以自身的这种人格修养来对学生施加教育和影响的。

(1) 张学良在各种讲演中多次提到人格问题

他说：“在今天，办教育的人是必须首先来培养青年纯正的人格，鼓舞青年向上的精神，那只有以身作则的从自己作起，才好作青年的模范人物。倘自身尚不能敦品励行，又将何以教人？其每因一己的不道德，不正当，不严肃，而予多数青年以不良影响，那真不知要造

出多少罪孽！会使得青年们生活堕落，误入歧途，为社会的蠹虫，且为国家之累。以今日中国，还能受得住这样的教育吗？反之，如果能因你痛下‘十年树人’的苦心与工夫，而替国家造就出来几个人才，他们会对人类社会多所贡献，他们会作了复兴民族的战士，那不就是良好教育之所赐吗？这里有两路：切望诸位能走向救青年救国家的路径，万不要葬送青年，摧毁国家，那就要健全了自己，去推行人格教育。”“诸君在学生时代第一要修养人格，第二要专心求学，此不但为国家应该如此，即为个人亦必须保持人格……如果有学问无人格，终要受淘汰。所以，诸位有互相劝慰的责任。本人大有所感，因为中国在今日与外人比，当然是落后的国家，其最大原因，即在教育落后。而教育之所以落后之故，实因青年不能求得相当安心求学之地……希望诸位应勉力求学，养成人格，作一良善国民。如果人人如此，不怕不能赶上先进国家。”“总之，最重要（者）约有两路：（一）自己看守自己的人格。（二）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自己看守自己的人格，就是方才说的，不要失去自己的人格，被外界引诱，昧了良心，作极恶的事，遗害于同胞。要拿批评人的话，来规戒自己。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就是说自己不要自看的太重，而有害于国家。”

“诸生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今日学生，为将来国家之主人翁，从此立定志向，振奋精神，努力作人，努力向学，艰苦卓绝，恪守规纪，必须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实学问，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重任。余对诸生爱之愈深，望之愈切。今当开学之期，不克亲临共话，特电勸勉，务望久志不忘，躬行

实践，至要至要！”^{[1]672} “说起来，救国家救民族只有从自己做起，也就是要管好了自己之后，才配谈救国。那么，难道要自己好还不容易吗？不容易，诚然是不容易。一面因为人类是有惰性的，要想保持住常态的向上心，那必须是能痛下决心的人，而且能无时无地不在管着他自己！一面是今日之中国人的处境太恶劣了，在这外侮内忧交相煎迫的苦闷中，假定你是个意志较比薄弱的人，很容易使你受打击，以致灰心，消极。尤其在今日社会几乎形成了一种风气，不止是不奖励好人，有时还真使作好人的出不了气，这种现象不一而足。张伯苓先生曾说过：‘好人在屋里叹气，坏人在台上唱戏’，这也可以说明今日社会不容许好人存在，而且好人难作的事实。所以我们无论从主观上或客观上来探求，都可以深知作一个完人之不易。虽然如此，你能说我逃避现实而不作现社会的一员吗？那既不可能，也大不应该，越在困难中训练自己作一完人，那才越见得一个人有决心，有勇气，有魄力。我们如果能健全了自己，那自然会打破苦闷的环境，改变社会的风气！”^{[1]754}

1935年他在汉口发表演讲：“事业的成就，有的靠着技术，有的靠着聪明智慧，但是，能成就旋转乾坤大事业的人，则有赖於人格之感召，气宇之宏大。事业成就就是与人格阶层成比例的，人格阶层越高，事业成就即愈大。”^{[1]889}

（2）张学良强调人格教育乃教育之主要内容

① 有人格方能期诸久远。张学良曾说“在学生时代第一要修养人格”（第二才是专心求学），“仅有学问不过短时期可以维持，有人格方能期诸久远。如果有学问无人格，终要受淘汰。”因此，无论是“为了国家”，还

是“为了个人”，都“必须保持人格”，要懂得“为公众利益即所以为个人利益”^[1393]的道理，“放大眼光”“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

② 人格阶层愈高，事业成就即愈大。张学良不仅认识到修养人格的重要性，而且对于人格修养和事业成就之间的关系，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洞察。他在1935年7月1日汉口演讲时说：“事业的成就，有的靠着技术，有的靠着聪明智慧，但是，能成就旋转乾坤大事业的人，则有赖於人格之感召……人格阶层愈高，事业成就即愈大。”“一般学生，对于国家观念非常的热烈”“而一旦进入社会，辄为利欲所诱，同流合污”“从前他在校讥讽人的话，现在他自己实行了”^[1121]。这种现象应在学校的德育中加以解决，使学生在学校时不要把复杂的社会看得太简单了，毕业后又能“打破恶劣环境”，保持学生时代的纯洁，“改造社会，勿被社会改造”。^[1196]

③ 不可求役人，须要被役于人。在日常生活中，张学良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不可求役人，须要被役于人”^[1160]，就是说，不能只让他人为自己服务，而要尽量地为他人服务。特别要练习为“人群”和为社会服务。

④ 励志修身，增强学识。张学良强调做人、做事“须自己要强”^[11952]。他经常引用《孟子》中的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意思是说，中国人只是叫骂列强欺侮中国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努力奋斗，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只是指责社会腐败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坚持走“正途”“不腐化”，并设法消灭社会的腐败。对此，张学良还特别希望诸君者，约有六端：

① 勿自满。满招损，谦受益——至理名言，无庸喋喋。盖存自满之心，作骄必败，诸君勉之。

② 学与德俱进，勿懈怠。世间无处无学问，诸君勿以为毕业后而学足矣，因之懈怠。仍希望勉之。

③ 打破恶劣环境，努力奋斗。青年人心理纯洁，一入社会，往往改变常态。希望诸君出校改造社会，勿被社会改造。

④ 做事有恒。青年人遇事务，始则极其热烈，终则意冷心灰。希望诸君要永久保持适宜温度，成则不喜，败则勿馁。

⑤ 本良心做事，为社会服务。

⑥ 为东大争光荣，具百仇[斯]不挠之精神。诸君为东大天字第一号之先锋，希望好好打开出路，领导后起同学，为东大创一块有荣誉之招牌。

最后并希望诸君勿忘母校，精神勿涣散，感情永存在，双方互相期望，努力救国^{[1]196-197}。

(3) 张学良非常重视自己的人格修养

张学良的政治生命面对的是国家内讧、外侮，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基于对现实的深切体验和悉心思考，他深为国家民族的现状及未来担忧。

① 他忧“内讧、外侮国势阽危”。张学良19岁就参加战争，经历了剿匪之役、直奉战争、豫南大战和中原大战，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曾慨叹：吾国不幸，兵祸频仍，打了和，和了打，到底为什么？打仗为战胜，双方不知牺牲了多少有用的青年。并呼吁：早息内争，倘再延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那么他又为什么参加内战呢？笔者认为，除了他统一御侮的思想动因外，还有他无可奈何的

客观因素。正如赵一荻所说：“他之参加内战，不是名，不是利，也不是为了争地盘。他开始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12]他本人对此也深有同感：我自 22 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皆为不得已之行动。不论其为战胜或失败，均感觉万分痛苦。张学良还从国际的视角来忧国家。他曾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将在这一斗争形势下，处于受包围受夹攻的危机地位，在未来自有被蹂躏被牺牲的绝大可能。当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蚕食中国之时，他就心忧国家的主权与独立，针对中国的土地任人割裂、中国的主权任人剥夺、中国的组织任人破坏的现实，他大声疾呼：整个中国，眼看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难严重的程度，实在是无以复加了！整个民族的生命，眼看就要完了，举国上下若不能一致奋起，那真是国亡无日了。

② 他忧“消极、自私、内争”的国民性。国是由民组成的，对国家的忧患最终必然深化为对国民的忧患。他曾在检讨国难严重之由来时指出，构成中国国难日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人受了传统的消极心理的影响。这种心理可用几句成语代表，如“明哲保身”“休说国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等。这种心理实足以断送民族生命而有余；这种心理可以使我们中国人的斗争意志消磨净尽，宁束手待毙，决不拼命斗争。试打开我国近百年史看看，我们何尝坚决地彻底地同我们的敌人斗争过！他认为，国人多数还具有只顾个人不顾团体的狭隘自私心，遇着一桩事情，如果于己没利，无论怎样容易，怎样益于旁人，也不肯去做。反之，即使再难甚至妨害旁人，

也要去做，结果导致利益冲突，大家受害，以致民族整个文化不能进展，事事落伍。中国之所以弄到这个地步，都是中上层社会的罪恶！无论是军人、政客、学者……多半是太自私自利了。他还指出：“中国人每基于传统的劣根性，忽于团体的群力的对外竞争，而徒事对内做无谓的纷争，这也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最大弱点。”^{[1]776}张学良如此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一方面是社会现实在他心灵上的投影；另一方面是他反思历史，放眼世界所获得的一种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警觉；同时也是他继承古代知识分子忧患传统的结果。

张学良曾说过，“我们都是东三省人，我们都是东北大学的组成单位，所以我们应该共同爱护东北大学，保护东北大学的校誉，要维持好的校风，同时要铲除不良的习惯，因为一个大学的名誉好坏，很有关系，假如坏了的时候，甚至好的教授，好的学生，都不肯来，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我这样的苦心焦思，来办东北大学，并非是要讨你们对我有什么好话，有什么酬答。诸位要明了，我对学校的捐款，是出于至诚的，绝不含有投资的性质，一切的事，只求对得住大家，对得住家庭父兄的付托，对得住社会，对得住国家就是了。所以我不（只）希望我自己是个好人，是个有为的青年，只[还]希望你们都成为好人，都成有为的青年。”^{[1]445}

张学良校长经常和学生打成一片，时常询问学生的情况，大至教授讲课，小至饮食起居。当有一次问到有何困难时，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问：“校长，咱们部队在外面驻防，可以占用农民耕地作操场吗？”张学良说：“不可以，你是哪县的？”问话的学生答是法库的。再详

细一问，原来是东北军某部所为。于是，张学良向学生要去了详细地址和部队番号。这次谈话后，没几天，那位同学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部队把地退回来，还道了歉，校长说话算数，真为老百姓办事。

2.2 “教育系乎国本,培养实用人才”的智育观

智育，即给受教育者以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技能，发展他们智力的教育。它作为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并不断前进的基本条件之一，从一开始，就占据着整个教育活动的中心位置，成为教育的基本职能。人类的知识和智力的成果要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使每一代人都能继承前人创造的一切文明，并使下一代人又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从而使整个人类文明不断地进化，必须靠智育。没有智育，就没有科学技术和智力的再生产，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不可能延续和发展，人类自身的发展就要停滞。

智，也指学生的才智，也就是学生毕业后到社会上工作，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2.2.1 强调智育教育的根本目的

“教育乃富强之本”。首先，张学良将军深知教育是富强之本，智力资源胜于物质资源；开发物力资源有赖于智力的启发，有智力方能开发物质，没有智力则货弃于地。同时，还在于他深受尊师重教这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教育思想，如郑观应的“教育为立国之本”论、康有为的“穷理劝学”论、梁

启超的“人才之兴在开学校”论、严复的“开民智更为富强之原”论和孙中山的“教育之道首贵普及”论，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次，在于他对教育地位与作用悉心思考，他认为：“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方针”“我国文化落后，危机四伏，非才无以救国，非学无以成才”“欲求民族复兴，根本上必从教育着手”^[13]。“我国文化落后，国势阽危，愿求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他认为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办学在于培养适用人才，以促进国家现代化。所以，张学良校长的办学宗旨、目的十分明确，即“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14]

张学良从历史的教训和切身感受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富强主要靠造就人才，“教育为基本”。1924年冬，他在对北京大学师生讲演时说：“中国唯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14]1926年，他在北京对国闻社记者谈话时说：“学生出身，对此现象，极为悲观。以为铁路破坏，实业不兴，所害尚小，独此关系国脉之青年教育，放任冷淡，一至于此，实大不了。”^[124]在《复京师中小学教育维持会函》中说：“教育系乎国本，而尤以中小学为青年入德之基。”^[162]1930年12月，他在天津对国立第二工学院的师生们说：“中国在今日与外人相比，当然是落后国家，其最大原因，即在教育落后。”^[1396]因此，要赶上先进国家，必须大力加强建设，“言建设，工业建设为首”，建设第一需要人才，而“工业建设人才尤为重要”。这种办学思想是极其合乎当时中国的国情。在1933年3月出国旅欧前夕，他曾对部下明确讲述了自己办东北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

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而消弭邻邦之野心。”他还强调指出，我们所要培养的人才，不是唯唯诺诺的懦夫，也不是贪图利禄的市侩，我们的教育“不像从前为个人而求学，为家庭而求学，现在是为国家而求学”，即为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为捍卫炎黄子孙赖以繁衍生存的国家而培养栋梁之才。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校长办教育的目的在于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培养大批建设人才，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现代化的强国。

培养实用人才乃教育之基本。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在培养人才方面特别强调“实用”，重理论轻实践是旧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通病，而东北大学则强调要破除这种弊端。张学良校长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去工作，去实践。他指出：非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训练他们能够有作好实际工作的能力。针对当时一些留学欧美研习农业科学的专门人才回国后大多“奔宦途做官”的倾向，1926年11月，他对南开大学东北同乡会的学生们说：“诸君在校读书，希望努力研究学业，切不必学做大人物。”^[159]1928年9月，他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我说现在中国需要人才，不是指大人物而言，恐怕大人物多了，不但国家不能富强，反倒要乱……我说的人才，是指专门人才而言。他学的是工，就要作工，学的是农，就要作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因此，他要求东北大学的学生以快乐的态度，坚韧不拔地努力去从事自己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教育乃立国之本，通过教育培养东北地区需要的各项人才，开发振兴东北大地，这是张学良的一贯

主张。

2.2.2 提高智育质量的各项举措

(1) 注重师资队伍建设

东北大学从创办之日起，就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首位，一切措施都以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东北大学坚持“惟才是用”“惟贤是举”的用人之道。建校之初，学校就聘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学士、奉天公立文学专门学校校长汪兆璠担任文法科学长，留德工学博士赵厚达任理工科学长，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数学学士、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冯祖荀为理科主任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庄长恭为工科主任教授。

张学良很看重教学质量这个关键问题，他认为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取决于教授水平的高低，他总是礼贤下士，凡属对东北大学发展有利的学术泰斗、各界名流，均不惜重金聘任到东北大学任教。张学良将军担任东北大学校长后，更加重视教职员工的聘用。他深知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依靠内行专家，“实行教授治校”。在他兼任校长后，选任密歇根大学法律学博士，曾任北京民国大学副校长、北京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的刘凤竹为副校长。以后又废除副校长制，改为秘书长制，任命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宁恩承先生为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两人对办学都较有方法，为东北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学良 1928 年 8 月 16 日接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十分注重师资队伍建设，礼贤下士，在海内外广泛聘请著名学者到校任教，其中的大多数人是在美、英、法、

德、日等国家一些名校留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曾在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任教的部分主任教授以上的著名学者就有 65 人。(参见附录 B)

1929 年,东北大学各科改为学院,张学良聘任的院长都是从专家学者中遴选的,他们都是曾在外国留学的学者:文学院院长周天放,美国欧力根大学教育学学士,曾任北平民国大学副校长;理学院院长孙国封,美国康乃尔大学理学博士;法学院院长臧启芳,曾留学美国;工学院院长高惜水,美国麻省纺织工科大学学士;教育学院院长李树堂,美国纽约大学教育学博士。

1929 年,全校共有 120 名教师,其中教授 94 名,占教师总数的 78%,讲师 13 名,助教 7 名,教员 5 名,物理助理 1 名。从学位上看,博士 12 名,硕士 26 名,学士 24 名,有各种学位的 62 名,占教师半数以上。在全校 125 名院长、教师中,留美的 48 名,留英的 4 名,留法的 3 名,留德的 3 名,留日的 6 名。这些学者知识渊博,办学有方,治学严谨,学风优良,他们辅佐张学良把东北大学很快办成知名度很高的一流高等学府,使得张学良长期追求的“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的办学宗旨基本得到实现。但由于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学被迫流亡关内,遭到严重的摧残。正如张学良所慨叹的“谁知祸起仓促,尽失所有”。但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可贵精神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经费比较充足,教师待遇高,这是东北大学的一个明显特点。东北大学教授薪金一般是 360 银元,最高达到 800 银元。当时南开大学教授的薪金为 240 银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薪金为 300 银元。而平津一些大

学的教授又常受减薪、欠薪的困扰。东北大学一直坚持高投入，不许拖欠，不许缩减，不许挪用，并有优厚的待遇，如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舒适的教授住宅建于新开河的教授俱乐部，专供教授及其家属休息和娱乐。幽雅的环境、丰厚的报酬令国内的一些大学羡慕不已。

由于学校经费充裕，教学设备和仪器等均为国内各大学之冠，环境幽雅，生活条件优越，使教师得以专心从教。因此，关内许多名人、专家和学者联袂出关，以至于三江、两湖、福建、四川等地杰出人才纷至沓来。一时间，精英荟萃，人才济济，极盛于一时。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张学良提高东北地区教育质量的重要办学手段。为了解决东北地区基础教育薄弱，中小学教师水平差而导致东北文化落后、教育质量差的问题，张学良将军执政后，东北各级政府制定了有关政策，加强对中等教育的管理和对教师的考核，努力提高中等师资水平。为此，东北大学教育学院设立各种专修科，计有数理、英文、中文、公民地理、家政、博物、体育等专修科。专修科的学生都是官费学习，3年毕业后，出任各中等学校有关学科的教师。这对提高东北地区中等教育的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

由于对教师的严格要求，个别教学效果差的教授即使有学位，也难以滥竽充数。各院长听取学生意见，及时解聘另邀。甚至由于教育学院院长行为不检，难为师表，亦被免职。

(2) 严格学生考核制度

张学良把严格学生考核制度作为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为了保证培养人才的质量，学校不仅在招

收新生时，严格挑选，把好入学第一关，而且学生在校期间，实行淘汰制，决不姑息迁就，月考、期考、学年考试，院长亲临考场，对违纪者，严惩不贷。成绩不及格者，一律牌示降级，或酌令休学、退学。学生经过多次考试淘汰，毕业生仅逾半数。

如奖学办法中规定，“所习各学程至少在 65 分以上”“在本学年内请假不逾 25 小时”“在本学年内未经记过”“学生学年成绩平均分数在 85 分以上者，免纳翌年学费之半额”。免费学生操行成绩甚优，学习成绩平均分数在 85 分以上者，加给奖励证书。这种奖学办法极大地鼓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这样一来，入学后的学生无不勤奋读书，力求上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制定奖励规则的同时，还制定了惩戒规则。惩戒分训诫、记过、休学及退学四种。凡屡次请假者、上课时阅览课外书籍者、志气颓靡不注意听讲者、上课迟到或卧床晏起者、与同学交恶者、谩骂喧哗不顾行检或辱殴差役者、曾经训诫仍不加检束者、未经请假擅自缺课者、夜不归宿者、沾染烟酒恶习者、对于教职员傲慢无礼者、无理辩难有意搅扰者、其他行为不加检束者，犯以上各例之一者，轻则训诫，重则记过。凡在教室或寝室鼓动是非破坏秩序者、不服从命令强行违抗者、私藏违禁物件者、犯嫖赌恶习或窃取行为者，记大过 3 次或小过 9 次者、每学期由开课日起 20 日以上未曾到校亦未请假者，如果犯上例各项之一者，轻则令其休学，重则退学。同时规定，凡受惩戒的学生的详情在校揭示，对受退学处分学生的情况通知其家属。这些惩戒规定既维护了学校的教学及生活秩序，又培养了学生遵纪守法的

自觉性。

从 1929 年起，毕业生中每毕业班第一名，由学校公费资助出国留学，是年选送 8 名学生出国留学，如金锡如、王际强、陈克孚、白世昌、刘树勋、应德田、崔九卿、沈后翼等。其中，有很多人回国后曾在母校任教，将欧美文化之长传播到中国，以补我们之所短。

东北大学在学生入学方面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开始时，入校前有预科班，预科班实行淘汰制，不合格的不能进入东北大学本科。东北大学的招生考试也是极为严格的，特别是外语要求严，不仅要求有一定的词汇量，懂语法，能阅读，而且能听，能会话。这些方面不合格的，不能录取。因为东北大学的很多教材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外文原版教材，许多教师在课堂上也使用外语授课，学生没有一定的外语水平，不可能参加正常的学习。学校执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实行高淘汰率，只要 3 科不及格，就取消学籍，自动除名。学校还引入竞争机制，设立各种奖学金，奖学金最高的是每系考试第一者，由学校资助公费到国外留学，并另发 500 银元作为旅行参观等活动费用。对出国的留学生，张学良还设家宴一次送行，勉励他们发奋读书，以造就国家有用之材。张学良每年对各个班的优秀学生在家里接待一次，将照相机、钢笔、各种纪念品等分发给学生，以资鼓励。因而东北大学的学生在张学良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学习严谨，读书风气很浓，为祖国、为民族奋力拼搏，立志图强。

(3) 注重学科建设

张学良把学科建设作为培养各种拔尖人才的重要基础。在课程设置上，东北大学认真吸取欧美国家名牌大

学的经验。诸如，东北大学工学院的课程设置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标准为蓝本的。机械系除了预科已修的课程外，还必须完成应用力学、机械制图、国文、德文、材料力学、电气工学、热力学、水力学、汽机锅炉、工业簿记、内燃机学、机械设计、汽车学、工厂设计、英文、热机关学、机械学、图式力学、活塞机关、水利机学、工科学、经济学、汽轮、原动力工厂设计、机车、室温学、工厂管理、钢铁冶炼等课程以及各种实验和工厂实习等。

对于教材选用，力求高水平。一般都是外国原版教材，如理工科几乎都是英美大学教材。课程安排很满，周学时一般高达 30 学时左右，学校特别重视外语教学和应用，答卷、做题、写实验和实习报告均用英语。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实用人才。因此，他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出发，确立学校专业设置和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不断增添新学科，开拓新领域。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军阀混战连年不断，破坏十分严重，百废待兴，但国内建设人才极其缺乏。为了培养建筑业方面的急需人才，在张学良将军的支持下，梁思成教授于 1928 年在东北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第一班招生 60 人，大部分由预科甲乙班肄业期满同学直接升入，不足则由校外投考及格者补充。以后又招收了第二、三、四班，直至九一八事变。

梁思成教授早年留学美国，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效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课程体系。共有 30 门课程（基础课已在预科修完），包括国文、英文、法文、

图式几何、应用力学、营造则例、图案（一、二、三、四）、阴影、图画（一、二、三、四、五）、宫室（包括中国、西洋）、透视学、图视力学、木工式铁石、卫生学、铁石式木工、雕饰、美术史（东洋、西洋）、营造法、水彩（一、二、三、四）、炭画、合同等。课程讲授均由留学欧美者或国内知名人士担任。例如，建筑设计由梁思成、林徽因、童隽、陈植教授担任，结构设计课由蔡方荫教授担任，暖气通风课由彭开煦担任，绘画写生由孔佩苍担任。建筑系还从欧美、日本购进一些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幻灯片，以配合宫室史（即西洋建筑史）的教学。这样，一个师资力量强大、课程配置合理的我国第一个建筑系诞生了。不幸的是，到第四班入学后，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后，因建筑系教授多去上海执业，学校决定在上海沪西曹家渡复课，直至第三班毕业为止，东北大学建筑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纺织学是当时国内的新兴学科，我国除江苏南通有纺织学校外，只有东北大学设有纺织系。纺织是轻工业，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衣着主要是棉织品，对于毛的利用率很低，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穿得起皮毛和毛织品。为了促进纺织业特别是毛纺织的发展，培养纺织方面的实用人才，经校长主持的校务会议决定，东北大学于1929年成立了纺织学系。该系主任是张佑（留美纺织学硕士）。

纺织系的课程设置基本与美国麻省纺织工科大学的课程类似。主要有英文、德文、定量分析、织物分析学、纤维工艺学、机械制图、机械学、有机化学、应用力学、色染学、花样设计、织物学、电工学、水力学、图式力

学、热机关学、材料力学、纺织工厂工程、汽机锅炉、原动工厂学、工业簿记、经济、整理织物理学、工厂管理、棉花、羊毛、工业法等课程，同时还设有编织学、纺织物品核价法、丝绒学、三合土 4 门选修课。同时，建立了纺织实验室。这个纺织实验室大概花费 30 余万银元，实验室的全部设备均由美国进口，棉纺织设备从清棉至精纺，均采自怀特公司生产的新设备，其规模相当一所小型的纺织厂。在此基础上，计划用 5 年时间建立起纺织研究院，广招全国精英，培养高级纺织人才。

1931 年，在宁恩承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期间，经张学良校长同意，决定把小河沿医院（又称施医院，由苏格兰施大夫 Dr. Christis 创办的教会医院）和所属的医科大学并入东北大学，改为东北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原有教职员仍保留原职，扩充医疗设备，经费由东北大学与当地政府商定供给。6 月中旬协议商定后，准备同年 10 月举行换文仪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大学开始流亡，合并没能实现。

东北大学早在 1931 年 7 月就开始在教育学院设立家政专修科。九一八事变后停办。1934 年上半年在北平筹建了女子家政专修科，并于同年暑期开始招生，考试后，录取 60 名女生，这是家政专修科第一班。家政专修科的创始人是张学良校长的夫人于凤至，所有办学经费都由她个人资助，招收对象限于东北籍女学生，宗旨是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学制定为 3 年，课程除一般的文科课程（国文、历史、哲学、经济学、英文）以外，还设有家政学、服装、烹饪学、儿童教育、妇幼保健、音乐等课程。聘请的师资都是当时知名的教授。

家政专修科第一班的学生于 1937 年暑期如期毕业。1935 年招收的第二班学生在校学习了二年，未及毕业，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东北大学被迫迁往西安，家政系也被迫停办。

1933 年，东北大学把外国文学系改为边疆政治系，下设俄文组和日文组。专门研究日本和苏联问题，以适应形势的需要。特别是俄文组，聘请进步教授曹靖华、王之相等来校任教，学习课程有俄国文学等，因而能看到苏联的《真理报》《红星报》等报纸及《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使学生们受到启发，对了解、研究苏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无产阶级革命逐步有了认识。除极少数学生外，大多数学生都倾向进步，并成为后来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骨干。

东北大学在增添新学科、开拓新领域的同时，也十分注意重点学科的建设，如化学系聘任留美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庄长恭（字丕可，后在南京中央研究所工作，1948 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化学系主任，6 名教授全为欧美留学生，其中 4 人具有博士学位，如余泽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纪育澧（美国耶鲁大学化学博士）、赵仁铸（瑞士狄立西大学化学博士）。还建成了设备、仪器、药品完备的全国一流的实验室。当时，东北大学化学系在全国声誉很高，为我国的化学研究和化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此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生产实践教育。东北大学创立后，为了给理工科的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开始筹建东北大学工厂。1924 年 1 月，一方面选派留德工学博士赵厚达赴德国购买机械设备，另一方面组织专家规划厂房建设、机械安装及工厂人事组织等工作。1924 年 5 月，

由奉天省署划拨北陵长宁寺土地 210 亩为厂基开始兴建，后又拨地 128 亩扩大厂区。1926 年 4 月，工厂各项建筑、机车制造及修理所需的机械设备安装基本竣工。

1926 年 7 月 1 日，正式启用东北大学工厂厂章，工厂正式营运，由校长委任留德博士杨毓桢为厂长，工程技术人员与职工近 700 人。到 1930 年，工厂资本总金额为奉大洋 370 余万元，折合当时国币（现大洋）170 余万元。东北大学工厂下属的工场分别是土木系修客车工场、修货车工场、木工场，铁工系镗工场、铆车工场、气锤工场、修锅炉工场，原动系发电场、原动系锅炉场，印刷场等。

各工场生产范围包括制造各种客货车辆、机车及其附属品、铁路应用各种工具和各种工作机械，修理各种机关车及各种工作机械。仅铁工系到 1930 年就为铁路的吉海、沈海、四洮、齐克等线安装机车 25 辆、货车 695 辆、行李车 4 辆。为京绥、洮海、北宁、齐克、吉敦等线修理机车 51 辆、客车 28 辆、货车 192 辆。全厂 1927~1928 会计年度获纯利 343.96 万元（现大洋）。一方面为东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经费，另一方面又为学生生产实习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东北大学工厂从创办时起，就多次申明：“主要是供大学工科学生研究学术、实地实习之场所”。东北大学副校长刘凤竹在给《东北大学工厂概要》作序时写道：“原夫大学工厂之设也，以供大学工科学生研究学术，实地练习为体，以修理各铁路机货客等车裨补交通为用。体大用宏，所关綦重，原与其他工厂只图营业牟利者有所不同。故余秉承张汉卿校长兴学重工之意，措施工厂政策注重要有四点：一设备贵完备；二管理贵严

肃；三工人贵勤巧；四制造贵精美。”^[5]据 1929 年在东北大学读书的校友回忆：当时学校规定了学生下厂劳动时间。学生到机车修配厂，穿上工作服，和工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修理破损部分，安装新的配件，最后机车轰隆隆地开出去。学生们看到自己双手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时，发自内心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

东北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十分注意实习环节。工学院在其《教务概况》中明确指出：“教学方法特别注意实习实验，除平时利用各实验场及大学工厂外，每年寒暑假两假例送本科学生于各大厂各矿场各铁路及其他公用机关实地研习，以为将来实际从事各项事业之准备。”如纺织系就要进行色染学、电工、原动工厂实习。采冶系的实习有定量分析实习、矿物实习、岩石学实习、地质实习、水力实习、试金术实习、电工实习、选矿实习、冶金分析实习和工厂实习。它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培养“实用人才”所必需的。

东北大学为了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欧美进口大批教学实验仪器，建立起全国一流的、设备完善的实验室。到 1930 年，全校共有实验室 39 个，包括天文学系的天文观察测验室，物理学系的力学实验室、热学声学实验室、电磁学实验室、光学实验室、暗室，化学系的普化实验室、定性分析实验室、定量分析实验室、有机化学实验室、物理化学实验室、烧科分析室、气体分析室、电气分析室、天秤室，生物学系初级课程实验室（2 个）、微生物学实验室、分类学实验室（标本 16401 件）、植物种植温室、昆虫饲养室，电工学系有电量测定室、电机实验室、无线电实验室、电报电话实验室，

采冶学系有地质实验室、冶金分析实验室，纺织学系有棉纺实验室、毛纺实验室、织布实验室、针织实验室、印染实验室。理学院的仪器、标本、药品有 5650 种、23937 件，药品重量为 3487 磅；工学院的仪器有 10150 件，总共价值为 756604 元大洋；理学院物理系有价值贵重的仪器，像显微量微器、白金电阻温度表、光带测光器、定晶体隔电系数器；化学系贵重的仪器有各种型号的天秤 14 件，各种白金锅、白金阴极等 38 件，各种石英器皿 34 件，放射性检验器、蒸气密度测定器、爆炸管炉等；天文学系的窥远镜、天顶望远镜等。这些实验设备和仪器，在全国高等学校中，也是很少有的。为研究高深学术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提供了可靠保证。

东北大学的实验课要求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完成实验。据老校友回忆，那时的实验课，没有实验指导书，没有图表，也没有数据，进行实验时，要自己去制定实验原则，自己设计图表和实验步骤，自己去查找各种数据，教师只是在一旁进行一些启发式的指导。实验完毕后，交教师批阅。如果做的实验结果不对，必须重新做，所以有的同学的实验可能做上二三次，甚至四次。这种做法对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建筑学系成立后，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教学方法。学生每 4 周完成一个小设计。比如设计一套住宅，是西洋式的，还是中国古典式的，有多少居室，房间的结构怎样，屋内的装修如何，等等。由教师提出总体要求，然后由学生独立完成。草图试作阶段，关闭图书室 48 小时，不许看参考书，因为最初方案代表学生的创意和水平。第一次上交后，大的格局已定，不允许改动。

然后经过认真思考，不断修改，有所损益。这时才可以广泛看书，收集资料，以补不足。绘出正式设计图样（彩色与墨色均可）。第四个星期六下午4时上交，经过教师审查，集体进行评议，同时将全体同学的设计图公布于教室内，分别由同学提出设计的优缺点，以便互相有所借鉴。

1929年张学良校长决定在东北大学设立农学院，以适应东北农业发展的需要。在办农学院的过程中，他曾尖锐地指出，一些学农科的学生毕业后，不继续从事和研究农业，不与老农一同耕田，那种学习是难以强国，也难以为民造福的。并强调“希望你们能常到农村去，知道他们的思想如何？心理如何？作将来可以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准备。”^{[11]1953}农学院成立时，恰逢燕京大学农学院中途停办，东北大学遂将燕京大学的一些教授聘请来校教学。此外，还从燕京大学接管了几个型号的拖拉机（当时叫做大犁）和各种作业机械，以及从美国引进的优良种牛。学校还将校舍以北直至体育场的340亩土地均划为实习农场，供学生实习用。

东北大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不仅在理、工学院系得到实施，就是在文、法、教育院系，也是如此。学生经常接触社会，为社会需要而学习。例如，俄文系的学生去哈尔滨，住在俄侨的宿舍里，以便练习俄语。文、法学院组织学生赴北平、天津、江浙等地参观，以便了解社会。

高质量的人才培养还必须要有完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为此，学校在张学良校长的关怀与支持下，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如教务总则、奖学总则、惩戒总则、教室规则、宿舍规则、学生集会规则等。为了培养“实用

人才”，东北大学建校后，一方面推行一套从严治校的办法，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以此提高教学质量，打好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遵循“知行合一”的校训，勇于实践，实行理论与劳动实践相结合的学以致用教学模式，并为此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活跃学术氛围，东北大学还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和专家到校演讲或作学术报告。如邀请法国科学院永久书记兼国际研究会总书记拉尧华博士讲授“火山之现象”，美国教育设计专家克伯莘博士讲授“教育变迁及其在教育上的意义”，英国威尔大学外交历史学教授非卜司特讲授“中英关系与英国新政策”，法国里昂大学中国文学主任马古烈博士作“中国文学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学术报告等。至于国内的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的次数就更多了。如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来校作长篇讲演，奉海路技术长陈萌轩讲“奉海路的工程”，吴碧柳讲“政教分合论”，赵明高硕士讲“列国对华之联合政策”，建筑工程师杨建宝讲“建筑工程的问题”等。

总而言之，张学良校长的知行合一、崇尚实践的思想贯穿于他发展教育的全过程，并具有一整套的措施和体系。更重要的是他言行一致，身体力行，贯彻始终，这就越发显示了他教育思想的生机勃勃和强大生命力。

2.2.3 建立较为完整的教育系统

张学良支持和创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较为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以及社会教育体系。

创办新民小学。为了在黑山创办新民小学，张学良将军于1929年4月29日亲自修书给当时的黑山县县长

王汝山（字俊峰）和教育共所所长往日宣（字祝三），信中说：“睽隔雅范，时切驰思。遥维近鉴民奉省人民知识浅陋，而其原由，端在教育之不普及。兹拟在各县酌设新民小学若干处，籍使失学儿童，均有受教育机缘，惟是需款过多，决非一人财力所克担负，故拟将该小学筹办经费，如觅定校舍，购置桌凳等项，统请各县自行筹备，至经常费用一节，则由学良处按日发给之夙仰。台端对于教育，素具热心，如蒙赞同，希即裁复得办理一切也，专此奉闻，顺颂。”

按照张学良信中的内容，当时黑山县政府进行了认真研究，成立办学组织，筹集办学经费，确定在黑山县城、高山子和八道壕（矿）设立三所新民小学，1929年筹建，1930年开学。新民小学的建立把黑山县教育推向了兴盛时期，据1931年6月4日统计，黑山全境中小学校由1928年的256所增加到298所。3年内新建学校42所，为普及教育、培养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鉴于中国妇女长期受压迫、受歧视的社会状况，张学良认为中国要独立，社会要发展，就必须唤醒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所有民众的觉悟。因此，他在戎马倥偬之际，十分注意女学的兴办和女子教育。

创办同泽女子中学。1928年，张学良捐资创办了同泽女子中学。他在为辽宁《同泽女子中学一览》所题并言中写道：“吾省恒之大，而女校无几”“桑梓之地，如何可忘”。振兴教育，普及女子教育，建设家乡是张学良创立同泽女中的目的。他号召女子读书自强，号召官民兴办女校培养人才。张学良为《同泽女子中学一览》写的并言表明：“尝慨吾国旧俗，女子惟议酒食，习缝纫，而不读书。其读者，又惟学刺绣，工词章，而鲜实

用。今学校制度，盖因时而制宜，诸生能循序而深造焉，则可以强国而保种，宁独一人一家之计而已。”张学良认为女子不应只是学习刺绣填词，而更重要的是学习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国家为民族的富强贡献力量。这就把对女子教育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不仅体现了张学良破除男尊女卑，树立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也体现了为实现强国大计，也要使妇女并驾齐驱地跻身文化科技行列的无私愿望。

东北大学初建之时，东北各高等院校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影响，均不招收女生。东北大学校长王永江也反对男女合校。他认为：“要男女合校，古训可没有这一条，我宁可校长不当，也不能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儿。”^[6]张学良就任东北大学校长后，一改前任的作风，大胆改革，取消了东北大学禁招女生的规定，并于1928年招收女生50余人，1929年达到108人。虽然女生在学校中所占的比例还很低，但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树立了新风尚。从此以后，女性求学比例日益提高，对辽宁乃至东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开展继续教育。推行在职成人教育，使有志之士在工作之余，仍有机会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广开传播知识的渠道，展开成年人的继续教育，是张学良教育实践又一个光辉特色。他创办东北大学夜校专修科，招收在职公务人员，设有政法与数理两个专修科，学制为三年，夜晚上课，经过毕业考试后，发给大专毕业证书，再去从事他们专业特长的的工作。为加强师资力量，另设师范专修科，学制亦为三年，为鼓励接受继续教育者献身教育事业，均享受公费待遇，毕业后，担任各中学教

师。这种接受继续教育的思想，张学良从知识不断更新、深化出发，同时向在校学生宣传学无止境，学校学习只是打基础的观点。由于对知识本身拥有无限潜力的认识，张学良即早抱有此想，他毫不掩饰对继续从事学习的向往与热爱，他在对东北大学学生讲话时就公开说：“就是我内人亦欲她往东北大学受教”。充分表达了他对接受知识再教育的热切之情。对这种教育思想，张学良在 1926 年主持华北政局时，曾有过一次惊人的发挥。现在看来，该倡议虽然未能实现，但历史证明，他的成年人要继续受教育的思想是何等正确、有远见和胆略！事实是，当时清朝逊位皇帝溥仪住在天津，张学良从他一贯的善良愿望和纯正的动机出发，曾郑重其事地劝过溥仪，要溥仪把周围的老臣去掉，下决心甩掉他周围的旧思想、旧文化，放下架子去南开大学学习，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这样才能更新观念，才能热爱这个国家，当一个新的公民，于国于民有利而无害。溥仪当时没有采纳，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做法表面看来是一种奇想，但却让人们看到张学良对现代知识文明和科学技术所具有的力量抱有多么热切的向往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兴办军事教育。1922 年张学良出任东北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东三省讲武堂监督时，就开办了多种军事教育班，以提高部队的文化军政素质。他认为，振军威就是振国威，而军威从根本上说，就是提高军队的整体军事素养。为了实现其“健身强国，抵御外侮”的目的，在军事教育方面他曾提出过一系列主张和措施。其中主要有：注重军事训练与身体训练相结合；整编军队、检验体格、汰弱留强；提倡体育竞赛、开展军事体育活动；组织每年的北大营、东大营的阅操以及提倡在

讲武堂设武术、马术、劈剑、体操等课程。

从以上各种教育看，都离不开经费的投入，否则便是一句空话。1928年张学良主政后，尽管金融需要整顿，财政仍有困难，但教育经费不仅不减，反而大幅度增加。以辽宁为例，1928年教育经费为528万现洋，1929年则猛增至1635万现洋。“办教育，经费困难，资金缺少，这在旧中国的教育界是极为普遍的，即使名牌大学，如北大、清华也不例外。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清华大学70万银元，加上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银元，南开大学才只有40万银元，而东北大学则高达160万银元。”^{[7]234}只要办学需要，张学良能拨款就拨款，拨款不方便，就自己捐款，先后为创建小学、中学和修建东北大学捐款达数百万银元，还另捐500万银元作汉卿教育基金，几乎把父亲留下的钱全捐出去了。另外，在他看来，办教育经费固然重要，但教师比经费更重要，教师是教育之本。因此，他采取高薪聘用教师的政策，中学教师月薪为80~120银元，主任、校长为180~200银元，是一般公务员的三四倍^{[7]83}，东北大学教授一般月薪为360银元，最高达800银元，当时南开大学教授为240银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月薪为300银元，而平津一些大学教授又受减薪、欠薪的困扰，办学“经费充足待遇高，这是东北大学的一大明显特点”^{[7]234}。

为了进一步普及教育，张学良个人出资成立了汉卿教育基金会。在辽宁教育困难之际，张学良除了设法筹增各级教育经费之外，以其对教育事业的极大热情，个人出资创办各县新民小学、男女同泽学校，扩建东北大学，并慷慨捐出家财现大洋500万银元之巨款，用以补

助全省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经教育厅厅长王毓桂与教育会教育界人士协商，一致同意把这笔捐款作为补助辽宁中小学教育事业之永久基金。于 1928 年 11 月，由张学良邀请董事，组成了“汉卿捐助奉省中小学教育基金董事会”，会址设在沈阳西华门外省教育会院内，作为保管及处置此款之机关。其董事会成员如下：

董事长 张汉卿（张学良）

副董事长 袁洁珊（袁金铠）

执行委员 冯子安（冯广民）

（固定执行委员为每届的教育厅厅长和省教育会会长充任）。

同时制定了《汉卿捐助奉省中小学教育基金董事会章程》。（参见附录 C）

据统计，1929 年度的教育经费，省为 180 万元（包括教育厅经费、留学经费、省立中小学及图书馆经费、扩充省立学校建筑费等项），县为 411 万元，张学良捐助的这笔巨款，几近全省全年教育经费之综合。这不仅是雪中送炭，解救全省教育之困危，而且有力地振奋激励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惊人之举，当即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教育界同时致谢，世人高度评价，齐声赞颂。1929 年 1 月 1 日，奉天省教育会发出通电，将这条重要消息通告全国，电文如下：“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部院钧鉴：各省政府、各省党部、各总司令部、各法团、各报馆钧鉴：勘乱用武，治世尚文，文化之兴，端资教育。慨自国事蜩螗，频年战乱，弦歌屡辍，讲座尘封，国家多失学之青年，学校乏基金之储蓄。我长总司令汉卿惻然悯之，慨捐国币五百万元，作为奉省公立中小学校教育永久基金，发商生息，即以常

年息金补助教育，并组织董事会保管支配，藉示昌明文化之至意。叔季之世，货利交争，求能先公后私见利思义者，已属寥寥，至若捐私财公益牖民辅世，兴学育才，宏胞与之怀，树自强之计，尤旷世难睹。我张总司令超然远览深识，默察时势，顺应潮流，以为偃武首贵修文，投戎专资讲艺。爰解私囊补助文化，缓带轻裘，羊叔子之流风未泯，敦诗说礼，晋中军之遗风可钦。当此训政时期，好善之心谁不如我所愿，建设伊始，闻风响应，应继起有人。播之风声，蒸为习尚，成多事士于百年，奠国基于万祀，尤为敝会所馨香祝祷者矣。奉天省教育会。东印。”^[18]

“汉卿捐助辽宁中小学教育基金会”的成立，是张学良对辽宁教育事业的重要贡献，是他“教育救国”思想的实践，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张学良普及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辽宁创办了不少学校，其水平都高于一般学校，起着良好的示范作用。（参见附录 D）

第3章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体育、美育与群育

张学良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但怎样育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他极为关注的问题。张学良教育思想中的育人方针是很明确的，即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全面发展。教育发展的历史证明，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教育，而且在同一社会形态下，各国教育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张学良的“五育并重”办学指导方针，对于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不仅在历史上有过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指导意义。

3.1 “健身强国，抵御外侮”的体育观

体育，是授予学生体育运动的知识、技能，增强其体质，发展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培养爱国尚武精神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体育既关系到学生的身体健康，又关系到国家、民族兴衰的大业。张学良的体育思想与实践在中国体育史上，特别是在东北体育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

从历史上看，原始教育作为生产技能和生活经验的传授，本身包括体育。奴隶社会的教育仍很重视体育。如商、周时期，包括孔子教育中的射、御是主要学习内容之一。其所以如此，是奴隶主更多地需要武力征服奴隶的缘故。到了封建社会，因为地主阶级子弟一般不参

加战争，重文轻武成为社会习俗，体育从学校教育中被排斥出去。中国自西汉始，官学、私学一律只授经书，培养白面书生（统治阶级培养战争指挥员，另设武馆）。改革数千年的这一恶习，从理论和实践上，把体育重新纳入学校教育中，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和具有爱国尚武精神的人才，是张学良将军教育观中最光彩夺目处之一。张学良对体育强国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体育之于个人可强身健体；对于国家则可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团体的群力对外竞争。因此，张学良在体育事业上的作为颇多，也充分显示了体育强国的正确性。

3.1.1 重视和发展体育的目的与作用

“倡导体育，造成复兴民族之生力”，是张学良重视和发展体育的根本目的。复兴民族是张学良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他特别强调：“倡导体育的最大目的是在造成复兴民族的生力”^{[11]825}。其基本内涵有以下几点。

（1）重视体育教育能够培养国民为国争光意识

张学良认为，通过体育运动，可以扬校威和国威，培养国民为国争光意识。因为体育运动是對抗性的活动，竞争是体育的突出特征，争荣誉、争锦标是体育竞争的主要表现。对此，张学良曾这样说过：“要以争锦标的心来争国家的生存，要以争荣誉的心来争民族的复兴，把个人或团体所争的对象，变作整个国家民族所争的对象。”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期间，以东北大学为中心的体育运动蓬勃兴起，在多次的重大比赛中取得的各项优异成绩，对于当时鼓舞人心、振奋民族精神，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大学重视体育，成为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振奋民族精神、御侮图强的有力措施。体育与德育、智育并重，可以培养学生自强、自立、竞争精神和现代意识，它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而且对校誉、校风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 重视体育教育能够培养国民团结合作的精神

张学良论述体育的国家民族精神时说：“体育一事，很足以代表国家民族的精神。我在欧洲的时候，曾参观过意、英两国业余队比赛足球，当着比赛的时候，英国队员无论是对于自己或对方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都是极端沉默，向无一言；意大利队员方面，争胜负的心则比英国队员为强，每逢他们输一个球，总必对于守球门的人肆意责难。此虽细事，却完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精神和民族的特质。我们在这方面应当有训练，竭力去掉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性劣根性。譬如比赛足球，我们踢不过人家，而终归失败了，应当虚心的承认我们本身技术的不良。如果徒事局部的苛责，那除破坏自己的对外阵线和暴露自己的弱点之外，绝没有一点益处。我们中国人对于一般事情实在都犯这个毛病，每忽于团体的群力的对外竞争，而徒事对内作无谓的责难，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最大的弱点，这也是我们应当悔改的。我希望你们作运动员的要深明斯义，勇于对外团体的竞争，力避己方合作精神的破坏。”^{[1]696-697}

(3) 重视体育教育能够增强国民的身体素质

张学良将军重视体育教育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救国救民。他认为“增强国民体质，有利于抵御外侮”，可早日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在国难当头的艰苦环境下，要求东北大学“愈知效忠于国家”“明耻

自强”。张学良说“我们深知运动的最大目的是在倡导体育，而不是只在个人或少数人出风头。倡导体育的最大目的是在造成复兴民族的生力，而不是在奖励体育上畸形的发展。在过去一般倡导体育的人士，是多半注意到青年学生的体育训练，而一般青年学生也多半是在学校里对于体育的兴趣特别浓厚，离开学校之后，每和运动绝缘，忽视了自身的健康，这种现象是必须力加纠正的。我们应确认国民体育必谋绝对普遍的发展，而在每一个国民的人生过程中，都须永远注重体育的讲求，那才能造成一个健康而有生气的民族。在本会确是很可表现出这种意义，这里有生气蓬勃的青年学生来参加，也有各界市民来参加，这可以表现出体育发展的均衡。尤其是今日的青年学生，应切记今后纵然要离开学校，而终不失为市民的，那么，就必须长此保持这种生龙活虎的精神，造成铁骨铜筋的体魄，要作复兴民族最前线的有力斗士。一般市民更应深知今日的盛会，是充分表现出运动的民众化，这是很值得庆幸的，必须要把这种精神扩大并继续下去。”^[1]₈₂₅₋₈₂₆ 1928年9月，张学良对东北大学学生训话时说：“我今天与诸位说的，首先是提倡体育。说起来，中国的体育界，大多数不甚注意学校中的体育，因此，学生多失之软弱。我很希望本校关于体育方面要特别注意，然后，用健全之身体，好求精妙之学问。所以，体育是不可轻忽的。”^[9] 张学良将军重视体育教育，还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敢与洋人争雄，扬国威。从1928年起，在张学良校长的倡导和支持下，建立了各项体育代表队。先后派足球队、篮球队赴哈尔滨、南京、上海、日本的东京等地参加国内外频繁的大型赛事活动，而以东北大学为主体的辽宁田径队，强手

如林，威名远震。

(4) 重视体育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张学良看来，体育教育不仅可以促使学生全面发展，而且可以保证办学结构的合理性。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因而需要全面发展的学校。东北大学培养人才为适应社会之急需，不断向综合方向发展，它不仅设有文、法、理、工学院，而且设有农学院、教育学院，1929年又增设体育专修科，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体育人才。这种办学结构至今仍值得我们效法。当前，我国为了实现《全民健身战略》和《奥运战略》，急需大量高水平的师资和运动人才，一些条件较好的重点大学完全有必要、有能力开办体育系（科），建立（或试办）高水平运动队，从而把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搞得更好。20世纪30年代，东北大学体育威震全国，全国体育界谈到辽宁，谈到东北大学，无不称赞。今天国内许多重点大学能兼办理、工、文、管等系，也应考虑举办体育系科。

张学良将军的体育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东北大学创建了体育专科，聘请体育名流郝更生任科主任，聘留美归国的体育专家吴蕴瑞、宋君复、申国权等任体育教授，以及聘篮球国手孟玉昆和武林高手李剑华等任教，为提高体育教育水平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8年10月，在东三省联合运动会上，东北大学的突出成绩引起了东三省保安司令兼校长张学良的注意。1929年10月，德国田径队来东北参加比赛后，张学良又以重金挽聘德国田径队长、当时五千米世界纪录保持者步起先生留东北大学充任体育教练兼讲师。为了

使步起欣然受聘，张学良当即答应每月发给其薪金白银800两，并配给马匹、轿车供其专用。步起受聘后，张学良又派人将步起之未婚妻从德国接到沈阳，并为他们完婚，同时拨出两座洋楼，供步起夫妇居住。优厚的待遇使步起盛情难却，只有竭力为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效劳。刘长春被招入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后，学习、训练都很刻苦，得到德国教练步起的偏爱，其百米成绩迅速提高。不久，刘长春就在第十四届华北地区联合运动会上初露头角，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大显身手。张学良为此特批准每月给他30元补助费。此后，刘长春曾两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启了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先河。

此外，张学良还特别注重体育教育，强调抓社会体育、军事体育、学校体育三个方面，以便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除了思想上重视外，还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不断投资。他的许多慷慨允捐之举，不仅成为世人佳话，被人们流传，而且也直接激发了人们开展体育活动的热情，使东北的体育——这一文明事业——虽然历经沧桑，但始终保持它生命的活力。1928年至1930年是张学良早期倡导体育活动最活跃的阶段。其中，频繁地举办体育赛事、支持国内大规模运动会既是他体育强国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他体育强国观念形成的主要源泉。而对于东北的体育发展来说，赛场上的角逐，既检验运动水平，又不失为向先进学习和促进体育运动水平提高的有效手段。亲身经历过多次早期体育赛会的我国短跑名将刘长春回顾到：“借着张学良热心奖励的力量，东三省的体育，乃从阴郁的境域转向勃兴。”东北体育队伍很快在国内异军突起，咄咄逼人。

多次与中国比试的日本选手面对新的东北体育实力，也不得不刮目相看。通过丰富的体育实践活动，张学良将军的体育强国思想观念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基本形成。

综上所述，张学良绝不是单纯重视和发展体育教育事业，他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从战略的意义上认识体育、倡导体育、发展体育的，通过发展体育来强国强民，从而为复兴民族奠定物质和精神基础。张学良将军早期倡导的体育强国思想，对东北体育事业乃至全国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3.1.2 举办或承办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

(1) 承办第十四届华北联合运动会

张学良亲自和帮助组织了很多大型赛事，其中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还有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北体育的发展实始自张作霖遇难，张学良起而继父业的时候。张作霖在世时，因为内讧频仍，无暇顾及教育，就是那一年一度的华北运动会，也曾被战乱中断数次。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时，他在北陵开辟了一处高尔夫球场，并建立了一所国际网球场，自己也常到那里消遣，借着张学良的热心，东北的体育从阴郁转向勃兴。

华北联合运动会由华北体育联合会主办，轮流由华北各省会城市承办。第九届华北联合运动会之后，因连年战祸中断了几届。按照华北体育联合会的规定，第十四届华北联合运动会于 1929 年 5 月在辽宁省城沈阳举行，省政府出资承办。会场定在东北大学理工学院体育场，东北大学负责筹办。为了迎接第十四届华北联合运动会，张学良倡议东北三省召开一次联合运动会，作为参加华北联合运动会的预选赛。1928 年 10 月，在奉天

举办了第一次东三省联合运动会，由冯庸大学承办，地点在冯庸大学体育场。参加单位三省共 54 所学校，934 名运动员。奉天省人数最多，其中奉天市内 20 所，省内其他市 17 所，加上吉林省 10 所、黑龙江省 7 所，共 54 所学校。54 所学校中，有大学 4 所、女校 4 所。张学良亲任运动会会长，组织工作、食宿安排都非常令人满意。大会虽然只进行了两天，但对东北各省体育运动之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929 年 5 月 29 日，第十四届华北联合运动会在东北大学理工学院运动场正式召开，6 月 5 日结束。参加本次赛会的单位包括东北地区的辽、吉、黑三省，关内的冀、鲁、豫、绥等省以及平、津两市的大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学共 138 所、1421 名男女运动员，盛况空前。张学良将军亲任名誉会长，其夫人于凤至女士为名誉副会长。赛会开幕时，在东北大学运动场举行了隆重开幕式，张学良将军未能莅临，其弟张学铭代表他致欢迎辞。下午 3 时，张学良赶到，并身穿短袖白汗衫、短裤下场参加了跳远比赛，全场欢声雷动，为他加油。是会，刘长春在百米决赛中，创 10.8 秒的好成绩，成为当时全国最高纪录，在远东也是较好的成绩。

(2) 举办中、德、日国际田径对抗赛

为了提高运动员田径比赛的技能和水平，张学良还特邀德国和日本一流水平的运动员来沈阳，于 1929 年 10 月，在东北大学学良体育场——罗马式马蹄形体育场——举行了中、德、日国际田径对抗赛。来自德、日两国的运动员均是国家队成员，中国田径队的成员是以东北大学田径队为基础组建的。张学良为了鼓励中国运动员赛出好成绩，事先在德国制作了一批镶有他本人头像

的金壳怀表，准备赠给获奖的优秀运动员。在中、德、日三国田径对抗赛中，中国运动员刘长春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在 100 米决赛中，以 10.7 秒的成绩战败德国短跑健将、日本“短跑怪杰”吉冈隆德和“飞毛退”冈健次郎，刘长春名列第二；在 200 米决赛中，以 21.6 秒的成绩名列第二。当时，刘长春的短跑成绩是远东地区的最好成绩，是他使中国人第一次登上“远东短跑之王”的宝座。后来，刘长春在回顾中、德、日三国田径对抗赛时说：“面对国外强手，为国争光的强烈民族感和爱国心，时时激励我在百米跑道上拼命地向前冲，超过日本人！超过德国人！这是我奋斗的目标。”^[9]

(3) 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1930 年在杭州梅东高桥举行了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东北当局派遣了百余名选手参加，以东北大学为骨干的辽宁田径队，在这次运动会上，从百米到万米的各项比赛，辽宁队均占有很强的优势，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共设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网球、棒球等项目。这是自 1910 年旧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以来华北地区派出的第一支参加全国运动会的代表团。这次全国运动会上，辽宁运动员大显身手，其中田径成绩最为突出。在男子十九项比赛中，辽宁共得六项第一。其中，刘长春一人夺得了三项（100 米、200 米和 400 米）第一。刘长春的短跑成绩当时世界排名是前 10 名之内。为了纪念他取得的优异成绩，杭州市把通往田径运动场的大马路改名为“长春路”。张学良校长为了表彰刘长春的成绩，向他颁发了一项特别奖，“即除照常享受体育系的公费待遇外，每月发给特别津贴 30 元现大洋”^[10]。

(4) 举办东北四省第一届田径运动会

1930年10月11日至14日，在沈阳东北大学体育场举办了东北四省第一届田径运动会，张学良将军亲自担任运动会会长，其夫人于凤至任副会长，张学良将军亲临大会致开幕词，并在开幕式的最后一项——运动员、裁判员、大会职员绕场一周——时，偕夫人于凤至从台上走下来，排在整个队伍最前面。随着军乐队演奏的乐曲，绕场一周。会场上，两万多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次比赛的规模在东北体育史上是空前的，共有96个单位、106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成绩较好，有四个项目破了全国纪录。

(5) 资助刘长春等参加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张学良将军是将中国田径运动推向世界第一人。1932年，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洛杉矶举行。中国虽然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员，但在此之前，从未派过运动员参加比赛。大会前，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抢先宣布将派出刘长春、于希渭两名选手代表“满洲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亦复电表示接受。受张学良对东北体育的奖励而成长起来的刘长春不愧为张学良的学生，当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表示不代表“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此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却仍以无经费和准备不足为由，不准派运动员参赛。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期迫在眉睫，全国上下，尤其是青年学生，民族情绪十分高涨。怀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的张学良将军慷慨解囊，出资8000银元，作为资助刘长春等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费用。并于7月1日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毕业典礼上，亲自宣布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和于希渭

为运动员、体育教授宋君复为教练员，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经中国体育协会急电奥林匹克运动会报名，粉碎了日本的阴谋。于希渭由于日方的阻止和监视，再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刘长春、宋君复等准时抵达美国的洛杉矶。比赛中，中国唯一的运动员刘长春虽然因长途跋涉影响成绩而被淘汰，但他却第一次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大赛中留下了中国人的脚印。这里张学良将军起的作用，自不待言。

重视体育教育、大力发展体育运动是张学良教育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保家卫国，生产学习，健康身体是根本。他坚信“健身强国，抵御外侮”，他认为，“用健全的身体，好求精妙的学问”。他本人喜好各种运动，尤擅长网球和高尔夫球。这种积极参与真是身教比言教更具有说服力。在校内成立运动队，吸收优秀运动员，使得有突出成绩的运动员可以在高等学校获得专业训练，如对于著名短跑运动员刘长春、长跑运动员陈伯林给予这种待遇。由于大力提倡体育，一些运动员在竞赛中战果辉煌，功课仍颇有成绩，当年东北大学名气不小的足球队就是这样的。此外，张学良还能礼聘体育专家，如郝更生、吴蕴瑞、宋君复和申国权等，把这些专家团结在自己周围，于是推动了轰轰烈烈的体育运动。他不惜巨资建立大型运动场，引进先进器械和设备，开展各种比赛。他培养并出资支持刘长春、于希渭和教练宋君复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别是在东北为日本侵占后，日本编造流言蜚语，散布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出席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了击破日本人混淆是非的阴谋，张学良采取全力支持、资助和大张旗鼓的宣传做法，因而在我国运动史上，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

使遭受外患的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他积极支持并赞助全国运动会和华北联合运动会，并亲自担任华北运动会及东北四省田径运动会的会长。培养了一些著名的运动员，并且在各种大型运动会上，都获得了优异成绩。例如，在第十四届华北联合运动会和中、日、德田径对抗赛上，表现优秀的运动员有刘长春（100 米、200 米和 400 米），姜云龙、陈凤生（1500 米、5000 米和 10000 米），萧鼎华（跳高、三级跳和十项全能），还有刘先举的低栏、傅宝瑞的跳远、赵德新的 10000 米等。

3.1.3 加强体育“软”“硬”环境建设

张学良看到了体育运动对增强人民体质，使国家强盛的重大意义。为了进一步促进体育的发展，他毅然投入大量资金，重金聘请外国教练，发展体育教学，培养部分体育专家和大批体育骨干，使体育运动有了坚实基础。同时兴建新型运动场，购置各种先进体育设施和器械，不但创造了让学生锻炼具有健全体魄的条件，而且尤以他敢于走出国门，虚心向先进国家运动员学习，与其展开竞赛，使体育运动事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丰功伟绩，有口皆碑。可以说，在中国运动史上，写下了善学先进、借鉴外国精华的新篇章。

(1) 开设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

张学良认为，要推动体育运动发展，就要注意培养人才。1929 年 5 月，体育界人士向张学良建议在东北大学开设体育专科，培养体育专门人才，张学良深为赞赏，并表示积极支持，遂令东北大学教育学院筹备一切。9 月，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正式开学，招收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及东北大学预科学生计 51

名为第一期学员，学制为三年。1930年，又招收50名学员为辽宁省体育班，学制定为两年。张学良视体育专修科学生为东北体育的中坚，倍加爱护，着力培养，特给予公费待遇，使一些具有体育专长又无力读书的学生获得深造的机会。

② 兴建各种体育场

张学良多次拨款、出资在沈阳兴建各种体育场，这对于推动东北以至全国体育事业的振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1年在沈阳小河沿修筑新式体育场。为了在辽宁举办第九届华北联合运动会，张学良令东三省官银拨款，于沈阳小河沿修筑新式体育场。事前，张学良筹备一切，并在修筑期间，经常偕同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吴励忱前往现场督工指导。继而，张学良又拨款在沈阳北陵开拓了一处偌大的高尔夫球场，并建立了一座国际网球场。

修建张学良体育场。1929年，张学良校长捐资30万元，在东北大学校园北部修建一座有钢筋混凝土看台的大型体育场，该体育场是由张学良校长捐资建筑的，故得此名。又由于其主席台为罗马式建筑风格、看台为朝南开口的大马蹄形，因此，人们又称它为罗马式马蹄形体育场。该体育场由东北大学建设委员会会长关颂声先生设计，法国一个建筑公司包修，建筑费24万元。建筑面积为3189平方米，场内跑圈半英里，可容足球场一、篮球场二、网球场二，看台可容纳数万名观众，该体育场于当年6月开始施工，1930年10月31日竣工，并通过验收。这是当时“中国北部唯一最大的运动场”。

东北大学迁到四川三台后，全体师生继承和发扬了东北大学注重文体的优良传统，在校部东北隅租佃农田数十亩，修建一座标准的田径运动场，不仅供校内使用，而且为城区各中学和市民提供了运动场所，学校体育运动也很活跃。1943年2月，东北大学为庆祝建校二十周年，举办了川北联合运动会，除邀请川北各中学参加外，还邀请了成、渝两地各大学代表队参加竞技，历时三天，观众达几万人，盛况空前。

3.1.4 重视体育道德精神的培养

(1) 培养团体的群力对外竞争意识

体育运动是对抗性的活动，争锦标、争荣誉是体育的突出特征。张学良将军不仅重视运动员体育成绩的提高，而且重视运动员体育道德的修养。为此，他多次接见东北的运动员，并即席致辞，告诫他们要发扬文明体育精神。张学良将军认为“体育运动是注重团体合作的”，因此，“在有团体性的运动里，必须每一个分子都能坚持合作的精神，来一心一德发挥团体的效能。”张学良在批评有些运动员好出个人风头时，特别强调指出：“我们中国人对于一般事情实在都犯这个毛病，每忽于团体的群力的对外竞争，而徒事对内作无谓的责难，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最大的弱点，这也是我们应当悔改的。”这是“过去运动失败的症结”之一。我们特别要“深明斯义，勇于对外团体的竞争，力避己方合作精神的破坏，培育团结合作精神。”^{[1]697}在他看来，“假使你一个为了出个人风头，失掉了全部的联络作用，结果，很易影响全局。”他鼓励运动员们“需要把个人的出风头的思想扩大到整个团体上面，大家合力出这个

团体的风头，小而言之，要为体育出风头，大而言之，要为国家出风头，尤其是在国际的比赛中，更是尽量地给自己的国家出风头，替自己的国家争光荣。”张学良还认为，“运动是以代表国家民族的精神”，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应能表现出中华民族勇敢、谦逊、文明的美德。总之，张学良将军认为，体育道德是作为运动员的“基本条件”，具有运动道德的运动员，才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员。

② 培育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

张学良非常重视体育，他认为发展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增强国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而且可以培养群体精神，有利于抗敌御侮。他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建立起各种运动队，训练了一批具有高技能、高水平的运动员，并投以巨资，修建了全国一流的运动场，聘请著名的国际教练开展体育教学，还积极捐款支持中国运动员出席 1932 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击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出席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阴谋，使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出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张学良先生不仅倡导体育，而且身体力行，时常与学生同打球、同运动、同联欢，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

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体育道德精神。“必须讲究运动道德。我参观欧洲人的运动竞赛的时候，总看出他们都富有体育道德。就拿打网球来说，无论哪一方面，都决不肯白拣一个球，胜负都要靠自己的本领，绝对的诚实无欺，对于评判员的评判更是绝对服从，他们没有一点我们中国人所有的坏毛病，处处都能代表一个文明国家的精神，一个以自力图强之民族的伟大气魄。因此，

我很希望你们今后都不要存出个人风头的心理，要为体育出风头！并且要知道运动是有组织有团体性的一件事，必须同心协力的严整对外阵线，培养体育道德，更是作运动家的基本条件。”^{[1]697} “对于运动员方面，我要提出体育道德精神的问题来，要诸位能深加注意。运动是最足以表现出个人的精神和道德的。各选手如能切实明了运动目的是在锻炼国民的体格和精神，而不只在争取一时胜负，那么，这种比赛必然是极虚心而礼让的竞进，这种胜负也必然是极其光明磊落的。果能据此种善良精神以从事运动，则适足以完成体育道德，于运动场内可为模范的选手，在社会上也必为良善的市民。”^{[1]826}

3.2 “潜移默化，以陶冶于无形”的美育观

3.2.1 美育的基本特点

美育是美学教育，又称审美教育。它是以培养审美的能力、美的情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为主要任务的教育。它是年轻一代全面发展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美育的特殊性质就在于通过审美活动来教育学生。审美活动是欣赏美的事物和创造美的作品的活动，特别是通过艺术形象来把握现实的活动。因而它是一种创造和再创造审美价值的人类实践活动。学校美育中的审美活动是指导学生对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鉴赏，发展学生各方面的审美能力，使他们追求美的事物、美好的生活，进而美化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美育的性质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 形象性、可感性

美育是通过美的事物的具体的、鲜明的形象来感染人、引起人的美感。美育的这一特点是由美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美本身存在于形象之中，各种美都是以具体的、可感知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人们只有通过形象，才能感受美，并把它表达出来。即使社会生活中的美，人们能感受它，也必定是与具体可感的形象联系的。

(2) 以美感人、以情动人

人们感情上的反映是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由美的感情决定的。美的欣赏既能认识事物，又能使人衷心喜悦乃至灵魂陶醉。因而美育是靠感情来首先打开审美者的心灵大门，在沁人肺腑的美的熏陶中，陶情淑性，发展着审美能力，这种动之以情的教育方法深切真挚。

(3) 学生在自愿享受美的愉悦中受教育

这一点与上述两点是相联系的。美育不同于单纯的说教、理论的报告，它是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认识事物，玩赏与品味美的事物，既有理智的满足，又有情感的愉快，从愉耳悦目、称心快意的美的享受中受到教育。

3.2.2 美育的基本任务

关于“美育的基本任务”应包括哪些内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教育界专家和学者在其认识上，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但一般说来，美育应包括审美教育和美感教育。它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现实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的鉴别、欣赏与创造的能力。美育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趣味，使人们变得高尚、积极以及在思想感情上全面

健康地成长。

(1) 培养感受美的能力

人们对美的喜爱是普遍存在的。人们对美的发现越多，对美越有深刻的体验，就会越热爱生活，甚至越感到生命的价值。凡是坚持“德智体美”办学方针的学校，大都开设多种门类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三种形态美。例如，通过数、理、化等课程的学习，能让学生感受到自然美的内容；通过文、史、哲等课程的学习，可以引导学生鉴赏社会美；通过美术、音乐的知识教育，学生更能感受直接的艺术美教育。可见，美育与智育有着密切的关联。

(2) 培养鉴赏美的能力

美的鉴赏是对优美事物的鉴别和评价，它同审美的趣味和审美的观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审美的兴趣表示了主体对某种美的事物的偏爱。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美的鉴赏是不一样的，例如，无产阶级认为是美的，资产阶级则可能认为是丑的。但也不能绝对化，例如，有些艺术品是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性的。因此，要使学生既能接受、欣赏人类的艺术传统，又能拒绝一切腐朽的、不健康的东西，这是美育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3.2.3 美育的基本要求

对于美育，张学良颇为关注。他不仅在仪容仪表方面率先垂范，而且提倡将美感教育的实施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使学生们无处不受到美育的感染。

例如，他在奉天教育会副会长李象庚的积极建议下，提出在同泽中学及新民小学实行严格的标准化管理，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统一制服，统一戴校

徽、唱校歌，增强了学生爱校爱国的情怀、审美的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从而形成良好的校风。这“实非少数教职员工用主观的观察批评和管理所能奏效，必赖全体之教职员学生，互本观感，随时随地向机利导，庶潜移默化，以陶冶于无形。”^{[2]733}此外，张学良还大力倡导改良戏剧书曲，恢复通俗讲演所，扩充图书馆，添设市乡阅报所，创办同泽新民俱乐部等。这一切提高了青年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分辨美丑的能力，开发了民智，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人们的心灵，对广大民众的觉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强调行为美、情操美、人格美，为了从小养成良好的举止习惯，在他直接领导的新民小学，除唱国歌外，还唱礼仪歌“行动安详坐如钟，立正像棵松；衣服整齐貌庄重，才是好形容。”这就使小学生知道什么是最基本的形容美。到了中学，不仅要求学生的形容美，而且要求他们的行为美。他为海城同泽中学制定的校训是“爱国、尊师、勤学、崇实”。对于大学生，他对美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形容美、行为美，而且要学会欣赏美、创造美，并具有高尚的情操和人格。为达此目标，他在东北大学开设了绘画写生和美学课程，并找人谱写了以“知行合一，积学养气，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为内容的校歌，使学生从中领略白山黑水的壮美，生发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努力向学的豪情。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外敌侵略。新校歌在东北大学校园里响彻云天，形成了催人奋进的力量。

为了加强美育，除了通过设置文学、音乐、美术课程，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外，还积极支持开展校园文艺活动。而他本身也很喜爱文艺，练就一首好书法，善长

诗词。如 1928 年在一次招待学生茶话会上，即席赋了“赠东大学生”诗一首。其诗曰：“大好河山夕照中，国人肩负一重重；男儿正要闻鸡起，一寸光阴莫放松。”给予学生以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勉励。

3.3 “缩小自己的占有领域，以扩大群众利益”的群育观

3.3.1 群育的基本内涵

群育，是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即整体观念、全局观念。关于“群育”的定义及其内涵，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群育是指群体意识；有人认为，群育是指群众观念或群众观点；也有人认为，群育是指与乡亲父老的鱼水关系；还有人认为，群育指的是集体主义精神，等等。虽然人们对群育内涵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作为东北大学的学生，心目中不但要有自己，更重要的要有别人，要有整体观念和全局观念。

群育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西方的教育思想不同，它不以个体为本位，而以群体为本位。“群”即指团体、群体、群众，推而广之，则指国家民族。因此，张学良提倡的群育，解释为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比较合适。这既符合当时东北大学所处的历史环境，更符合张学良将军的平生追求。张学良将军是“千古功臣”，他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就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而把东北振兴放在第一位。他正像东北大学校歌歌词所说的那

样：“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对于东北大学的全体师生员工来说，当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都以国家和全局利益为重。例如，东北大学师生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他们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力军和先锋队。曾在东北大学学习或工作的学生、教师，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学业乃至生命，奔赴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目前已查找到的有 54 人，其中“正气千秋”烈士苗可秀（少年铁血军总司令）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英雄。

苗可秀（1906—1935），辽宁省本溪人。1926 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东北大学文科预科（甲班）读书，1928 年升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本科。他精勤奋勉、孜孜不倦，潜心探求学问，曾致力于先秦诸子的研究，著有关于论述荀子的文章 20 余万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沈阳，东北大学被迫流亡到北平，苗可秀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读。1931 年 9 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了东北学生军，苗可秀任学生军大队长。1932 年 2 月底，他受救国会的委托，到辽东邓铁梅部队中了解情况。1932 年 6 月，苗可秀在北平东北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立即返回东北，参加邓铁梅部义勇军，被委任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辅佐邓铁梅打了许多胜仗。鉴于义勇军组织松散、目标太大、无力对付敌人强大兵力的围剿，苗可秀成立了少年铁血军，与义勇军并肩作战，他担任少年铁血军总司令。

1934 年 9 月，邓铁梅被捕遇害，全体铁血军战士无不痛心疾首，苗可秀决心支撑抗日的艰难局面。但是，

当部队由凤城向岫岩转移时，被日军包围，在突围中，苗可秀身负重伤后，被敌人逮捕。敌人先“委以高官”相诱惑，他不为所动；敌人对其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服。1935年7月25日，日寇将苗可秀押到凤城南公园，在他面前放一堆木材，作为对苗可秀实行焚刑使用之物。这时，敌人向他劝降，且说“不降即被焚”，苗可秀说“但愿一死！”并且高呼“中华民族千秋正气！”在此之前，苗可秀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曾书写“正气千秋”作为赠友人的遗物，并书“誓扫匈奴不顾身”诗一首，以明其与侵略者不共戴天之志。苗可秀誓死如归的精神使在场群众深受感动。刽子手们害怕群众骚动，便匆忙将苗可秀架走，到异地行刑。年仅29岁的苗可秀为祖国的抗日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苗可秀为抗日救国事业献身的实际行动，揭示了张学良“缩小自己的占有领域，以扩大群众利益”的群育观的深刻内涵。

3.3.2 群育产生的基础

群育，就是倡导内部要团结互助，不要“窝里斗”，反对“勇于私斗，怯于公敌”，以求以团体精神对外进行竞争。张学良从小即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他把群体利益看成国家的基础，把民心民意看作社会的决定因素。对于东北易帜，他认为是“以东北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的顺民意之举。正因为张学良有这种朴素的群体观，所以他不止一次地教导学生“将国家看大些”。同时，他还非常重视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合作。他曾对教育界人士说：“中国人每基于传统的劣根性，忽于团体的群力的对外竞争，而徒事对内作无谓的纷争，这也可

说是整个民族的最大弱点。”他要求大家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共同为教育事业努力，“勇于对外团体的竞争，力避己方合作的精神破坏”。他认为，“缩小自己的占有领域，以扩大群众的利益，或力求民族国家的福利，这实在是一个现代青年所必须宗奉的信条。”^{[1]704}由于张学良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有所了解，因此，他的群育观又与中国传统思想有所差别。他主张在群体的基础上，也应重视个人的地位和发挥个人的创造力。他说：“同样，个人在一个国家里面诚极渺小，但没有一个一个渺小的个人，也就没有国家了。所以个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任何个人不应当轻视他自己。”^{[1]721}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每一个人的发奋努力，“我们不能依赖旁人以求解脱，只有自己尽量去作……要凭自己的力量来解除自己的苦痛。”张学良对群育的重视，对于当时处于四分五裂、强敌压境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张学良少年时代深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悌、忠、信，爱人以德，民为贵等儒家思想的熏陶。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又为他创造了吸纳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机会。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切是造就他群育观的思想和现实基础。

3.3.3 群育的主要内容

(1) 全民教育观

张学良在旅欧期间，看到欧洲国民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远远高于中国国民，“我国文化落后，国势阽危，

愿求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1936年8月10日，他在陕西省地方教育行政会议上的讲话，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教育为民族存亡之所系。中国今日社会问题，最严重者，莫过于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此严重关头，整个社会当集中力量以推进教育，教育行政组织，应纯粹以教育事业的迅速推行及效力的普及为中心思想。”^{[1]1015}应当说，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他的全民教育思想。

① 民众社会教育理念。张学良说，对民众的教育：第一，要注意到时代的变迁，将一般民众的封建思想和家族观念改变过来，将民众的家族观念变成国家社会的观念，将封建思想变成合乎当前时代的思想。第二，要注重公共道德，将民众的旧道德变成一种新道德；将私的观念变成公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使民众思想亦随之变化。可见，他对民众的封建家族观念的改造是针砭时弊的。其目的是将旧的国民改造为新人，提高国民素质，增强与西方列强相对抗的综合实力。

同时，他还强调，对国民教育“必须按照我们国际的地位和社会的情况来进行，因为我们国家地位和社会的情况之不同，所以总理就创造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来适合我们的国际地位和社会情况。”^{[1]887}从本质上说，这是教育理念上的与时俱进，与邓小平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方针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得不叹服其在国民教育上的远见卓识。

另外，面对部分国民对国难的麻木不仁和日本奴化思想的泛滥，他创办《新民报》，以唤起民众。当时东北只有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主要宣扬中日同文同

种、中日亲善等奴化思想。张学良为了从思想上把国人锻造成巨人，在沈阳办起《新民报》，宣传东北和国家政策，介绍中外大事，以提高民众文化知识和政治思想觉悟。为建设新东北、抵御外侮、做好新民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② 倡导多层次学校教育。张学良深知大学教育是国家富强之本。1933 年他把办学宗旨表述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而消弭邻邦之野心”。为此，他高薪聘请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并购买先进教学设备和外语原版教材。学校设有工厂、实践室等场所，以便学生学以致用，成为国家专门人才。

为了解决原东北大学南北两校相距过远、工作不便问题，张学良校长慷慨捐巨资，在北校修建汉卿南、北楼，使两校合并，集中办学。之后，又捐资修建图书馆、实验室等。“为办东北大学，我本人先后捐款近二百万元，实在是费了好多心血。”^{[6]579}

除重视大学教育外，他还采取多种渠道集资创办中小学。他深知小学教育的基础作用，所以，尽最大努力使小学生免费入学。1925 年他在沈阳东山嘴子创办同泽男子中学；1927 年在沈阳大西门里建立同泽女子中学。与此同时，他又以私资兴办新民小学。他在辽宁各地共创办新民小学 36 所。

同时提倡女子教育。执掌东北大学后，毅然废除不招女生的禁令。后又办同泽女中，以使更多女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不仅体现他破除男尊女卑、力求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而且体现他为实现强国大计，使妇女并驾齐驱、跻身于文化科技行列的愿望。为使不同层次的民众都受到教育，他还创办各种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是

其教育实践的又一特色。

通过多层次的办学，张学良力争使最大多数的民众受到教育，从而提高全民素质，以赢得与西方列强较量的资本。

(2) 国家命运、民族利益为至上的大局观

深厚的中国儒家文化底蕴和日本侵吞东北的家仇国恨，使他始终能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而把东北父老的安危、东北领土的光复、国家的统一、全民族历史地位的恢复和振兴放在第一位。他的这种崇高的境界也深深融化在他的群育观中。

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是体现他在历史转折时期大局观的两个典型事件。1928年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张学良亲自主政东北。他始终把实现当时国家统一的大局观萦绕于怀，誓死不做日本人的傀儡，决心摆脱日本对东北的掌控。但他认识到单靠东北力量是难以抵制日本的。所以，“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

从国家与民族的大局出发，通过与蒋介石多次谈判，决定东北易帜，分治合作，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一行动打乱了日本侵吞东北、分裂中国的野心。他们对张学良施加种种威胁利诱，阻挠东北易帜，破坏南北统一，并以日本将“出动兵力”相威逼，千方百计使其就范。但张学良大义凛然，巍然不动。坚定地回击日本侵略者“我是中国人，应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我之所以愿与国府妥协者，实欲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始终坚持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击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东北易帜，使东北结束了长期在日本操纵下的割据局面，走上了当时情况下

的国家统一。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作出的第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大事，是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以民族利益为重，顺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作出的勇敢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令人称道的爱国壮举之一。东北易帜深刻地诠释了张学良以民族利益为至上的大局观。“不是因为我父亲被日本人杀死才易帜，我主张国家统一和富强，父亲不死我也会这样做。”^[327]

张学良审时度势的大局观在西安事变中又一次得到升华。张学良之所以冒死发动这一伟大事变，是因为他认识到在日本妄图灭亡中华民族的紧要关头，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停止内战，统一抗日，并深刻反省到蒋介石所谓的“先安内而后攘外”“反共第一”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同时看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为了停止内战，西安事变前，他屡次向蒋介石“苦谏”与“哭谏”。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决意逼张学良“剿共”，张学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逼上梁山，愤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并不是为了个人和某个集团的利益而发动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而采取的一次爱国行动。西安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在西安广播电台公开发表讲话：“我们把个人与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这一伟大壮举完全是为了“抗日救国”“统一御侮”的大局而采取的英雄壮举。这一无私的爱国行为，在民族危亡关头，促成了内战停止和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历史长河中，张学良的历史功绩和坦荡如皓月的人格将永垂史册。

张学良的大局观对东北大学师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在东北大学师生面前，张学良既是一面爱国主义的旗帜，又是一个具有坚定的以民族大义为核心的大局观的表率。在这种群育观的熏陶下，小到爱校、爱家乡，大到爱国家、爱人类。在个人和国家、局部和全局利益面前，以国家和全局利益为重。东北大学学生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始终走在斗争的最前列。尤其在一二·九运动中，东北大学师生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和先锋。

一二·九运动、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对张学良群育观内涵而言，不是孤立的事件，在本质上是一脉相通的。贯穿中间的红线就是张学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局观。

③ 与父老乡亲鱼水般关系的亲民观

张学良一生爱国爱民，从而忧国忧民。其执政期间，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共赴时艰，拯救危亡，促进国家统一，成立新国家，争做新民。在其政治生涯和教育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与父老乡亲鱼水般关系的亲民观，其具体表现如下。

① 心中始终装着黎民百姓的疾苦。1927年春，他率兵下河南。撤离郑州时，给北伐军留下了粮食，并执意不炸黄河大桥。他说，黄河大桥是国家财产，破坏容易建桥难，这是其一。其二，我给他们留下粮食，本可以一把火烧掉，我没有烧，并不是忘了，是让他们用一用，免得他们让当地老百姓再纳粮。我是有着这样的爱心，希望他们也存有这样的爱心。表明“体恤百姓、与人民心连心”始终左右着他的思想。

1928年9月，在东北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他的讲话同样表达了这种思想：“我过去打内战，看到老百姓

因内战被蹂躏，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我内心非常难过和内疚。我希望今后不要再打内战，各地区领导者有相异的意见，可以公开诉诸公理解决，不要再拿老百姓遭殃了。”

② 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实事。1934年1月，张学良欧游回国，向报界发表书面讲话中提到他回国原因时说“……第三，东北难民及失业的人太多，他们不断给我写信，我得知他们的困苦情形实在难过，也急于回来同政府商量个根本救济东北难民及失业者之办法。”足见其与人民密切联系的程度。身在他乡，心系故土，并且身体力行地为难民和失业者创造了若干解决实际困难的办法。

③ 提倡保民爱民的军队教育。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培养，不仅重视在军队装备上的大投入，而且主张用新思想武装军队，并且把与人民群众关系放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上。他经常用“凡我军人务宜遵守纪律为职责，以保民爱民为念，以扰民害民为戒”来对军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④ 主政东北时期的亲民政策。他在就职通电中宣称：“要实事求是，除去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提倡实业，奖励生殖。”在其主政期间，百废俱兴，各行各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这是群育观教育的硕果。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张学良的群育观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 4 章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

张学良将军不仅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在教育事业上，特别是他主政东北时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为东北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学良不但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而且受过世界近代科学文化的熏陶，加之其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得张学良在教育上能够高瞻远瞩。20 世纪 20 年代他提出的“教育乃立国之本”，强调学生“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以适应国家复兴和建设的要求，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张学良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4.1 突出“教育救国”的爱国主义主题

4.1.1 “教育救国”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特色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可以说它既是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倍受列强欺凌的历史，也是励精图治、众多志士仁人寻求救亡图存出路的历史。

张学良不但忧国忧民，而且具有远见卓识，因此，他始终把发展教育和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实现了兴教和兴国的有机统一。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帝国主义瓜分豆剖，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尤

其是强邻日本虎视眈眈，时刻准备进攻中国，吞并东北，战争一触即发。张学良通过认真的考察研究，明确指出，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教育的落后，中国要想摆脱积弱积贫的困境，走向强大，主要靠造就大批各类人才。所以，张学良提出，教育是根本，“教育为民族存亡之所系。中国今日社会问题，最严重者，莫过于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此严重关头，整个社会当集中力量以推进教育，教育行政组织，应纯粹以教育事业的迅速推行及效力的普及为中心思想。”正因如此，他积极投资办学，通过教育，为东北乃至国家培养各类急需人才，而且从基础教育入手，比如兴办多所新民小学、同泽中学、东北讲武堂，并于1928年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他尤其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后来他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不惜投入巨资，修建校舍，聘请名师，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办学水平，使东北大学迅速成为国内一流的知名学府，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热爱祖国、追求富强的强烈愿望。

张学良兴教兴国思想的提出，为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指出，过去的教育路线，只是造就出一些只能消费的分子，造就许多官僚买办分子，结果只是助长了国家的内乱和分化，因此是错误的和失败的。为此，今后的教育不能再继续过去的错误，必须培养社会需要的栋梁之才，培养大批改造社会、复兴的民族之才。这里所说的人才主要是指各种专门人才，用张学良的话说，就是“学的是工，就要作工，学的是农，就要作农，不要一心想着当官发财。”为此，他语重心长地说：“诸生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今日学生，为

将来国家之主人翁，从此立定志向，振奋精神，努力作人，努力向学，艰苦卓绝，恪守规纪，必须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实学问，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重任。”

4.1.2 “重教兴国”是张学良教育思想的主线

张学良提倡“重教兴国”是以爱国主义思想为主旋律的。在实施这一策略中，他反复强调“培养人才要以德为本”，尤其是进行正规人格教育。他深知“人无德，不能成器也”“非才无以报国，非学无以成才”“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实学问，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重任”。实施“重教兴国”，他清清楚楚阐明“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之方法之出发点”，强调“重教的目的在于兴国”。由此可见，张学良提倡“重教兴国”，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思想是他办学主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条主线。

张学良在1928年对东北大学学生讲话时会指出：“现在我们中国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中国，诸位同胞都得努力奋救他的危险。”他希望“同学要专心研究，以图于来日造就中国人才，人民中坚，求学事小，国家事大，才不辜负国家兴学的本质。”这里他从教育救国思想出发，给青年学子们指明了求学方向，要以民族的向上精神，努力成为救国人才，以达到兴国之目的。张学良在治学育人中强调“现在是为国家而求学的……不要因金钱的引诱，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又反复强调“只有学问短时间可以维持，有人格才能久远，如果有学问而无人格，终究会被淘汰。”他指出，“最重要（者）约有条：（一）自己看守自己的

人格。(二)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自己看守自己的人格,就是方才说的,不要失去自己的人格,被外界引诱,昧了良心,作极恶的事,遗害于同胞。要拿批评人的话,来规戒自己。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就是自己不要自看的太重,而有害于国家。”进而他用反例谆谆告诫学子们:“看见一般学生,对于国家观念非常地热烈,比太阳的热度还要高,至于他们进了社会,良心的温度就慢慢地降低下来。从前他在校讥讽人的话,现在他自己实行了。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将来处身社会,要本着自己的人格,拿来从前在校里的热心,来处置社会。拿从前批评旁人的话,来整理社会。人人如此,则社会国家就没有不富强的道理。”这些浅显而又富于哲理、含义深远、触动心灵、感人肺腑之言,不仅令人心悦诚服,同时也向世人昭示了他教育思想的主线是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置于首位。

4.2 贯彻“五育并重”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4.2.1 “五育并重”是张学良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

张学良认为,兴教办学培养人才,应当从智、德、体、美、群五大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教育,既要使学生掌握专业的技能,又要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要让学生的智商和情商同时进步,同时提高,使学生能够成为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智育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张学良非常重视知识的学习,他深知只有让越来越多的国民掌握科学知识,经济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强

大。他从欧洲考察归国后很受震动，说：“余由欧观察，所得彼中者，教育印象至深，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之计，其教者之善诱，学者之攻苦，孜孜不倦，远非我所能及，我国文化落后，国势阽危，愿求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1]672}因此，张学良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科学文化教育，要让学生研究高深学术，而不是一般的学术。所谓高深学术，主要是指为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尤其是那些欧美领先而我国落后的知识。张学良如此重视知识教育，可以说，抓住了教育的实质或要害，是十分正确的。科学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人们借以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人一旦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其创造力就会有极大的提高，而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教育对象传授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用知识武装人们的头脑。尤其是要武装青年人的头脑，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在此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他重视知识教育可谓极为英明之举。

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德育的目的是让学生逐渐形成做人的基本品德和素质。由于当时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张学良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他曾明确指出，兴教兴学的目的就是振兴国家，消除邻邦的野心。因此，他不断强调学生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读书不忘救国，要以爱国救国为己任，努力学习，报效国家，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比如，1934年，他在东北大学校友会南京分会成立会上呼吁：“国家衰弱到今日地步，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语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要努力复兴民族，整顿国家，必须

由小处一点一点做起，必要用许多时间与力量。人人应抱正但求耕耘，不问收获之决心，去努力苦干，实干，而后可以有效。”^{[1]838-839}体育的目的是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为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体育运动还可以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张学良认为体育是教育诸环节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针对当时许多学校不重视体育教育，导致学生身体素质状况不佳的现状，呼吁要对体育教育给予特别的注意，然后才能“用健全之身体，好求精妙之学问”。群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让学生爱校、爱乡、爱国家，正确处理好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增强学生的组织观念与合作精神。美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美感，提高学生对美的欣赏能力和创造能力。张学良对于美育工作也很重视，不但努力建设优美校园，而且设置文学、音乐、美术等课程，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陶冶学生情操，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全面进步。

4.2.2 “五育并重”是对兴学育人规律的正确反映

张学良五育并重、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在当时而言，是十分先进的，在今天也是不过时的。他强调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五者共同发展，全面发展，从而把它们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密不可分。如果只重视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的教育，而忽视了智育的教育，那么培养出来的人才就不能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才，因而这样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和没有前途的。相反，如果只重视智育，而忽视了德育、体育、群育、美育，那么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就是不健全的，就

是不合格的。因此，这两大部分是不可分割、有机统一的，都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做到两条腿走路。在发展智育的同时，重视德育、体育、群育以及美育的教育，可以为智力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从而促进智能开发。比如，爱国主义教育就可以激发学生产生明确的学习目的，为智力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体育则可以强健学生体魄，促进身体发育，为学生学习奠定良好的身体基础；群育以及美育可以健全人格、陶冶情操，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为智力教育营造良好的氛围。反之，智力教育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德育、体育、群育以及美育的提高。以至于能够丰富学生知识，开阔他们的眼界，启迪他们的智慧，从而使德、体、美、群等方面的教育能够易于接受，便于开展，相应地，就会促进这些素质的提高，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张学良关于教育要五育并重、全面发展的思想，实际上强调智力开发和全面发展的统一，在重视智力因素的同时，要充分重视非智力因素，要把提高智商和情商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智商和情商协调发展。

4.3 提倡“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

4.3.1 培养实用人才是张学良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

张学良兴教兴学的直接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应社会之需要”培养实用人才。他认为，教育“自当以适合现代潮流”为“标准”。为此，他推行了一整套严格的治教治校制度，其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教学模式是相当重要的方面，因而具有学以致用突出优点。

为了使培养的学生能够为国家所需要，他主张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教学内容，都要面向社会。张学良比较重视实业的发展，强调加强教育和实业的联系。他不但选派教育考察团出国考察，而且结合地方实际，兴办了许多职业学校，诸如东北交通职业学校等为实业服务的学校，造就了一大批实用人才。他创办东北大学之后，应社会发展需要设置专业，并不断发展壮大，由最初的文、法、理、工四科逐渐发展成为学科众多、文理兼备的综合性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流亡关内，为适应收复东北以及保卫边疆的需要，还开设了边疆政治系，培养相关人才。

4.3.2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的基本原则

张学良在东北大学的办学实践中，特别强调“实用”。为了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他极力主张破除旧中国教育轻视实践的弊端，要求学生动手动脑，用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验证理论，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和动手能力，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实用人才。他任东北大学校长后，为了培养“实用人才”，一方面，推行一套从严治校的办法，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以此提高教学质量，打好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遵循“知行合一”的校训，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以致用教学模式。

东北大学成立后，为了给理工科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学校开始筹建校办工厂。张学良认为，大学设工科是需要工厂的，工厂是为学者实验和学生实习而设立的，工科作为实验性的科学，要想发展，离开实验是不可能的。为了办好东北大学工厂，他不断增加投资，购

买先进机器设备，高薪聘请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不断改善组织制度，使工厂实业日益壮大。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相关各系提供了有力的实践场所，制作出很多机器设备，从各种刀具到铁路机车，可谓品种齐全。这种厂校结合的办学模式大大促进了实用人才的培养。所以，无论是面向社会设置学校或专业，还是推行厂校结合的教学模式，其核心是学以致用，使学生能够成长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真正做到学有所用，学有所长。

4.4 坚持“兼收并蓄”开放式的办学理念

张学良出身于封建军阀的家庭，后来自己也掌握着军政大权，但由于他胸怀国家，又接触过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这使得他逐渐形成了比较民主的思想和宽容的作风。在他兴教兴学的过程中，这种思想和作风表现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大家气派。

4.4.1 提倡学术自由

在学术方面，张学良主张各种学派可以自由争鸣，百花齐放，以此“谋文化之发展”。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活跃学术气氛，他不惜重金礼聘中外专家到东北大学执教，当时聘请的教授以及院系主任大多是回国留学生和各学科的名流，可谓人才荟萃，对于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繁荣学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他在公费留学制度、选派优秀学生出国深造、将西方文化之所长传进中国以补我国之短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学习借

鉴的宝贵经验。

4.4.2 主张男女平等

在女子教育方面，他主张给予女子公平的教育机会。这是张学良教育思想及其教育体制改革的又一突出特点。在张学良将军没有就任东北大学之前，这个学校是不招收女学生的。那时，东北地区没有女子大学，其他高等学校也不招收女学生。“东北地区从中等学校毕业的女学生，只好到关内或国外的高校去就读”^{[20]36}。当时，东北社会各界人士对东北大学成立以来一直不招收女学生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希望东北大学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改变不招收女学生的做法。但是，东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王永江不仅听不进社会各界的舆论呼声，反而很生气地说：“什么？要男女合校，古训可没这一条，我宁可这校长不当，也不能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儿。”^{[16]27}事实上，王永江校长在东北大学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东北大学是否招收女子学生问题上，他是坚决反对的。他说：“男女授受不亲，是至圣先哲的教诲，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如今可倒好，小伙子大姑娘非要往一块儿凑合，成何体统！”^{[16]27}

因此，关于东北大学不招收女子学生的禁令直到王永江校长因病回原籍修养，也没有任何松动。

张学良于1928年8月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当听到这个学校不招收女学生之事时，就问副校长刘凤竹：“东北大学拒收女学生，是谁决定的？为什么做这个决定？”^{[16]28}刘凤竹回答说，王校长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至圣先哲的教诲，是不能更改的”。张学良很生气地

说：“已经到了什么时代，为什么还要做出这种歧视妇女的规定呢？”因此，经张学良校长决定，从1928年秋季开始，东北大学大多数学科均开始招收女学生入学。表4-1是1929年统计的各学院在校男女生比例。

表 4-1 1929 年统计的各学院在校男女生比例

学院名称	学生总数	男生人数	女生人数	女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
文学院	203	193	10	4.9
理学院	155	150	5	3.2
法学院	261	241	20	7.6
工学院	326	326	0	0
教育学院	238	202	36	15.1
合 计	1183	1112	71	6

从表4-1中数字可以看出，第一年报考教育、文、法各专业的女学生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但这一举措毕竟开创了东北大学招收女生的新风尚，体现了男女地位的平等。不仅如此，张学良为了鼓励女学生进入东北大学后努力学习，他还让其夫人于凤至入东北大学政治系插班听课。

4.4.3 重视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民族兴旺、国家进步的基础，也是正规教育的先决条件。张学良充分认识到，国家推行政令，靠的是广大国民的觉悟，而觉悟的前提则是知识的普及。因此，张学良在大力兴办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在职成人教育，提倡多层次、多渠道办学。例如，为了使社会上的有志之士在工作之余，仍有

机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广开知识传播渠道，他创办了东北大学夜校专修科，招收在职公务人员，设有政法和数理两个专修科，学制为三年。通过夜晚上课，对在职公务人员进行培训教育，以便他们更好地从事具有专业特长的工作。

此外，为了培养师资，还设有师范专修科，学制也是三年，鼓励有识之士献身教育，以加强中学的师资力量。

总结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学良关于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对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东北的地方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的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不仅如此，张学良的教育思想对今天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

第5章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和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变化与发展，对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爱国救亡和追求国家的现代化成为这一时代的双重主题，而教育救国自然成为张学良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张学良比较早地认识到了救国必须重视教育、救国必须重视青年教育。早在1924年12月，他就表述了“中国惟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2]23}的基本思想。1928年主政东北以后，他即秉持“和平统一、御侮救国”的宗旨，在东北大力兴办教育和各种实业，推行以教育现代化为重要内容的东北新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教育观点，综合起来就是：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教育价值论、以“振兴国家”为导向的教育核心论和以“任用贤能”为中心的教育主体论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

5.1 教育价值论——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

5.1.1 教育价值论的理论探讨

教育价值论是教育哲学研究领域最具有特色的内容，也是与教育实践联系最密切的教育基本理论问题。一般来说，人们从事教育工作，总是在一定的教育价值

观引导下进行的实践活动，这样，教育价值观就成为人们从事教育工作的基本导向和思维定向。而确立什么样的教育价值观又是与人们的哲学观相联系的。因此，从根本上说，人们的哲学观引导着人们形成相应的教育价值观。研究教育哲学，就是要探讨在相应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应该确立的正确的教育价值观。

学者们对教育价值观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的价值，通俗地讲，就是教育的功效，从人的发展来说，教育就是对发展的一种价值界定；从社会来说，教育又是一种社会价值的创建，是社会价值所设计、创建的一种文化形态。教育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它与社会、人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既受社会制约，又不能脱离人的发展而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价值观是对教育价值及教育价值关系的根本看法，是人类价值观在教育方面的具体化，是人们对教育感知、认识的重要内容，是指导、支配和评价教育行为与功效的核心观念。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价值，是教育的内在价值；由于教育促进了人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是教育的外在价值。正确认识和理解教育价值，必须坚持教育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即教育促进人的发展与促进社会发展的统一。

① 从教育的产生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人们，教育的产生是与人的产生、社会的产生同步的。人是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开始其历史的。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会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人们在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物质生产的经验，而且产生了一定的生产关系。人们在一定的社会联系和关系中，形成了一定的劳动纪

律和生活习惯，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老一代为了维持和延续人们的社会生活，使新生一代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和适应现存的社会活动，把积累起来的生产劳动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以口耳相传的教育形式传授给新生一代。同时，从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来说，一个嫩弱无知的初生婴儿要成长为适应社会生活的成员，即从一个生物实体的人转化成一个社会实体的人，也需要成年人的抚育和培养，这样便产生了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教育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满足社会生活和延续人类自身成长两方面需要的价值。教育的职能就是通过传递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经验，影响社会发展，促进新生一代成长的。作为社会生活的延续，也是教育的价值所在。

② 从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教育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和发展，教育的社会制约性是教育发展的普通规律，过去是这样，将来依然如此。规律是客观的，教育不可能脱离社会，而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社会要发展、要进步，教育就要向社会提供发展的动力——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否则，教育就失去了固有的价值。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挑战，教育负有培养未来一代又一代具有责任感、意志、信心、素质和能力的新的伟大使命。

③ 从教育的目的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告诉人们，确定教育目的的客观依据应是社会的需要和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社会的需要和人的自身发展的需要是确定教育目的的共同出发点。一方

面，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个人的发展是以社会的发展为前提的，片面强调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的，为培养人而培养人，这在现实中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的发展包括个体人的发展，即社会的发展也要通过每个社会成员的发展去实现，离开了个人的发展去谈社会的发展也是办不到的。教育目的实现的过程，既是使人社会化的过程，又是使人的个性完善化的过程。由此可见，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把两者结合起来，既是教育目的的要求，也是教育价值的体现。

5.1.2 张学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教育价值论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教育价值论，在社会层面主要体现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在个人层面主要体现在提高个人素质。两者综合起来，张学良教育思想的价值论是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在他的一系列教育实践和讲话中，人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他的这种在当时，甚至现在依然比较先进的教育价值论。

(1) 积极兴办教育，促成国家现代化

教育学表明，接受过教育的人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发展了的生产力反过来又能通过发展教育加快人的进步，即教育具有经济价值，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本的保障，同时，教育又受经济环境的制约^[25]。建立完善的教育系统，使教育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任何国家和地区的首要任务。近代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和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变化极其剧烈，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爱国救亡和追求现代化成为这一时代的双重主旋律。

从当今世界各国当政主要领导者看，大多已认识到教育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此有正确认识者却为数不多。年轻的张学良却比较早地关注了这个问题。张学良将军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既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的熏陶。张学良在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悟出一个道理：国家要富强，就得培养人才；振兴东北，培养各种人才乃当务之急。他认为国家要想强大，就必须具有坚定的赶超意识。这也是近代中国爱国有识之士所共有的思想意识。他们认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虽然很大，但这个差距是可以缩小的。张学良就是试图缩小这个差距的先驱者之一。

教育是现代化的根基，教育是塑造青年人灵魂的事业。1921 年，张学良应邀去日本观秋操，日方有意请他参观军备，炫耀武力，并问他有何观感。他当即答复说：日本今天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日本不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请君拭目以待！张学良的回答明确地表达了中国人坚定而自信的赶超意识。后来，他多次引用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话说，“爱国者也可以说：‘我欲复兴斯复兴至矣’。这是作国民的在主观上应有的信念，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民族是不会长期沉沦下去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坚定对于中国民族复兴的信念。”^[6]他的这种信念愈来愈坚定，并不断付诸实践，成为他富国观的重要思想渊源，而这种赶超意识的培养需要教育的支持。特别是青少年，更需要一种赶超意识，以便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服务。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1924 年 12 月 21 日，张学良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欢迎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唯一希望在青年，

青年之根本，在教育。”他在统领重兵，驰骋疆场之余，与属下共同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奉天同泽男子中学、东北航空学校、奉天同泽女子中学、海城同泽中学和一些小学。张学良在主政东北后，把更多的心血倾注到发展教育上，数年之间，使辽宁以及东北地区的大、中、小学教育和社会民众教育等方面，均呈蓬勃发展之势。1924年冬，年仅23岁的张学良在对北京大学师生的讲演中，说明了青年学生要具有超前的现代意识，这样国家才有希望。1926年春，他在北京对国闻社记者谈话时说，他“以为铁路破坏，实业不兴，所害尚小，独此关系国脉之青年教育，放任冷淡，以至于此，实大不了。”^{[1]24}是年底，他在答复京师中小学教育维持会的复函中说：“教育系乎国本，而尤以中小学为青年入德之基。”1930年12月，他在天津对国立第二工学院的师生们说：“中国在今日与外人相比，当然是落后国家，其最大原因，即在教育落后。”

教育是“国之根本”，是现代化的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东北地区，教育机构大部分控制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他们已经看到，要想永久霸占东北，进而达到占领全中国的目的，必须对中国人施行奴化教育，使其不知国别，不知种姓，成为日本人的奴仆和全面侵华的鹰犬。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内部军阀割据，连年内战，使得民不聊生，中国经济大半受控于外国列强，因此，国内教育资源匮乏，国人更是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这又进一步导致国家形势的恶化。张学良将军此时已成长为一名血气方刚、智勇双全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他有着了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决心促成国家的统一，使全国人民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张学良深受英美文化的影

响，倡导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认识到：教育系乎国本。

惟发展教育才能拯救中国，惟有教育现代化才能兴国。张学良将军的教育思想就是在这时期形成的。从这一时期开始，张学良先后在辽、吉两地创办了多所中小学，个人出巨资捐助教育事业，并号召东北父老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尽个人所能。1928年8月，张学良出任东北大学校长时，主张通过兴办教育事业，提高东北民众的文化素质，培养一大批各方面的建设人才，以此推动东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达到强盛国家的目的。他当时采取的兴学强国的具体措施，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一些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符合教育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原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极大地发展了东北的教育事业，有效地抵御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他当时的一些教育实践对我们当前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教育是现代化的人才之基。适应社会之需要，调整大学的专业设置，培养实用人才。张学良将军在出任东北大学校长之初，根据社会发展局势，明确了东北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实用人才。他提出，东北大学的办学目标在于“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而消弭邻邦之野心”。而这项任务的完成，始终要以社会的需求为依据，才能达到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为了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要不断调整大学的专业设置。东北大学按照张学良的这一思想，根据社会实际需求，对学校的专业设置进行了增减，调整了人才培养结构，更好地适应了当时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东北大学初创时，只有理、工、文、法四科，张学良任校

长后，鉴于东北中小学教育的师资严重缺乏、农业发展落后的状况，开办了教育学院和农学院。1929年1月，教育学院增设国文专修科和博物专修科，7月增设体育专修科；同时本科文学院增设哲学系，理学院增设化学系、生物系，工学院增设纺织系。1930年7月，教育学院增设公民史地专修科，将原教育系分为教育行政系和教育心理系两个系。农学院实际为东北第一所农学院，主要为开发经济培养农业技术和管理人才，1930年7月开办农艺系、森林园艺系、畜牧系。1931年7月，教育学院增设家政专修科。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到北平，面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张学良决定停办一些不急需的科目，开办了边疆政治系，专门研究日本和苏联。在张学良适应社会需要办教育的思想影响下开展的教育实践，为东北和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实用型人才。

② 不断完善教育体系，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张学良具有强烈的实业救国的思想。他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才会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才能够真正地成为强国。因此，张学良在东北地区主政后，大力发展实业，创办了许多大型企业。但在这一过程中，张学良深深地感觉到了人才的缺乏，意识到人才的缺乏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人才。张学良将军早在1925年就曾说道：“咱们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总受外国人的欺负呢？不就是因为咱们的老百姓没文化，国家太落后吗？”^[27] 张学良此时已经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民族的进步，都离不开全体民众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惟有全体民众接受教育，才有国运的昌盛。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

争，没有人才，就没有社会的进步。民众普遍接受教育，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为此，从1927年开始，他先后在祖籍大洼县“驾掌寺”和黑山、台安、新民、海城、绥中、铁岭以及吉林怀德等县创办了一批中小学，大大改善了基础教育环境，为东北培养了一大批能写会算的劳动力，也为东北学子深造创造了基础条件。据统计，1929年东北四省（辽、吉、黑、热河）有小学13689所；中学258所，学生34671人，受中等教育人数每万人中为17人，辽宁省受教育人数达到全省人口的4%^[28]。

张学良还大力主张女子教育和平民教育。他认为，只有大众教育普及了，国家经济才有可能发展。1928年8月，张学良将军继任东北大学校长，为使所有想进入大学深造的学子都有机会进入大学，他下令废除预科制度，凡高中毕业及具有高中毕业同等学历者，均可报考东北大学，并且不分籍贯，都免收学费。东北大学建校初期，由于校长王永江是科举出身，反对男女合校，迫使东北有志的女学生远走关内升学深造。张学良主持东北工作后，批准东北大学各系招收女生入学，他认为，中国旧俗女子不读书，致使现代社会“女校无几”，严重影响女子接受平等教育，而且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强国而保种”，应学习西方，“知女学之重”，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29]。以上改革不仅使男女具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而且有利于东北大学吸收全国的优秀人才前来求学，赢得了东北各界人士的热列拥护。张学良除注重义务教育外，也很注重发展民众教育和职业教育，在车向忱、阎宝航创办的民众教育促进会里，张学良应邀担任名誉会长，捐资大洋5000元，作为发展简易贫民教育

的活动基金，在省城及各县创办了一定数量的民众学校，主授识字、常识、算术，兼授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科目，使没受过学校教育的民众也能通晓粗浅文字，获得普通知识。根据成年人特点及要求，酌设农业或商业科目，既补充了学校教育的不足，也使年长失学者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为了帮助广大民众提高文化素质，相应地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图书馆、讲演所、阅报社等，使读书看报形成风气。

（3）完善教育体系，培养适应需要的实用人才

张学良将培养人才看成现代化目标的基石之一，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这也是教育价值的体现。因此，张学良努力以教育来培养人才，以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寒窗苦读的终极目标无非谋求一官半职，以衣锦还乡、光耀祖宗为荣。“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千百年来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社会对专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针对“读书做官”论的不良影响和学生学非所用的情况，张学良曾对东北大学学生讲到：“东北三省留学欧美的学生，研究农科的很多，可是我从未看见他们回国以后，还能继续研究农业，并且能与老农一同的耕田，大半改变了意志，半途做官去了。我很望诸君，要坚定了志向，各用己之所学”“学的是工，就要作工；学的是农，就要作农，不要存在有当官的心理”“全国学者都能如此，则中国自强矣”^{[23]113}。在另一次讲演中，他又指出：“建设第一需要人才”，而“工业建设人才尤为需要”^{[1]395}，表现了他对专业人才的渴求。1930年12月，张学良在南开大学讲

演时，更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人尽其才”观。他说：目前中国并非缺少人才，只是一般人均“重小我而轻大我，眼光过浅，仅知注意目前小利，而缺乏远大理想。”他真诚希望各位同学“努力学问、道德之修养，矢志救国，以将来中国之希望为个人一己之责任，无论负何责任，均当竭尽其力，忠于职务，勿见异而思迁，勿因位小而懈怠。更以此念及于全国四万万同胞，则国家自易臻于强盛。”^[1393]今天看来，这番话依然适用，值得借鉴。

根据社会发展局势明确了发展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实用人才。张学良认为，教育“自当以适合现代潮流”为“标准”。他所说的“适合现代潮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掌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1933年3月，张学良出国访欧前夕，他曾对部下明确讲述了他办东北大学的目的，并多次表示，要消灭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野心，必须实现人才的培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为此，他以高薪聘请专家、学者（其中有许多人曾留学欧美）任教，并购用列强先进的教学设备和外语原版课本，学校还设有工厂、实验室等用于实习的场所，以便让学生切实掌握高新科技和文化知识，成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专门人才。他提出东北大学的办学目标在于：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使中华民族真正地崛起。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按照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设置，才能达到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

张学良教育思想中，将德育看成培养实用性人才的基础，只有德育首先搞好了，学生才知道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为此，特别强调：“在学生时代第一要修养人格”（第二才是专心求学），“仅有学问，不过短时期可以维

持，有人格方能期诸久远。如果有学问无人格，终要受淘汰；”在日常生活中，要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不可求役人，须要被役于人”。“须自己要强”。

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强调学校的教学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学校附设自己的工厂，教学计划中安排学生们到工厂“真枪真刀”地生产劳动，制造产品；农学院还筹办了农场、实验田，由学生亲手种植。在当时的高等学府中，这种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办法是为数不多的。恰恰是这种教学方法，促使了书本知识与实际的统一，使学生了解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了学生的整体观念和劳动习惯。

综上所述，张学良将军在主政东北前后，为实现富民强国、以御外侮的愿望，积极发展教育事业，使东北的教育系统趋于完善，保证东北人民有机会接受各级各类教育，以此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为社会生产培养合格的劳动力，适应了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倡导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以推动地区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张学良将军的极为先进的教育价值观念，且在当时得到了实施。在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时，就有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意识，他非常重视将所学的理论同生产实践相结合，倡导学校要为地方经济服务。为此，他大力筹建现代化的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到1930年，校办工厂资本总额为170余万现洋，土木系、铁工系、原动系下属10余座工厂。一方面，校办工厂通过为地方经济服务，为东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费；另一方面，又为学生进行生产实习提供了良好的场所。从张学良将军办教育的实际行动和他对教育的殷切希望中，可以看出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以及通过培养实

用人才来促成国家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5.2 教育核心论——以“振兴国家”为导向

5.2.1 教育核心论的理论探讨

人们对于教育核心论的认识是从对认知科学的研究开始的。自20世纪60年代起，认知科学研究开始关注涉及思维和学习的心理过程。虽然研究方法不同，理论上有所差异，但认知心理学家在新的学习理论方面，能够达到基本一致。总体来说，认知科学承认皮亚杰关于个体必须建构自己理解的观点，人们并不像录像机和摄像机那样，仅仅记录世界的表面现象；学习是阐释性和推断性的，这包括推理过程和反思过程。此外，高水平的学习者能够自我管理他们的认知过程，即元认知和自我监控。随后，认知科学家发现，脱离人们已经拥有的知识，很难解释问题和学习，在认知思维领域，旧知识对于学习新知识和思维都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同样阅读一则有关棒球的故事，那些已有棒球知识的人比那些对棒球一无所知的人能够学习更多的知识。将知识视为学习的核心，能够较好地解释学习的建构理论，因为一个人首先要拥有进行建构的知识。事实本身并不能组成知识和思维力。过程将事实转化为知识，而知识又进一步促进思考过程，但不是取代它。所以，基于知识的建构主义，一方面强调向学生传授知识，另一方面强调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为学生提供一个丰富的环境，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推断。也就是说，教育在于灌输实践中已经存在的知识，把知识转化为头脑中的东西，再用来指

导人们的实践。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不能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马克思主义不但重视人的发展，而且积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说它忽视人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而人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笼统地讲，教育的育人功能似乎没有问题，但关键在于育什么样的人？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教育本质的论述，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和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抽象地、孤立地谈育人。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脱离了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抽象地谈育人，那就很容易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和狭隘的人本主义之中。可见，毛泽东同志从教育的功能角度出发，阐述了教育的核心在于育人。

从学理层面看，教育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体从事实践活动及理论活动的基本方向，进而从本质上体现社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从总体上反映独特的社会精神及社会价值的基本取向，并贯穿于教育主客体生活的各个领域。一言以蔽之，一方面，教育的价值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价值问题可以折射出教育工作的向度、幅度与深度；另一方面，价值问题深刻地制约着实践主体调整、解放、更新思维能力及提高个体自身总体素质的可能性。教育的核心就是教育价值的最大趋向。毫无疑问，教育的价值结构中，必须有一个统领与核心，其结构方

能构成并起作用。首先，教育是建构在人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并以解决人的根本思想立场观点问题为核心的。其次，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加强了人和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个体与社会的交往更加深入。再次，由于受传统和习俗的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惰性和顽固性，因而如何使人民群众从自发走向自觉，同传统落后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实现教育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自觉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我们认为：“从教育核心的构成上看，教育的核心是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理想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统一”^[50]。从教育的核心上看，教育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及创新素质，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5.2.2 张学良以振兴国家为导向的教育核心论

受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个人阅历的影响，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中体现的有关教育核心的问题是十分朴素的，就是要国富民强、振兴国家。具体地说，就是：教育培养人才，推动国家现代化。教育价值要以振兴国家为导向，以国富民强救国救民为目的。综观张学良的教育实践，从始至终都贯穿着这一教育的核心论。

(1) 教育救国是救国的根本

实现中国的统一和富强是张学良矢志不渝的追求。作为军人的张学良，尤其可贵的是，他认为发展实业和教育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根本。他强调指出：“立国之道，首在建设”“建设为发展国力之前提”^[51]。本着

这一思想，在他主政东北期间，各地方政府都积极拟定了实业发展计划。如当时的奉天省政府就有较完整的农业开发计划，该计划包括改进农业，促进垦殖，兴办林业，发展牲畜，筹办水产，整理水利等多种促进农业发展的改革。此外，还制定了详细的工矿开发计划和交通、商贸、财政、金融等方面的建设或整顿计划。为了发展实业，张学良支持地方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奖励农桑，鼓励开发创造；另一方面积极举办国贸陈列展览，派员考察实业，筹备县农业局，创办实业书报，以此唤起人们兴办实业的积极性。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上述发展实业计划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但就已实施的部分来看，成效已有所显现。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人才的创造性工作。张学良认为，一个国家要行，要强，非得要造就人才。教育是国家所有行业的基础。“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计划。”他还指出：中国落后“其最大原因是教育落后”。为了培养各类建设人才，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张学良特别重视发展教育。例如，为更多地派遣留学生，他努力增加经费，修订规章制度；为发展高等教育，他亲自兼任东北大学、东北交通大学校长，并迅速扩建东北大学等校舍，购置大量图书设备，重点聘请著名专家、教授；为发展中等教育，他亲自创办东北大学附中和同泽中学、同泽女子中学；为发展小学教育，他亲自创办新民小学。他还捐私产现洋 500 万元，作为中小学基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均受到相当重视。以兴办实业，发展教育来实现其富国强国的理想，突出反映了张学良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的思想前瞻性。事隔 70 多年后，重新审视张学良

的上述思想，仍不失为颇有见地的主张。

(2) 培养学生的主动爱国情怀

主动的爱国才能救国，教育才能起到救国的作用。爱国主义作为“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一个历史范畴，“非加大速度培养不可”^[1627]。张学良认为，教育应该深入到青少年当中去。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基于对教育兴国的这种深刻认识，张学良在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极为重视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并把爱国主义教育看成德育的核心。他在一次对学生的讲话中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本应为世界强国，而我们自己不振，困难重重，我辈青年均须负起救国爱国的责任，而我个人责任尤重。”^[62]从1928年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到西安事变后他失去自由，张学良通过各种方式对东北大学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了东北大学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

张学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他认为，青年学生的爱国教育是爱国教育中的一环。一是强调青年学生要有责任感，为国家而求学。1928年9月，张学良在对东北大学学生的训词中指出：“现在我们中国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中国，诸位同胞都得努力奋救他的危险……然而中华民国的教育，不像从前为个人而求学，为家庭而求学，现在是为国家而求学。所以，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也就是说自己不要自看得太重，而有害于国家。要关心国家的兴衰，要有时代的责任感。关心国家不要三分钟热度，我很希望大家，将来处身社会，要本着自己的人格，拿从前在校里的热心，来处置社会，拿从前批

评旁人的话，来整理社会。人人如此，则社会国家就没有不富强的道理。”二是强调青年学生要有主人翁精神。张学良说：“今日学生，为将来国家之主人翁，从此立定志向，振奋精神，努力做人，努力向学，艰苦卓绝，恪守规纪，必须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实学问，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重任。”“做国家主人翁要各安其业，学的是工，就要作工，学的是农，就要作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我希望诸君，用自己所学，努力为国工作，则中国自强矣。”三是强调青年学生要有自我牺牲精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殖民地，东北大学被迫流亡北平。面对形势的变化，张学良教育学生：“复兴民族之责任，固是在全国人民身上，但东北青年所负之责任，比较重大。所以要受苦我先去，要牺牲我先去，要流血我先去，没有这种精神，谈不到救国自强。东北大学的学生要没有这种勇气，不必在东北大学。”四是号召青年学生要为光复失去的大好河山努力斗争。1936年东北大学工学院和补习班西迁后，张学良在3月18日对学生发表演讲。他说：“西北历史遗迹最多，那正是表明我们先祖先宗当年并非如此无能，决非如今日之受人凌辱侵略。一到此地便可知道，中国由秦、汉、唐以来，建设之伟大，历史之远久，以西北为最。由此可见，一国之强弱，在乎其国民之能振作与不能振作，如果自己肯埋头沉心下苦功夫去做，什么难事都可以成功的。”^[585]“谭嗣同传上记载了这样一段情节，就是戊戌政变六君子尚未遭难以前，有人劝谭逃走，但他坚决不走，曰：‘不流血，不足以促变法。’请问我们东北事变，谁流了血？谁有这种精神？”^[586]“我们东北大学学生，有他的特殊使命：回故乡去！所以我们造就

学生出来，非但有专门知识，还要训练他有比专门知识更深的救亡思想。”

张学良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对学生发表演说、训词是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张学良还极为重视东北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注重外在形式上的爱国主义教育。1929年，张学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新校徽图案，林徽因教授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在众多的设计作品中，以其象征东北地理特色及其气魄的长白山和黑龙江而中选。这枚获奖校徽为圆形，其内有一个中心圆，里面书有“知行合一”四个字；在中心圆外之上半部是一环形半圆，正中有八卦艮卦符号，它的两边各有两字，组成“东北大学”校名；在中心圆外之下方是白山黑水图案，图案两侧绘有两种动物的图形，其左侧是熊，其右侧是狼。这枚校徽象征着保卫、开发、建设祖国的东北和警惕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使命。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流亡北平时，东北大学为了激发学生的使命感，又设计和制作了反映时代特征的校徽。校徽的形状为盾形，示意预备自卫将来杀敌。校徽图案由白山黑水、小舟、“东北大学”四个字和东北四省地图组成。图案寓意深刻：白山黑水为东北主要之山川，取此以示意东北大学之伟大足为东北之代表；四省地图表示东北辽、吉、黑、热河四省相继沦亡，将地图绘在校徽之上，意在提醒学生不忘奇耻；小舟是指东北大学；将“东北大学”四个字书于舟身，示意东北大学被迫逃难而前途之难关正多，也示意东北大学精诚团结，同舟共济，又示意东北大学冲破一切难关，乘风破浪，以达雪耻复仇之目的；四省地图绘在小舟之上方，示意恢复东北失地之

责任在我东北大学。校徽为黑白颜色，使白山黑水更易分明。佩戴这样的校徽，使学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此外，在张学良担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还请刘半农先生创作了校歌，以此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3）提高民族忧患意识

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张学良将军既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的熏陶。张学良在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悟出一个道理：国家要富强，就得培养人才，要想使东北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不让日本人欺负，必须发展教育。在教育问题上，张学良经过思考，很早就得出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即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就任奉天军务督办时，他即提出要把发展经济，推动教育事业当作大事来抓。1928年6月21日，张学良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谈其政治纲领要点时，再一次把发展教育放在突出的地位。他说：“连年用兵，人生已苦不堪言，吾之政见大纲，将为维持和平，内部整理则注重在教育。吾父生时之财产共值一千万元，特用作推广三省教育。”^[34]张学良在其他场合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中国的今日与外人比，当然是落后国家，其最大原因，即在教育落后。”他进而要求学生：“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立定志向，振奋精神，努力作人，努力向学”“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才实学，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重任”。他还向一些学校负责人指出，要办好教育，关键在于能“知需要，务实际，肯努力”“非才无以救国，非学无以成才”，要求他们努力整顿校务，严格管理，注重实际，增益效能。

1931年东北军退守关内以后，张学良为了教育更多的东北青年，还大力支持其他教育者办学。1935年夏，车向忱在陕西省西安街头看到失家失学的东北儿童，取得张学良的支持后，在西安创办了私立东北竞存小学。张学良不仅重视对学生进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也注重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1935年，张学良调李荫春、阎珀玉、张登文等十余人至武昌行营充任中下级职员，并命李荫春组织同泽新民储才馆毕业同学会，让学生们做好抗日的准备，不要当消极的流亡分子。此外，还叫洪钊、应德田、王中立、王德生等组织“东大校友会”，号召同学们团结各地的民主人士，为东北地区的抗日作点贡献。一二·九运动后，华北形势日趋紧张，张学良为了使广大学生获得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和便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把东北大学工学院和补习班迁往西安，以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的原址为校址，成立东北大学西安分校，后又拨款15万元，在原有校园的基础上，新建校舍。张学良有感于九一八事变后国破校散的处境，更期望东北大学学生不辜负历史的重托，在修新校舍的奠基石上慷慨题词：“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勸尔多士，复我河山！”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心境的真实流露，表明了他勉励师生们共同努力恢复失去山河的情感。

张学良如此倾心爱国教育事业并非偶然。首先在于他深受尊师重教这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教育思想，如郑观应的“教育为立国之本”论等，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次，在于他对教育地位与作用的悉心思考，他认为，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

之出发点，办学在于培养适用人才，以促进国家现代化，这既是他的教育观，也是他倾心教育事业的思想动因。

(4) 培养公民的国格和人格

新民小学的教育以灌输爱国思想，反抗外侮为宗旨。他指出：“中华民国的教育，不像从前为个人而求学，为家庭而求学，现在是为国家而求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及一些中学生流亡关内，张学良要求学生更要坚定救国的决心，要有自我牺牲精神。他说：“复兴民族之责任，固是在全国人民之身上，但东北青年所负之责任，比较重大。”“所以要受苦我先去，要牺牲，我先去，要流血我先去，没有这种精神，谈不到救国自强，东北大学的学生要没有这种勇气，不必在东北大学。”由于张学良坚持实行爱国主义教育，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绝大多数学生都先后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今天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张学良始终把拯救国难、复兴民族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在今天的我们，个人的前途一点也没有了，有之，只是整个民族的前途。”他一直在思考，人类全是圆颅方趾，为什么我们要受人家的欺凌？我们同是国家，同是民族，为什么我们在国际间要受这样的压迫？即使在被“管束”后，他也曾有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先研究明史，后研究清史，最后研究民国史，目的就是想弄清楚近百年来老是受外国欺凌的原因。他常说：“我们的苦痛都是我们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债，我们今后万勿再给子孙留下去。”我们凭着什么去抵抗这一群逼在门前的债主，凭的就是从自己做起，从即刻做

起。他教育他的部下：不可自暴自弃，以为谋国有人即可袖手旁观，而存偷安苟活之心，须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民一日不安全，国家一日不稳固，我们就应当引为奇耻大辱；要时刻牢记，这个国家是谁的？我应如何完成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要有“中国不会亡，何以不亡，有我在；中国能复兴，何以复兴，有我在的”舍我其谁的精神。张学良之所以有如此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就在于他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一方面，他认为个人在国家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说：你是中国四万万中的一个单位，这犹如细胞对于一个生物全体的组织，每个单位都能表现出他的力量，则整个国家当然可以强盛，缺了你或你不能在集团中表现出作用，则必然于整个国家中减少了一份生力。个人在国家里面诚极渺小，但没有一个一个渺小的个人，也就没有国家了。所以，个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任何个人不应当轻视他自己。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国家的问题高于个人的问题。自然，没有自己焉能有国家，但没有国家又焉能有自己？如国家问题不解决，则个人问题永无解决之日，正如一株树不能根深，焉能蒂固？我们应当视国家问题高于个人问题。总之，在他看来，个人是国家的单位，国家是个人的集体，所以，每个人对于国家的复兴都有很大的责任。这说明他的高度的民族责任感是以深刻的理性认识为坚实基础的。

张学良还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他认为只有完善的人格，才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所谓人格，就是协调统帅一个人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力量，是人的特质的独特模式，而张学良的这种“综合性力量”和“独特模式”主要表现在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淡于荣利等

方面，其最大特点就是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张学良的政治生命面对的是国家内讧、外侮，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

基于对现实的深切体验和悉心思考，使他的人格深处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他深为国家民族的现状及未来担忧。他不仅忧“内讧、外侮国势阽危”，而且忧“消极、自私、内争”的国民人格。

(5) 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东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丰富的资源，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膨胀的侵略野心促使他们利用各种方式来达到侵略目的。除了公然的武力掠夺和经济侵略外，还利用思想文化的武器，对东北地区进行文化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长期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开始实施其野蛮的统治，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更加全面推行它的奴化教育政策。这集中体现在伪满《新国家教育大纲》的三条根本方针中，即所谓的教育日语化、共荣化和职业化。根据这一方针，在日本人主持下，先后成立了伪“教育筹备委员会”“奉天省教育厅”。重新组建日满学校，各校校长、训导主任等都由日本人担任，派日本人对中国师生进行监督。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奴化教育还体现在“新学制”的实施上，其根本特点是殖民奴役性。伪“民生部”的“训令”里说：“新学制”的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1942年后，在小学专设一门“建国精神”课。所谓“建国精神”，讲的是“日满一德一心”“日本亲邦”“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内容。伪“文教部”在“解释”中说：“从低年级起，即选择与亲近日

本之感情的材料，渐次趋向至日本国之国体精神。”这就是要中国人逆来顺受，充当日本殖民主义者任意驱使的“忠良”亡国奴才。

根据齐红深主编的《东北地方教育史》一书中的统计，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地区，由南到北，从旅顺、大连到长春、哈尔滨，办了 73 所小学、8 所普通中学、4 所普通女子中学、3 所工科教育学校、2 所农科教育学校、3 所商科教育学校、1 所师范教育学校，还创办了满洲医科大学、旅顺工科大学、南满洲工业专门学校、教育专门学校等高等教育。这充分说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影响，从小学抓起，直到高等教育，不断加深。不仅如此，日本帝国主义者还看中了社会教育的普遍传播作用，在东北地区办了 32 所实业补习学校、11 所家政女学校、28 所幼稚园、20 个图书馆^{[8]236-238}，对东北人民施以日本的影响和教化。日本帝国主义者口口声声打着与中国同源同宗、同种同文的口号，在东北地区无孔不入地兜售着“日满亲善，华日一家”的麻醉剂，妄图麻痹东北人民，瓦解东北人民的斗志，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取胜，进而变东北为他们的殖民地。与此同时，美、俄等帝国主义也不甘示弱，在东北大办教育。他们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等，要与日本争高低。至九一八事变前，共有教会初等小学 223 所、高等小学 39 所、中学 16 所^{[8]240}，还有奉天医科大学、文会书院等高等教育。这足以说明，在利用文化教育进行侵略这一方式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绝不落后于日本。

帝国主义列强在东北创办形形色色、各级各类的学校绝不止于上述所列，其利用殖民主义教育进行文化渗

透的侵略目的昭然若揭。东北当局认识到列强的侵略实质，一方面领导东北人民掀起收回教育权的斗争，另一方面开始尽力兴办自己的教育。在张作霖统治东北的时期，已经开始重视教育，到张学良执政东北后，东北教育事业蓬勃地开展起来，至九一八事变前，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张学良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尽力兴办教育，与外国在东北所办教育竞争，不仅起到了制约和抑制的作用，而且还有效地抵制了西方与东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侵略，打击了列强企图用奴化教育来同化东北的狂妄野心，为振兴东北地方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东北人民树立起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九一八事变后，虽然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很严重，但东北地区的人没有沦陷，原因之一就是张学良在东北地区的教育深入人心。

张学良支持和兴办教育的实践活动，在东北地区掀起了私人兴办教育的热潮，他所起到的实验和榜样作用是不可磨灭的。这对东北地区普及教育，提高民众受教育程度，增强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不仅为东北地区，而且为国家建设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才。至今仍活跃在海峡两岸的知名人士有不少是东北培养出来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变前，团结在张学良身边主张联共抗日的文武志士绝大多数是东北培养出来的。他们中的许多人直接加入到抗日战争中，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张学良校长的谆谆教诲下，许多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毅然投笔从戎，奔向为国捐躯的战场，甚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1925 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东北大学全校学生罢课，于 6 月 5 日召开大会，声讨日、英帝国主义残杀我同胞的罪行，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严惩祸首，收回一切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项请愿要求。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流亡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挺身而出，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大游行中，东北大学学生每次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他们手挽手，肩并肩，不断齐声高呼：“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展示了东北大学学生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虽然两次示威游行都遭到手持大刀、棍棒、水龙头的军警的镇压，有的学生受伤，有的学生被捕入狱，但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始终英勇不屈。据不完全统计，曾在东北大学学习或工作的学生、教师，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共计 54 人。

总之，重视对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张学良办东北大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并且培育和形成了东北大学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东北大学建校 80 多年来，这种爱国主义传统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东大人。

(6) 注重军队的教育工作

① 爱国主义教育。张学良以炽热的爱国情怀、优秀的指挥才能，与杨虎城一道，成功地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一令世人为之瞩目的爱国壮举，成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共御外侮的千古功臣。然而，蒋介石却背信弃义，无理扣压了张学良，使他“大鹏有翅愁难展”，抗日报国无门。但张学良多年呕心沥血、苦心栽培的广大东北

军将士强压忿忿之情，不负将军所望，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屡建功勋。纵览历史这一页，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东北军是一支军事素质良好、战斗力强大、装备较先进的军队，是一支富有民族正义感和强烈爱国思想的军队。这支军队坚决反对祖国分裂，力主抵抗外来侵略，在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展开和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广大官兵在抗日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战斗力和强烈的民族精神，是张学良长期致力于东北军的军事教育和爱国教育的结果。可以说，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军事教育和爱国教育为东北军在抗日战场上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提供了重要的军事保障与政治保障。没有张学良对旧东北军的军事上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就没有东北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杰出表现。他通过积极筹办各种军事教育机构，倡导东北军官兵学习军事，为东北军抗日提供了军事保障，同时张学良坚持把爱国教育作为军事教育的必修课，把培养东北军官兵的民族气节和激发爱国热情作为重点，为东北军抗日提供了政治保障。

② 正式军校教育。张学良积极筹办各种军事教育机构，倡导东北军官兵学习军事，为东北军抗日提供了军事保障。在学习期间，张学良与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战术教官郭松龄结为莫逆之交。后来，两人分别任奉军三、八两旅旅长。张学良认为：这样的旧式军队谈何战斗力？要想在战争中赢得主动，这样的部队必须改组。因此，他主张建新军，用新人。他支持郭松龄，并积极与其合作，重用知识分子，整顿军容风纪。要求军官学习军事知识，各级军官必须接受正式军校教育，考试合格。成绩优秀者，可选送出国深造。并决定，不再收编

土匪、重用绿林，而是从劳动人民和穷学生中招兵，严格训练。张学良、郭松龄二人带领的三旅和八旅，很快成为东北军的精锐力量，战功最大。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学良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在老师的支持下，他亲任整军经武最高执行机关的要职，即整训处的参谋长，建立空军、海军，加强兵工厂建设，并扩建讲武堂，招收中学生和有中学文化的军士，其他专业技术的军佐和军士也都要进行正规训练。1928年，张学良还创办了高等军学研究班，召集曾在正式军官学校（如保定军官学校或东北讲武堂）毕业的现职参谋，研究高深的军事学理，并确定其为东北军的高等军事教育机关，一切依照陆军大学办理，授以陆军大学的主要课程，学期为两年，每年招考一期学员。张学良很重视师资力量，在开办时，聘请日本大佐浦澄江等为兵学教官，以后由本国及日本陆大毕业之军官授课。张学良还积极创办各兵种研究班，当时有航空教育班，步兵、炮兵、工兵研究班，还有军需、军医、军兽医、军械教育班等。这些研究班均为专门学校性质，是仿照日本各专科学校的形式创办的，招收讲武堂或各军官学校毕业并在部队任职一年以上的现职军官入班肄业。其所授之科目，基本上与日本各专科学校相同，并由日本各专科学校毕业的留学生担任教官。如炮兵研究班是仿照日本横须贺野战炮兵学校创办的，主持该班教导的吴克仁（教育长）、战术教官陈昶新、射击教官何宏远都毕业于日本炮兵学校，他还聘请外教（如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日本教官仓岗繁太郎）讲授炮兵战术。

③ 选派出国留学。张学良积极倡导选送优秀人才出国留学，培养更高级的军事人才。1923年，东北军成立

了陆军整理处，张学良和郭松龄倡导选送优秀者赴日、法留学，以陆军整理处为派遣单位，张学良和郭松龄领导的二旅、六旅（由三旅、八旅改编）被选送者居多。当年秋，选送一批，入日本陆军大学的有徐祖诒等 6 人，入步兵专门学校的有张学成等 5 人，入骑兵专门学校的有郭希鹏等 5 人，入炮兵专门学校的有刘翰东等 3 人，入工兵专门学校的有郭子珍等 2 人。同年，张学良领导的航空处也选送赴法学航空者，计有徐世英等 12 人。1925 年 3 月，张学良又从军官教育班中选送学员赴法学航空，计有葛世昌等 28 人。赴法学习陆军的有李健勋等 2 人，学机械的有杜采林等 3 人，另有翻译 2 人，共计 35 人。1926 年 4 月，又组织 28 人，称为“东北留日将校委员会”赴日。1926 年 5 月，又选送一批约 62 人赴日，这次除有 28 人学习步、骑、炮、工兵专科外，还有孙炎等 4 人学航空专科，有秦诚至等 19 人入陆军士官学校，有荆有岩等 3 人入陆军经理学校甲种班，有靳敬箴等 3 人入帝大经济系，有任作楫等 3 人入陆军军医学校。另有北京陆军部派送而归东北救济费用者张乃桓等 3 人。张学良从东北军中选送的留学生，从人数上看，一次比一次多，学习的科目也不断增加，由步、骑、工、炮、航空到机械制造、军医、经理等，应有尽有。由此可见，张学良在对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教育上，从科目的设置、人员的精选和名额的分配，到根据专业对留学国家的选择，可谓用心极致。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封建闭守的旧中国，年仅 20 余岁的张学良就能为提高部队军官的军政素质不惜代价，积极采取派遣出国留学的方法，不能不让后人对他的远见卓识发出由衷的赞叹。

④ 张学良坚持把爱国教育作为军事教育的必修课，把培养东北军官兵的民族气节和激发爱国热情作为重点，为东北军抗日提供了政治保障。张学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双重教育下长大的，与进步人士阎宝航、杜重远有着密切来往，接受了不少爱国民主思想。尤其是参加过民主革命活动的郭松龄，其为人正直、严于律己的品格，敏思好学、志于改革的作风，深受张学良敬重，对他影响至深。良师益友的启迪、目睹了中华民族饱受蹂躏的悲惨现实，以及有识之士为中华复兴前赴后继的英勇壮举，大大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息内争、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渐渐形成，他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早期的东北军和东北讲武堂的教育有着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主要强调师生、同学、同乡之间的义气。为了巩固统治，官兵们接受的都是封建家长式的教育，被灌输的都是从一而终的愚忠思想。此外，告诫学员的也仅局限于当兵的基本道德准则：扣盗饷械可耻，为爵禄来可耻，品行恶劣可耻，见地不高可耻，能力不如人可耻，作战无勇气可耻。但张学良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从少年时代起，就崇尚民族英雄，对在战乱中煎熬的民众常生恻隐之心。他深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是军人的天职，于是，他与郭松龄一起，把“中国近代外祸史”列为三旅、八旅官兵的必修课，并把这一爱国主义教育列为整军改革的主要内容。从此，爱国教育成为东北军军事教育的必修课。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更懂得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何等重要。他主政后，决定把爱国教育作为一切军事教育的必修课，决心把爱国主义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东北军官兵的头脑中去。

张学良加强军队思想教育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无理扣压了张学良，东北军被施行了二二缩编，编为五个步兵军、一个骑兵军，即四十九军、五十一军、五十三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骑兵第二军。此时的东北军官兵经过了张学良多年的苦心栽培，已成为胸怀大志、顾全大局的军人。他们虽然心存怨愤，但仍能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开赴各个抗日战场，奋勇杀敌。他们转战在华北战场、松沪战场和山东敌后战场，先后参加过保定会战、松沪会战、忻口会战、淮河会战、台儿庄会战，也参加过保卫南京、武汉、徐州等战役以及打通中缅国际交通线的战斗。在这些重大的战役和战斗中，东北军广大官兵浴血奋战，许多将士为国捐躯，谱写出一曲曲爱国主义的颂歌。在中国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东北军绝大多数官兵始终没有忘记张学良在军事素质上对他们的苦心栽培，没有忘记张学良对他们抗日救国、复土还乡的谆谆教诲，在抗日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不屈不挠，英勇杀敌。他们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忠勇精神，可歌可泣，感人至深。东北军抗日救国的史实表明：东北军从一支打内战、抢地盘、战斗力低下的军阀旧部到积极联共、团结抗日、屡建功勋的抗日劲旅，从对张氏父子的个人尊崇升华为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这一切无不与张学良长期坚持对东北军进行军事教育和爱国教育有关。东北军血溅失地、贡献中华的历史功绩与张学良的军事、爱国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将一并永载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上。

5.3 教育主体论——以“任用贤能”为中心

5.3.1 教育主体论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认为，教育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人类的自身生产，绝不只是“种的繁衍”，而是通过教育这一社会活动去生产和创造完全意义上的人，这种“人”能够在完成人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和调整的同时，完成人自身的认识和调整。人性是人的本质的最高体现，如何塑造现代完满的人性，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教育必须把塑造完满的人性视为自己的本职工作，唤起人性，培养人性，促进人性的发展。有学者甚至认为，衡量教育的最根本标准应当是：它的人性水准，它在传播、促进人性成长方面的贡献。当然，我们所讲的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发展要求的人性^[39]。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正是教育的作用，人才从与兽性无异的自然存在物进化为社会存在物；也正是教育的作用，人的自然属性才生出人所独有的精神属性，成为改造世界和人类自身的主要力量。正是人的意识性，才使人由自然存在物变成社会存在物。教育要履行塑造人性这种职责，首先应具有人性特征，成为真正有人性的教育。这就要求教育必须以人为根本出发点，必须对人予以最大的尊重。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必须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充分发掘人的内在潜能，促进人最大可能的发展。教育只有尊重人，才能培养人，发掘人的最大潜能；反之，则会压抑人的发展。

教育主体论的内涵可以剖析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揭示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地位。究竟什么是主体？一般观点认为，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的哲学范畴，属于认识论领域，即主体是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承担者、体现者——人，而客体是主体指向的对象。但在教育过程中，在教师、学生和教育措施三要素中，无疑学生是第一要素。把教师放在教育过程中，并相对于学生的主体地位来考察，教师是为培养、发展、塑造学生这个主体服务的。二是学生主体论与发挥教师指导作用的关系。学生主体论并不否认教师的指导作用，相反，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一，教师的正确指导、因材施教是培养学生主体性的前提条件；其二，教师的指导作用只有在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调动学生主体积极性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来。因为教师的作用只有当学生这一教育主体愿意接受时，它才能得以发挥；反之，没有学生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教师的指导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5.3.2 张学良以任用贤能为中心的教育主体论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中，一个富有特色的就是他的教育主体观，这种主体观始终贯彻的是：在教育过程中，学生是教育过程三要素中的第一要素；要培养好的学生，必须首先有优秀的教师和优良的教学环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张学良积极聘任优秀的管理人才、大师级的教授，并且鼓励学术交流和人才交流，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极大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1) 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

任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人才在其中的主导

作用。东北大学从创办之日起，就坚持惟才是用、惟贤是举的用人之道。张学良校长慧眼识人，他担任东北大学校长不久，就聘请了留英学生并在牛津大学获经济博士学位的宁恩承先生担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代理他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张学良校长所以看中宁恩成，因为他是敢于否定“权威”，发扬教学民主的人物，而宁恩成则以“士为知己者死”的决心接受了聘任。接着，在张学良校长主持下，成立了“东北大学委员会”，他自任大学委员会的委员长，邀请南开大学创始人、南开大学校长、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等任委员，请他们出谋划策，办好东北大学，实行集体领导制。实践“名师出高徒”的大量工作就是从聘请国内知识界名流开始的。

东北大学于1928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建筑学系。由梁思成教授担任建筑学系主任。纺织业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计。而当时只有江苏南通纺织学校，为了纺织业的发展，培养纺织人才，经张学良校长主持的教务会议决定，东北大学于1928年成立了纺织学系，聘请留美纺织学硕士张佑为系主任。中国是农业大国，旧中国的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国内有农学院的地方也很少，东北大学于1929年又成立了农学院，院长由留美农学专家刘国明担任。校长张学良将军对农学院的学生说：“希望你们能常到农村去，知道他们的思想如何？心理如何？作将来可以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准备。”“农科学生，毕业后不从事研究农业，不与老农一同耕田，那种学习是难以强国，也难以为民造福的。”

（2）聘任大师级的教师

张学良办教育，始终注意到名师这一点。他总是礼

贤下士，不惜重金聘请知识界的名流来东北大学任教。东北大学名流荟萃，形成了强大的教师阵容，推动了东北大学的发展。当时，在东北大学任教的有：理学院聘请的数学家冯祖荀教授，化学家庄长恭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童雋教授，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教授、潘成孝教授等；文、法学院聘请的名教授则有黄侃、章士钊、梁漱溟、高亨、林韵、罗文干、余启昌、吴贯因、江之泳等；教育学院有心理学家陈雪屏教授、国学专家马宗芎教授、统计学家孙宗钰教授、历史学家周传儒教授；体育方面有郝更生教授、吴蕴瑞教授、申国权教授和宋君复教授等。当年东北大学的教师队伍是很强大的。除上述提到的名家以外，教师中很多都是从国外著名大学毕业的学士、硕士或博士。据不完全统计，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的300名教授中，有近一半是从国外学成后来东北大学任教的，包括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国的里昂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等。和东北大学的建筑一样，中西合璧，交映生辉，学术思想活跃，“学缘”结构合理，东北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张学良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教育在东北新建设中的作用，因而当东北著名学者于省吾建议重新开办萃升书院时，他便立即应允，并拨款相助。萃升书院不同于一般学校，该院聘请著名的国学大师吴迁燮、王树楠、吴生、高步瀛担任主讲，以传授“国学”为宗旨，专门讲授经史文学，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爱国热情。萃升书院通过考试招生，每逢开课，听讲者纷至沓来，课堂座无虚席；课暇之时，赶去

求教之学人也络绎不绝，书院呈现一片兴盛的景象。虽然九一八事变后，萃升书院被再次关闭，但该院宣扬的爱国主义精神仍激励着东三省人民奋起抗争。更为重要的是，于省吾等人编写的《萃升书院讲义丛刊》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东北大学汇集了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这是宝贵的智力资源，是发展经济、强大祖国的直接推动力，为地方经济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生物系刘崇乐教授取得中美基金会的资助，建立了昆虫研究所，进行生物理论和病虫害的研究；化学系庄长恭教授利用现代科学对中药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研究，为发扬中国传统药学提供了现代科学依据；农学院以农场为基地，进行各种理论研究；纺织系的实验室设备是最先进的，还拟成立研究院，作为培训人才基地，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这一系列研究都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打下了基础，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一批批德才兼备的实用人才。

（3）鼓励开放交流，培养优秀人才

东北大学还积极聘请国外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授课。如法国科学院永久书记兼国际研究会总书记拉尧华博士为理工科学生讲“火山之现象”，美国教育设计专家克伯莘博士讲授“教育变迁及其在教育上的意义”，英国威尔大学外交历史学教授非卜司特讲授“中英关系与英国新政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金泽尔在东北大学化学系搞研究和授课，法国里昂大学中国文学主任马古烈博士来东北大学作学术报告等^[40]。国内外学者各自发挥所长，相互补充，推动着东北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迅猛发展。如张学良与张伯苓的交往就深刻地体现

了张学良虚心学习，互相交流，求贤若渴的思想。与此同时，张伯苓本人还接受张学良聘请，兼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多次应邀赴沈阳指导工作，帮助改革和制定建设方案。又曾派遣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和体育课主任章辑五等人先后去东北大学帮助工作。

张伯苓还割爱，把自己的校务得力助手、南开四校事务主任孟琴襄借调给东北大学一年，帮助东北大学整顿后勤工作。孟琴襄是张伯苓办学的四大金刚之一，是校务管理的行家里手，到东北大学担任事务部主任，带领员工辛勤工作，不久，校园就大变样：校园电灯亮了，马路平整了，下水道通畅了，教工宿舍不再怨声载道了，工作一年下来，给东北大学节约了 20 万元后勤经费，誉满沈阳。由于东北大学多方面学习南开大学办学经验和校务管理经验，成效显著，所以沈阳传媒报道说：“南开精神已由海河之滨移来辽河之滨了！”

名师出高徒。由于不少著名学者纷纷出关汇聚东北大学，使得东北大学学生也迅速增加。1929 年度，东北大学学生共计 1976 人。1931 年度，学生共计 2015 人，达到辽宁有史以来大学生最多的一年。自 1929 年 7 月第一届起，至 1935 年 7 月第七届止，东北大学学生共毕业 1440 人，本科 1110 人，专科 330 人。毕业生修满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检验合格者，被授予学士学位。各学院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由学校送到欧美留学深造^[41]。东北大学学生通过名师的培育，迅速成材，名扬国内外，桃李满天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55 年，仅东北大学理工学院毕业生就有 10 多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多人成为纽约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一批东北大学学生先后担任省长、部长、市长等领

导职务；还有的担任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负责人；更多的学生成为国内外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实业家；苗可秀等一批东北大学学生成为抗日先锋，为国光荣捐躯。一批又一批的东北大学学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及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学良在东北推进的现代化教育，为东北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化的新型人才，如经济学家闫宝航，教育学家陈光孚、金锡如，以及曾代表中国第一个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刘长春，等等。事实表明，张学良的现代教育观以及东北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第6章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当代思考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每当面临国家命运转折的重大时刻，需要他个人做出抉择时，他都站在了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显现出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可以说，这种爱国思想奠定了张学良一生行动的思想基础。他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正是因为建立在此之上，所以显得尤为珍贵。

当今世界形势发展日新月异，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使各个国家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科学技术的作用在当代更加突出，而一个国家的教育不仅代表教育行业的本身，而且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从而影响着这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虽然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张学良的教育思想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在当代教育和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值得人们思考。

6.1 张学良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

6.1.1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的现代化

(1) 教育现代化的探析

① 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概述。教育现代化是现代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现代化的共同属性，又有其自身的属性。它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教

育变动过程，是一个对传统教育瓦解、扬弃、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也就是为使教育适应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面向未来整合、重建教育的过程，如顾明远教授认为，教育现代化是传统教育转化为现代教育的过程^[42]。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很广泛，包括教育手段现代化、教育理念现代化、教育管理现代化等。

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教育内涵上来说，包括教育思想现代化、教育体制现代化、教育内容和方法现代化、办学条件现代化、师资队伍现代化、教育管理现代化、社区教育现代化等。从纵向序列分析，又包括学前教育现代化、初等教育现代化、中等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职业教育现代化、成人教育现代化等。二是从教育外延来说，包括科学的教育决策和发展战略、健全的教育投入机制、优化的教育环境、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中其他子系统的协调平衡等。现代化的根本标志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比较全面、比较自由、比较充分的发展。教育为立人之本，人的现代化、现代人的培养离不开现代化的教育。教育是决定一个人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决定了个人现代化的水平和现代性品质的转变。因此，教育现代化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21 世纪，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浪潮正汹涌澎湃，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深入研讨中国的教育现代化问题，联系世界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目标，是中国教育研究的一个方向。新中国成立 50 多年来发展的伟大实践表明，研究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指标、计量和对策，制定现

实教育现代化的标准,动态地掌握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势等,是衡量教育现代化的方向、速率、程度和加快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如何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② 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现状。目前,我国的教育水平偏低,现代化水平不高。我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3%,远远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从教育现代化国家情况看,80%的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5% 以上,10% 的国家在 4% 以上。日本、韩国此项比重较低,但私立教育十分发达,私人资助的巨大数额弥补了政府投入的不足。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成为教育数量少、质量低的首因,也成为制约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大多数教育现代化国家留级生百分比为零。有 6 个国家在 2%~4%。我国应继续努力减少留级生,提高学生的巩固率,让有限的教育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益。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在 29%,离教育现代化底线 60% 距离较大。在发达国家中,比利时等 3 国超过 90%,挪威等 3 国在 94%~98%,韩国等在 81%~85%,新西兰等 8 国在 50%~77%。我国小学净入学率为 99%,已达到教育现代化的底线。不少发达国家的小学净入学率已达 100%。我国中学净入学率为 58%,离教育现代化底线 90% 还有不小距离。绝大多数教育现代化国家的中学净入学率在 90% 以上,只有 6 个国家在 78%~89%。美国、加拿大等已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芬兰、新西兰、挪威、韩国在 52%~67%,法国等在 40%~50%。可见,中国与其他教育现代化国家相比,最大的差距在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上。我国预期的正规教育年数为 9.3

年,离教育现代化底线13年还差3.7年。在教育现代化国家中,加拿大最高,为17.5年,新西兰等8国在15年以上,瑞士等7国在14年以上,最低的爱尔兰为13.6年。我国要提高预期的正规教育的年数,就要继续扩大中、高等教育。我国每10万居民中的大学生数为478人,离教育现代化的底线还差1522人。而加拿大为6984人,美国、澳大利亚为5300~5500人,韩国、芬兰、新西兰等国为4000~5000人,日本等9国为3000~4000人。我国成人识字率为81.5%,离教育现代化底线还差8.5%。绝大多数教育现代化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在98%以上。我国仍需加强青壮年的教育和义务教育,杜绝新文盲^[43]。

综上所述,在教育现代化的一些评价指标中,我国的公共教育经费、留级生的百分比、小学净入学率等已达到底线,学前教育毛入学率、成人识字率已接近底线,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学净入学率、预期的正规教育年数、每10万居民中的大学生人数等指标仍有一定差距,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和大学毛入学率存在巨大差距,这说明,直到今天,我们距离教育现代化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因此,如今研究张学良现代化的教育思想,在解决教育的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张学良教育现代化思想的内容及其当代的借鉴意义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体现了一条正确的教育现代化之路,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 力争办学条件现代化。张学良支持东北教育事业不仅在数量、规模上拓展,还在办学条件上追求先进。

在他创办的学校中，教学条件优越、设备完善。每个学校都设有现代化的校舍，如教学楼、办公楼、体育场馆、礼堂、特殊教室、仪器室、图书室、阅览室、寝室、浴室、教师新村一应俱全。各种模型、实验用品、博物挂图、植矿标本、写生用具、体育设施、显微镜、钢琴、馆藏图书、英文打字机无所不备，有的学校还设有植物实验室等。良好的教学环境、先进的教学设施，在全国同类学校中，堪称一流。社会教育在张学良的大力倡导下，到 1931 年 9 月止，也有了很大发展。据统计，辽宁省有图书馆 36 个、通俗教育馆 35 个、阅报所 49 个、讲习所 110 个；吉林省有图书馆 2 个、通俗教育馆 3 个、阅报所 21 个、讲习所 39 个；黑龙江省有图书馆 3 个、通俗教育馆 3 个、阅报所 6 个、讲习所 13 个^{[28]83}。

② 教育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张学良执政东北后，投资创办学校的同时，对东北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更加科学、合理，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学制系统方面，倡导与全国所实施的学制一致，采用“六六四制”，即初等教育六年、中学教育六年、高等教育四年。在具体教学制度上，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在东北大学建立考试委员会制度、实行学分制、公费留学制、贷款助学金制等规章制度，使学校校风、校纪更加正规、井然有序。在学校管理体制上，采取委员制，即学校领导由 11 人组成，其中有 1 名学生委员。凡属学校的重大事宜，均要经过委员会认真讨论而后实行，以利于集思广益，避免个人独断。这是推行教育管理民主化的重要措施，它使管理者充分发扬民主，调动了全体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使

之参与管理的过程。

张学良的这些思想是迈向现代化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今天,对于我们推行教育改革,仍有借鉴作用。现代化教育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不仅包括教育效率的提高和教育资源的迅速增长,而且包括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等方面的革新,这些都在张学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有所体现。通过张学良的振兴教育,东北地区教育事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学校、教师、学生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效益、层次、类别、结构水平大幅提高;教育体制、教育结构等方面不断革新。由此可以看出,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教育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已经具备现代教育的雏形,并逐步地向现代化教育迈进。

6.1.2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的公平化

(1) 教育公平化的探析

① 教育公平化的理论概述。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和公平理念一样,教育公平的理念也源远流长。孔子最早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朴素教育公平思想,古希腊的公民教育也隐含了民主教育的思想。近代社会曙光初现之际,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就致力于把新兴的市民阶级要求的“平等”推广到教育方面,寻求教育的公平。到20世纪初期,教育公平的思想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转化为立法措施,在法律上确立了人人都拥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马克思在1886年提出了“教育是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和每一个公民的真正利益”^[44]的教育平等的思想。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更是首次把“受教育权”确

认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不论任何社会阶层、经济条件、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公平体现为法律上的教育权利平等。然而，法律上的教育权利平等的理想在现实中还不能完全实现。

西方社会学家通过大规模的实证调查发现，教育权利的平等还受教育机会等各种社会的不平等因素制约，如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发展、社会阶层、人口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教育公平由教育权利平等进一步延伸为教育机会均等。所以，作为一种社会平等，教育公平不仅包括教育权利平等，而且包括教育机会平等。教育公平的理念是政治、经济领域的平等权利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在超越了身份制、等级制等将教育视为少数人特权的历史阶段后，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公正地享受教育机会，正成为现代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教育公平正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与教育有关的人最关心的问题”^[45]。

② 教育公平化存在的问题。

首先，地区差别与民族差别。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异特征最显著的国家之一。胡鞍钢等人的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地区差异比发达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大值还要大。而且“八五”期间出现了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同时呈扩大的趋势。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呈扩大趋势，最富地区与最穷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出现扩大趋势。各地区人均GDP绝对差距进一步扩大，最富地区与最穷地区人均GDP绝对差距进一步扩大。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7年，东部、中部、西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45:1:1.04和1:0.75:0.63。这是认识我国社会公平问题的一个基

本背景。在这一背景下，各地的教育差距十分明显，而且最发达地区和最贫困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在加大。1998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6.47%，81.87%和42.26%。据上海教育科学院智力所的研究，我国义务教育的差异度（不包括港澳台）可分五类地区：A类为北京、上海、天津，B类为辽宁、江苏、浙江、广东，而最差的E类地区包括宁夏、甘肃、云南、贵州、青海、西藏。1994年，以上三类地区人均GDP之比为5.6:2.9:1，当年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之比为3:2:1，与1988年的2.8:1.5:1相比，明显呈加大趋势。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04%（1991年），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该数据为8.41%。比较而言，少数民族学生在各类学校中在校生的比率不低，但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西部偏远地区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师资短缺，经费不足，普及义务教育都遇到极大困难。

其次，城乡差别与性别差别。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例为26.23%，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该比例为28.85%，1997年10月达29.92%。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城镇人口占39.78%，比1990年增加了9.86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城镇学校条件好，容易吸引外来学生，因此与上述城乡人口所占百分比相对应，普通中小学在校人数在城镇、农村中所占的比例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95年，农村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占全国适龄儿童总数的80%以上。从1998年我国城乡普通中学的状况看，农村中学拥有初中教育生源一半多，但在高中阶段，在校生却不到14%。因此，城乡差别的第一个表现是农村中

小学入学率相对较低。第二个表现是农村学生辍学率、流失率高，初中生辍学率上升。1998 年全国初中生在校辍学率为 3.23%，达 167 万人，比 1997 年上升 0.09 个百分点；而农村初中生辍学率达 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97 个百分点，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竟高于 10%。应当指出，有些地区的农村学生实际辍学率可能比统计数据要高得多。第三个表现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足，危房面积较大。虽然危房在全国中小学总校舍中所占比例不足 1%，但在中西部农村，远远不止这一数字。如宁夏的危房面积在中、小学房舍中分别占 5.32% 和 4.6%，新疆、青海这一比例分别为 4.05%，3% 和 3.16%，4.33%。有的贫困县危房面积高达 10% ~ 15%，个别地方超过 20%，如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小学危房率为 28.3%。城乡差别的另外几个表现是财政拨款以及农村教师工资问题。对于前者，近几年国家和政府已经向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有所倾斜，但距离根本上达到投资公平这一目标尚有很大差距，如 1995 年全国普通小学生的预算内事业支出为 265.78 元，农村为 198.69 元。最高的上海达到 1216.85 元，最低的河南为 144.20 元。全国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 492.04 元，农村为 392.59 元。最高的上海为 1535.83 元，最低的四川为 311.86 元。这种教育资源上的不公平必然带来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而后者则仍未得到相应的重视和解决，许多代课教师几个月甚至几年拿不到工资的现象亦出现在不少贫困地区。

近几年来，我国女性教育在整体上有了很大进步，发展的态势也很好，1998 年与 1990 年相比，男女童入

学率差距由 1.28 个百分点降至 0.14 个百分点，各级教育中，女学生、女教师的比率也逐年上升。女性教育问题集中在农村的贫困边远地区，主要表现为女童入学率低于男童，文盲率女性高于男性。1997 年，我国尚有 1.45 亿成人文盲，其中 3775 万青壮年文盲中，70% 为女性。“八五”期间，全国扫除文盲 2441 万人，女性仅占 41%，比男性低 18 个百分点。而在城市和高层次教育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在择业过程中，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这涉及到用人制度以及传统观念问题。

最后，阶层差别与职业差别。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社会阶层逐渐分化，贫富差距拉大，这成为研究公平问题的另一个角度。1994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中，最高收入的 20% 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 50.13%，中间层的 20% 家庭占总收入的 15%，最低收入的 20% 家庭仅占总收入的 4.27%。高收入家庭占总收入的比例很高，低收入和中间收入家庭占总收入的比例太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1979 年为 0.31，1988 年为 0.38，1994 年为 0.434，1997 年为 0.4577，超过国际上一般认为小于 0.4 的适度范围。而至 1996 年年底，我国城镇还有近 7000 万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生活费支出只相当于贫困线以上农户的 51%。在城镇中，由于企业效益差，大量下岗职工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成为新生的贫困人群。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贫困学生群的扩大。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实际的教育收费不断增加，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校园中“贫困生”“特困生”日益增多。对农村中大量出现的流失辍学生的调查显示，

贫困仍然是使许多人上不起学的第一位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即便是在前几年每年 1000 多元学费的条件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尚有 25% 左右的贫困生。研究表明，学费每增加 10%，约有 11% 的学生会因难以负担学费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些调查显示，在城市的重点中学以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存在明显差异，占人口 90% 以上的体力劳动者的孩子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北京市招生办统计，1990 年北京市录取新生 17248 人，其中干部、军人、职员子女占 78%，工农子女占 21%。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中，来自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的子女比重越来越高。而在军校、师范、农林、地矿等一些收费相对较低的学校，低收入阶层子女所占比重相对较大，这就从主观上造成了学生学业成功机会上的不平等^[46]。

② 张学良教育公平化思想的内容及其借鉴意义

张学良教育思想体现了丰富的公平化内容，其教育实践活动也在努力地实现教育公平。

① 主张男女平等教育。他不仅提倡男女公平，而且不分籍贯，都免收学费。东北大学建校初期，校长王永江是科举出身，反对男女合校，迫使东北有志的女学生远走关内升学深造。张学良主政后，提倡男女平等，主张男女都有受教育的均等权利。他深感女子教育不发达，于 1928 年在沈阳创办同泽女子中学。他曾为《同泽女子中学一览》一书作序道：“尝慨吾国旧俗，女子惟议酒食，习缝纫，而不读书。其读者，又惟学刺绣，工词章，而鲜实用。今学校制度，盖因时而制宜，诸生能循序而深造焉，则可以强国而保种，宁独一人一家计

而已。”^[47]并叙述了他创办该校宗旨是为了改变“女子惟议酒食，习缝纫，而不读书”之旧俗，使之“能循序而深造”，以达“强国而保种”之目的。张学良对同泽女子中学尤为关怀，他曾多次亲临同泽女子中学视察，“对校内教室、宿舍、图书馆、操场、办公室等设备、组织情况，无不详加询问”^[48]。张学良主政期间，东北各级政府还制定了诸多重视女子教育的政策、法令。1929年3月，辽宁省教育厅通过了《扩充女子教育案》，其中规定：“扩充省立及县立女子初级中学，各县并须斟酌地方情形添设高级中学；省城及外县均应添设女子小学校；乡村都市增设国民简易学校或工读及半日学校使失学妇女得有读书之机会；在义务教育期间，女子小学生得免纳学费以资提倡。”^[49]又下令辽宁省教育会长为抗俄阵亡将士的子女入学一律免收学费。

② 主张平民教育。他曾召开一次军务会议，要求官兵一律要识字。原东北军团长吴元直回忆说：“张司令有一次召见团级军官训话时讲，人没有文化就会愚昧，愚昧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由各团负责，以连为单位建立识字班，短期要扫除文盲，成绩突出者奖，顶着不办者罚。”不仅在东北军中开展识字扫除文盲运动，而且东北政务委员会也下达指示，要求各县大力提倡办识字班，目的是“唤起民众，促其识字，明了时势，认识国体。”^[50]从此，辽宁的平民教育在张学良的提倡和大力支持下，有了长足发展。以辽宁省为例，到1930年，共有大学、高级中学15所，职业学校40所，高初中合校2所，其他中学4所，小学9826所，幼稚园71所，共有学生64万多人；另有平民学校124所，学生700余人，还包括一些军事院校，这些院校很多都是在乡下办

的，招收了很多贫苦人家的孩子^{[28]180}。

③ 主张基础教育。张学良在东北的那个时代，地方经济落后，国库空虚，致使教育事业非常落后。为了办中小学教育，张学良加大扶持中小学力度，关心教员和学生。在发展基础教育中，经费问题至关重要。张学良采取多种手段，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张作霖死后不久，张学良便从其父的治丧费中，拨出一部分，移作各省小学教育基金。同时，他还采取开源节流的手段，谋求收支平衡，裁军屯垦，调整行政机构，精简人员，将这方面的一些开支用作发展教育的经费，致使教育经费大大增加。以辽宁省为例，1928 年教育经费为现洋 528 万元，1929 年便猛增到 1635 万元。另外，他还捐私款现洋 500 万元，建立“汉卿教育基金”，年息 70 多万元，主要用作中小学教员薪金。如果“按张学良私办学校教员薪水从优计算，这笔利息每年可供 1600 个小学教员或 600 多中学教员的全年薪金。”由此可见张学良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51]。

当下，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存在以及促进我国公民素质的提高，不仅是教育学家关心的事情，更是党和政府重视的大事。基础教育 + 平民教育 + 男女平等，仍然是当今公平教育的内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公平教育的内涵，而且对于我们当今社会发展教育事业，以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

6.1.3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的“人性化”

(1) 教育“人性化”的探析

① 教育“人性化”的理论概述。教育的“人性化”，

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与完满人性的生成。教育面对的是人，教育是人的教育，是为人的教育。“人是教育的出发点”这一命题背后昭示了一种深刻的人性关怀。尽管现在看来，这是学术界都比较公认的论点，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原始社会的教育目的非常本真，即关心生命延续和种族延续。阶级社会里，教育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中国古代的教育似乎非常重视人，但这里的人是一种“人伦之人”，是“人伦”大背景之下的“他者之人”，个人的价值则遭到放逐^[52]。西方中世纪一度出现宗教统治科学、神奴役人的现象。当文艺复兴的先哲们从备受压抑的心底呼喊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时，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今天，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人，人们已经达成共识。人们痛切地感受到“教育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生活需要，成为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肯定，不受教育者不成人，不受教育者不可能拥有真正生活，教育与人的存在无法分开。”^[53]于是，人们对教育寄予无限的希望，每当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新的危机，人们便会将视线转向教育，力图通过教育解决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发掘教育的种种功能：生态功能、消费功能、就业功能、国防功能……^[54]全世界都要求教育做得更多、更好一些，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文化和伦理方面的需要，应对技术的挑战等，每个人都对教育充满期待，都期待教育更加真实地为“人”服务。于是，人们提出了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等诸多教育概念。

② 当今“人性化”教育的现状及其内容。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知识爆炸、经济腾飞的时代，是信

息时代。在这样的信息社会里，社会生产要素将实现由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变。知识成为人们的主要财富，信息成为知识的基础，高素质人才成为社会发展的依托。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造就人的社会产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在《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教育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摧残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二是扼杀青少年的创造力的开发；三是造成青少年知识陈旧贫乏。”^[65]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虽然上述观点言词有些尖锐，但现实确实不容乐观。一句话，我们的教育缺乏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思想意识。应该清楚地看到，在今后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将一直是社会精英与普通劳动者两个部分。社会精英是用多层次、多角度的“筛子”筛选出来的，但不是一筛定终身。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必然有一部分“精英”与“普通劳动者”相互转换、相互渗透。因此，以人为本是教育的根本所在。“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从微观上讲，主要内容有三：一是教育观念的创新——教育改革以观念的创新为先导。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学生看作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有独立人格尊严和巨大生命潜能的活的生命体，尊重、关心、爱护他们；以人为本，就是要相信人人都有创造的潜能，人人都能得到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承认不同学生的差异性，重视实施有差异的教学，使有差异的学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教育。二是教学模式的创新——教学模式的创新是教学改革的核心问题。以人为本，就是要设计探索性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对人类文化

知识进行再发现、再创造，从而构建起完整的认知结构；以人为本，就是要结合现实生活设计真实的、有思考价值的问题，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知识的价值，学习解决问题的策略；以人为本，还意味着在组织学生观察、思考、分析、讨论、争辩、论证的学习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与合作精神，倡导高尚的人文精神和课堂文明，使课堂成为学生释放潜能、收获成功的天地。三是教师素质的提高——这是教学改革的关键问题。知识经济时代赋予教育新的使命，从教学目标看，它更注重学生的发展和创新能力培养；从教育内容看，更注意和发现有书本知识的教育价值。因此，教师不仅要具备系统的知识，更要有一种锐意改革、善于创新的教育意识及高超的教育机智。因此，我们必须应变，应变才能适应；我们必须学习，学习才能生存；我们必须创新，创新才能前进！

从宏观上讲，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主要是把社会的目光集中在人身上，主要内容体现如下。

首先，要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把尊重人、关心人、教育人贯穿在教育的全过程，体现在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是塑造人，在教育活动中，人无疑处在中心位置。一方面，教育肩负着向受教育者传播“人是根本”理念的使命，使他们懂得和学会尊重人、关心人、相信人；另一方面，教育管理、教学活动、教育内容都应当体现对人的尊重和关注，把维护教育工作者、教师、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教育环境、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应当有利于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人的才能的发挥，有利于人的健康成长。大学之为大学，不

是因为有大楼，而是因为有大师。教育也是如此，“见物不见人”的教育，只能是失败的教育。

其次，要创建“以做人为中心”的素质教育。毫无疑问，教育的最基本职能是实现和完成个人的社会化，使个人成为完整、合格的社会成员。在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无非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学会做事，一是学会做人。前者主要是生存及劳动经验、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后者主要是理想人格的培养与塑造。这两者是不可或缺的。中国的教育素以“传道”见长，注重“做人”方面的教育，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甚至看不起“做事”方面的教育，于是产生那些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有感于传统教育的弊端，积极倡导“做事”方面的教育，突出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训练和培养，但“做人”方面的教育明显被削弱。曾经流行很广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名言，以及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近现代的教育就是劳动力的岗前培训或就业技能培训，传播知识与专业技能成了教育唯一的职能。因此，许多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受教育者，作为劳动者、专业技术人才是合格的，但作为公民、成人却不合格：会做事不会做人。素质教育的提出正是为了纠正现行教育的弊端，强调教育是对人的全面教育，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促进和实现人的健康、全面发展。简单地说，就是教育既要教会人做事，又要教会他做人。在一定意义上说，培养人格健康、全面发展的公民，比培养出色的劳动力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当今世界，国与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人力、人才的竞争，而人力、人才的竞

争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竞争，而不是单一技能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素质教育应当成为以做人人为中心的教育，成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育。

再次，要按照人的成长与发展规律办教育。同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教育本身的发展也有自己特殊的规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才能真正做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教育的基本规律首先是遵循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并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时，还要遵循个体成长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而不是任意塑造或随意培养。不可否认，在当前的教育中，违背教育规律特别是违背人的成长与发展规律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正是教育改革与发展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教育是对人的教育，也是人在教育，按照规律办事，尤其是按照人的成长与发展规律办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按照规律办事的前提是认识和掌握规律。因此，探索教育自身的规律，包括探索人的成长与发展的规律，本身就是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最后，要实施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发展战略。在我国，教育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的主人是全体人民，全体人民又是教育的真正受益者。教育事业的发展只有依靠全体人民的支持，才能实现；同时，教育只有致力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真正为全体人民服务，才能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人民的教育。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维护、发展、实现好人们的教育权利，是教育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教

育主人翁意识，确立教育主人翁地位，倡导全民办教育和全民受教育，都是全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各种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和最佳配置，但最重要的教育资源永远是人的资源、人才资源。能否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稳定的教师与教育工作者队伍，始终是教育成败的关键。教师、教育工作者身处教育工作第一线，是教育活动的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教育要以人为本，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以教育工作者为本。只有依靠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教育本身才能焕发生机与活力。教育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还必须把教育贯穿在人的发展的全过程中，把阶段性教育扩展为终身教育。这也是当今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终身教育的理念表明，教育已经成为伴随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的发展过程与人的发展过程正在成为同一个过程。从人的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发展教育，将使教育的本质得以极大的丰富。

② 张学良教育思想的教育人性化内容及其借鉴意义

提倡全面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我们今天针对“应试教育”弊病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其重心是强调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充分发挥人的主体精神和创新能力。身处旧中国的张学良，尽管没有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概念，但他在担任东北大学校长后，为该校确定的“德智体美群”的办学方针，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的丰富内涵。他经常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负责精神，激励和指导青年学生要有为国家、为民

族而努力学习的志向，要做一个德才兼备、情操高尚的现代青年。除了在智育方面一再要求学生专心求学，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外，张学良非常重视德育，尤其是人格教育。张学良也非常注重体育。他认为，体育代表着国家民族的精神，提倡体育的根本目的就是造成民族复兴的生力，一洗“东亚病夫”的屈辱称号。对于美育，张学良亦颇为关注。在仪容仪表方面，率先垂范，而且在奉天教育会副会长李象庚的积极建议下，提出在同泽中学及新民小学实行严格的标准化管埋，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统一制服，统一戴校徽、唱校歌，增强了学生爱校爱国的情怀、审美的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从而形成良好的校风。这一切提高了青年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分辨美丑的能力，开发了民智，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人们的心灵，对广大民众的觉醒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群育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西方的教育思想不同，它不以个体为本位，而以群体为本位。“群”即指团体、群体、群众，推而广之，指国家民族。群育就是倡导内部要团结互助，不要“窝里斗”，反对“勇于私斗，怯于公敌”，以求以团体精神对外进行竞争。张学良从小即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他把群体利益看成国家的基础，把民心民意看作社会的决定因素。对于东北易帜，他认为是“以东北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的顺民意之举。正因为张学良有这种朴素的群体观，所以他不止一次地教导学生要“将国家看大些”。

当代社会，素质教育成为社会教育发展的主流。但在中国，应试教育、“分数”教育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使得学生的综合素质十分低下。在与欧美国家学生比较

时，我国的学生基础知识仍旧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动手能力不强，创造力低下，这些都是长期以来不重视素质教育的结果。张学良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以自己亲身总结的教育思想告诉人们，不重视综合素质教育，我们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他以“五育”为基础的全面素质教育理念，在今天已被广大教育专家所接受，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中，体现了其存在的价值。而他提倡的群育对于在当今我们如何搞好社会教育，改良社会风气和提高公民的素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重理论轻实践是旧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弊端。张学良将军决心要破除这种通病。他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去工作，去实践。因此，他强调东北大学培养人才要“实用”。他指出：学生非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训练他们能够有作好工作的能力。针对当时一些留学生回国后不继续研究学术，而“奔宦途做官”的倾向，他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现在的中国需要人才，不是指大人物而言，恐怕大人物多了，不但国家不能富强，反倒要乱。”“我说的人才，是指专门人才而言。他学的是工，就要做工，学的是农，就要做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他要求东北大学的学生以快乐的态度，坚韧不拔地努力从事自己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为了培养“实用人才”，在张学良校长倡导下，学校一方面推行一套从严治校的办法，以提高教学质量，打好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遵循“知行合一”的校训，修筑各种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参加实践劳动创造必要的条件。

张学良的教育思想虽然与当代“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有着一定的区别，但他教育思想中的一些“人性

化”内容则是我们每个教育者都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6.2 张学良教育思想与当代社会

6.2.1 张学良教育思想对创办一流大学的启示

(1) 适应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是创办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

张学良具有远大的发展目光，对东北大学非常关注，确定了高规格的基调，着力建设一流大学。在办学结构上，吸收国内外的经验，将东北大学办成国内学科设置最完备的大学之一；在办学条件上，大量拨款建设校舍及教学设施，购置欧美最新教学仪器设备，装备了一所先进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大学；在办学力量上，以充分尊重教师和高薪聘请贤才等做法，吸引了一批学识与声望闻名遐迩的学术大师，师资阵容强大，名家汇集。

一流大学是科学文化水平的标志，必须体现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发达国家都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等。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是从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向高等学校提出的一项历史任务。遵循这一精神，我们应当把数量上的高等教育大国，建设成为质量上的高等教育强国，用科学文化水平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我国一些教育工作者提出要统筹布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思想，是符合一流大学建

设目标要求的。创办一流大学受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约，但创办过程的本身也会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知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学早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被誉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我国创办一流大学不仅是社会性的形象工程，更重要的是使教育既创造知识，也创造财富。如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吸引世界各地学生就读，扩大个人消费领域，同时吸引各方投资办学，增加市场消费重大份额等。为此，我们要突破单位或部门的利益，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创办质量和效益俱佳的现代化一流大学。

(2) 形成学术大师群是创办一流大学的关键

张学良创建的东北大学集中了当时国内外很有影响的大师群，所讲授科目几乎覆盖各门专业课程。例如，文法专业阵容就颇为壮观：章士钊主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形式逻辑》，陈天倪、吴贯因主讲《国文》《中国文学史》，吕思勉主讲《中国历史》，黄侃主讲《文字学》，柳诒徵主讲《中国文化史》，卞鸿儒主讲《地理》，梁漱溟主讲《哲学》，肖公权、罗文干主讲《行政学》《行政法》《国际法》；理工专业也毫不逊色，任教的有梁思成、冯祖荀、范天恭及林徽因、刘仙洲等著名学者。东北大学还聚集了一批知名博士、教授，如刘凤竹、赵鸿翥、杨鹏、王世焘、林损、马宗芎、曾运乾、唐兰、赵修乾、施仁培、武宗林、孙荣华、赵进义、丁燮和、柳国明等^[57]。当时，东北大学能聚集如此众多的大师和知名教授，是其他国内许多著名大学无法相比的。

高等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一流大学必须有众多一流大师任教，“名师出高

徒”这句古语在知识经济时代，仍然有效。大量的知识通过教师传授给学生，教师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根据创办一流大学的目标要求，高等学校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师队伍建设规划，重点是吸引、留住和培养一批学术大师，通过实施特聘教授、骨干教师、访问学者、客座教授等制度，营造方便于学术大师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加大资助力度，建立一整套激励机制和奖励制度，并创造性地把学术大师群的建设落到实处。

(3) 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是创办一流大学的基础

创办一流大学需要巨额投资。如东北大学建校时，辽宁省财政虽然负担较重，但仍然拨给公地，并拨给280万元现洋建筑费，建成后，常经费逐年增加，保障了各项建设目标的实现。在东北大学建设中，张学良屡次无偿为东北大学捐款，共计近200万元现洋。张学良热心教育事业的举动带动不少机关和个人投资兴办教育。由于经费充足，所以学校办学规模大，基础条件好，发展速度快。当时国内荒乱，北京、南京均不安定，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东北地方比较安定，教育经费充足，东北大学教授月薪360银元，大师级的教授月薪更高，如章士钊月薪高达800银元，在校内给独立院落住宅^[58]。这种特殊环境和优厚待遇，吸引了国内一批名家应聘任教。东北大学对学业优异的学生予以重奖，还公费派遣留学生，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向上。

教育投入是基础性投入，创办一流大学的各项目标都离不开经费的保障，经费不足将困扰教育的发展，影响具体方案的实施。创办一流大学的投入是战略性投入，建设教育强国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因此，创办一流

大学的投入表面在教育，实质在振兴国家经济。创办一流大学的经费来源应当采取多项投入的方法。

(4) 先进的办学理念是创建一流大学的核心

张学良之所以能将东北大学办成国内一流大学，缘于他对教育的热忱及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本应为世界强国，而我们自己不振，困难重重，我辈青年均须负起救国爱国的责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东北大学的办学宗旨确定为“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强调教育与社会实际的紧密结合。几经风雨，几度奋斗，东北大学办得卓有成效，改变了东北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教育不是单独发展的事业，而是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²¹ 21 世纪，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占主导地位，我国的综合实力及在国际的竞争力，取决于高等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我们应当创新高等学校的办学理念，重视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相适应，改变以往以知识传授为主的单纯的教学模式，向研究型模式推进，尽快实现多功能的转化。一方面使产、学、研相结合，成为提高办学效益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加大对科教兴国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的力度，用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观念应该成为我们创办一流大学的自觉意识。教育如果与社会脱离，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6.2.2 张学良教育思想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启示

(1) 党中央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教育事业高度重视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正式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任务，这是一项伟大的战略工程。在这个伟大的工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这个问题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一些人认为，应该向国家要求更多的优惠政策，也有人认为，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但也有些人认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教育应该先行，只有教育搞好了，东北地区科技的总体水平才能提高，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才会有更强的竞争力。

中央也注意到了发展教育事业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李长春指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首先要大力发展、建设现代的文化市场，这对于高等学校来说，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这种文化市场的培养主要依靠教育来精心调节。高等学校应当成为构筑东北老工业基地人才高地的基地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源。这也是解决教育经费的一种好途径，同时可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② 东北地区教育事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从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必须首先发展教育，否则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就会出现人才的空缺，人才的空缺就会导致科技的落后，而科技的落后将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最大障碍。但目前东北地区的教育事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① 高等学校科技开发的人力投入与实际收效反差较大。东北三省教育与科研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为 14.5%，其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占全国的 12.6%（在研发人员中，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占全国的 5.22%，3.47% 和 3.86%），但三省“高等学校科技专利”“成果转化合同数”“成果转化当年实际收入”等三项指标占

全国的比例分别只占 9.39%，4.44% 和 3.58%（其中辽宁分别占 4.40%，2.78% 和 2.30%；吉林分别占 2.53%，0.31% 和 0.57%；黑龙江分别占 2.46%，1.35% 和 0.71%），成果所占比重较大幅度地低于人力投入所占比重。

② 人才的结构性失调。由多种因素所致，目前东北三省总体上看，人才流出大于流入，振兴老工业基地急需的人才，尤其是经营和高科技攻关的骨干型人才、高级技能型人才匮乏等矛盾都是很突出的。包括面对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使命，三省人才结构性失调的问题凸显。它既表现在学科结构上，又表现在能力和素质结构上，还表现在区域（布局）结构上等。

③ 教育管理体制的阻隔。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具有明显的国家垄断特征，即高等学校的所有权为国家所有，高等教育活动领导权高度集中，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受计划控制，教育活动无视市场功能，实行政干预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改革不断深入，教育体制的改革也随之展开，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其主要精神和目的是，明确国家、政府、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和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然而，从诸多的法规和文件中，仍然没有回答怎样解决国家垄断高等教育体制问题，以及建立健全完善的高等教育市场问题。由于东北地区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严重，因此，教育领域的这种现象更加严重。

（3）张学良的教育思想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教育事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张学良教育思想明确地告诉人们，国家经济要想真正地发展，必须拥有相应的人才，而人才的出现离不开教育的培养。张学良教育思想对于我们建立适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教育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必须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体系，保证教育的经费。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保证东北地区教育的基本满足。建立起国家、省、市、县、乡一体的投资体系，同时实现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相结合的投资模式。要努力实现三省人才互用的模式，注意人才流动的畅通。通过教育，共享体系建设，使高等教育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科研组织的创新，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努力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加强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构筑东北老工业基地人才高地。

② 改善大学教育质量评估和监督机制，建立新的教育理念。在接受政府经费拨款的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推出新型“质量保障框架”，把对高等教育机构教学质量、科研质量和科研培训质量的评估与监督全部纳入“质量保障框架”中。建立由高等教育机构、“科研理事会”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工作组，进行教学质量评估。其主要职责是对高等学校进行阶段性审计；跟踪和检讨高等学校的教学及科研质量，如研究生完成学位情况、科研经费收入情况和科研成果产出情况等；专家组定期就上述情况向教育管理部门提交报告。如果就某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质量提出质疑性或否定性报告，那么被点名的学校就将失去获得财政支持的资格，并将通过论证程序，最终失去政府的财政支持，鉴于我国情况，还可有保留地采取行政人事上的约束。这一框架及相应

措施,将使高等学校的科研和科研培训体系成为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目标,成为进入世界知识市场的有力工具。

③ 要扩大职业培训和教育。东北老工业基地要为在职职工和下岗失业人员提供职业培训,培训内容要针对企业生产实际进行机械加工、机电设备维修、机电一体化、计算机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餐饮服务、市场营销、美容美发、物业管理等专业的培训。高、中等职业院校要根据本校的教学能力和教育资源情况,制订长期培训规划和年培训计划,向社会和企业公布实行“订单培训”,这些都是为了培养各方面的实用性和高科技人才,以便解决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人才的结构性失调问题。

6.2.3 张学良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家的启示

(1) 教育家应该具有民族气节

20 世纪 20 年代,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应邀赴日参观,亲眼看到日本强大的国力和发展空间,感慨万千。尤其日本人展示的军事实力,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认为,日本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够做到。他们的军事实力强大,是因为他们有高素质的人才,是因为得益于日本良好的现代教育。归国后,张学良向父亲提议,对奉军进行全面整治,整顿军纪,选拔军官,加强训练,并大办教育事业,决心赶超日本。在他看来,个人是国家的单位,国家是个人的集体,所以,每个人对于国家的复兴都有很大的责任。教育事业是为民族所办。这说明他的高度的民族责任感是以深刻的理性认识为坚实基础的。他要求学生要有主人翁精

神,他指出:“中华民国的教育,不像从前为个人而求学,为家庭而求学,现在是为国家而求学。”

(2) 教育家应该懂得投入

以东北大学为例,东北大学得以迅速发展,是在张学良担任校长之后。1928年8月,张学良受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托,担任东北大学校长,聘请刘凤竹为副校长,代理校长日常事务。张学良先后以个人名义三次捐款给东北大学:第一次捐款现洋30万元,修建罗马体育场;第二次捐款100万元,建筑汉卿北楼和南楼(文学院和法学院迁入)以及学生宿舍等;第三次捐款50万元,修建图书馆、纺织实验室、教授俱乐部^[57]。至1929年1月,东北大学下设文、法、理、工、师范5个学院。师范学院增设国文、博物专科班。7月,按照教育计划,创设农科,用以开发农业经济、培养农业技术和管理人才。1930年7月,开办农科农艺系、园林系、垦牧系,农科实际是东北第一所农学院。1929年9月,设立体育部和体育专修科。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有文、法、理、工、农、商6个学院,共23个系,是国内学科最完备的大学之一。而且从张学良创办教育的过程来看,教育事业利国、利民、利己,加大投入是创办教育事业必须的。张学良的教育思想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应该引起当代教育家的思考。

(3) 教育家应该具有超前意识

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可以看出,当时东北大学不仅是最大的省立大学、北方地区著名大学,而且是国内的一流大学。这所大学的建立改变了东北文化教育落后的局面,为地方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对辽宁的经济

建设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辽宁的教育与科技等现代化领域已居全国领先地位；三四十年代，辽宁的农业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这些都与张学良超前的教育思想分不开。当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每个教育家都应该具有敏感的赶超意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否则，所创办学校就会被淘汰。

总之，张学良在他的一生中，十分重视教育。他很早就认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希望在于教育年轻人，提出了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这是对教育地位深刻、正确的认识。执政东北后，他抱定和平统一、教育救国的宗旨，把“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培养实用人才，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念，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兴办高等教育、创办中小学基础教育、重视军事教育、支持社会教育等，从而在东北地区形成了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和社会再教育体系。至九一八事变前，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东北地区的教育已初具现代教育规模，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东北沦陷后，流亡关内的张学良仍不忘办教育，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继续办学校，因为他意识到“世界各国的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为根本计”。他的教育思想及其办学经验，在今天仍会给人们以有益的借鉴和新的启示。

附 录

A 张学良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论述 (摘编)

- 中国唯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1卷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4.)

• 查京师为吾国首善之区，亦文化中心之地，教育系乎国本，而尤以中小学为青年入德之基，比年政变无常，财源竭绌，庶政几归停顿，教育亦无法维持，遂使莘莘学子，坐失所业，倦念及此，良用痛心。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1卷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62.)

• 自文教东暨，人渐女学之重，于是学校不足以容，试可而被摈者济济也。去冬余都师保阳，军书之暇，延见乡人，辄以吾省坦之大，而女校无几，相为感喟。余在故京若陆军大学、民国大学，经费中断，余一力资助；今桑梓之地，如何可忘？因定创办女中之议…今学校制度，盖因时而制宜，诸生能循序而深造焉，则可以强国而保种，宁独一人一家之计而已。

(《同泽女子中学一览》弁言 (节录)，《沈阳文史资料》第2辑，第140—141页。)

- 切望我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

兄弟力谋平民生活，勿染受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1卷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76.)

• 我今天所欲与诸位说的，首先是提倡体育。说起来中国的体育界，大多数不肯注意体育，所以学生多失于软弱。我很希望本校关于体育方面要特别注意，然后用健全之身体好求精妙的学问。所以体育是不可忽视的。

学问方面更是重要，好的要特别奋勉，劣的要极力改善。现在我们中国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中国，诸位同胞都得努力奋救他的危险。况且人才方面又是特别需要呢。

方才我说现在中国需要人才，不是指大人物而言，恐怕大人物多了，不但国家不能富强，反倒要乱。所以现在中国，不论哪省，大人物要多，必然大乱，则人民将不幸矣。我说的人才，是指专门人才而言。他学的是工，就要做工，学的是农，就要做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然而现在中国的学生，如果试问他们毕业后的事业，他们都说要为国作大事业，那么岂不是就要争端了吗？所以专门人才要作专门事业。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1卷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120-121.)

• 吾人从事社会事业，应尽之义务无穷，而互相之希望亦无已。今后希望于诸君者，约有六端：

① 勿自满。满招损，谦受益——至理名言，无庸喋

喋。盖存自满之心，作骄必败，诸君勉之。

② 学与德俱进，勿懈怠。世间无处无学问，诸君勿以为毕业后而学足矣，因之懈怠。仍希望勉之。

③ 打破恶劣环境，努力奋斗。青年人心里纯洁，一入社会，往往改变常态。希望诸君出校改造社会，勿被社会改造。

④ 做事有恒。青年人遇事务，始则极其热烈，终则意冷心灰。希望诸君要永久保持适宜温度，成则不喜，败则勿馁。

⑤ 本良心做事，为社会服务。

⑥ 为东大争光荣，具百仇 阡] 不挠之精神。诸君为东大天字第一号之先锋，希望好好打开出路，领导后起同学，为东大创一块有荣誉之招牌。

最后并希望诸君勿忘母校，精神勿涣散，感情永存在，双方互相期望，努力救国。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1卷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196-197.)

• 诸位在今日陆军之最高学府，全国军人中，以诸位为最高幸福，得安心向学，养精蓄锐，备将来为国家效劳。希望诸位在此时应排除一切，求真实学问，并认清将来应走之道路。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1卷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201.)

• 国家之强否，系于吾人之一念，吾人欲其强斯强矣。现在本人最感困难者，所用之人，固多自爱之士，而大多数人，往往在学校时极有自负，而一旦进入社会，辄为利欲所诱，同流合污，此实极不好之现象。此

后所应注意者，一在积极谋建设；一在养育有毅力、有见地、有宏大的志愿及洁身自好之人才。中国非无人才，然一般均重小我而轻大我，眼光过浅，仅知注意目前小利，而缺乏远大思想。其实，为公众利益即所以为个人利益。故予诸同学努力学问、道德之修养，矢志救国，以将来中国之希望为个人一己之责任，无论负何责任，均当竭尽其力，忠于职务，勿见异而思迁，勿因位小而疏忽。更以此念推及于全国四万万同胞，则国家自易臻于强盛。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1卷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393.）

· 我国立身社会及为政治活动之人，论心迹皆欲纳国家于建设之途，然建设第一需要人才，中国现已统一，由军事时期入于建设时期。言建设则工业建设为首要。工业建设人才尤为需要。我国人才虽有，然全才则甚难得。所以工学院，在中国实为急需。近来在社会上做事情的人，钻研者多，能尽忠职务、完成个人使命之人少……诸君在学生时代第一要修养人格，第二要专心求学，此不但为国家应该如此，即为个人亦必须保持人格。盖仅有学问不过短时期可以维持，有人格方能期诸久远。如果有学问无人格，终要受淘汰。所以，诸位有互相劝慰的责任。本人大有所感，因为中国在今日与外人比，当然是落后国家，其最大原因，即在教育落后。而教育所以落后之故，实因青年不能求得相当安心求学之地……希望诸位应勉力求学，养成人格，作一良善国民。如果人人如此，不怕不能赶上先进国家。所以诸位不必怕无地位可找，只怕自身学业人格不能找得地位；因为只要品学好，无论处何境界，是不愁得不到位置

的。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396.)

• 我们都是东三省人，我们都是东北大学的组成单位，所以我们应该共同爱护东北大学，保护东北大学的校誉，要维持好的校风，同时要铲除不良的习惯，因为一个大学的名誉好坏，很有关系，假如坏了的时候，甚至好的教授，好的学生，都不肯来，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我这样的苦心焦思，来办东北大学，并非是要讨得你们对我有什么好话，有什么酬答。诸位要明了，我对学校的捐款，是出于至诚的，绝不含有投资的性质，一切的事，只求对得住大家，对得住你们家庭父兄的付托，对得住社会，对得住国家就是了。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445.)

• 我国民族性质，以往多为自己谋出路，而不为国家谋幸福，只知谋自己之利益，不为民众谋利益，故无良好结果。殊不知牺牲自己为国为民造福利，其结果亦即为自己造幸福。国家地位愈高，则个人地位亦愈高，国家无地位，则个人亦无地位……所以无论个人地位如何高大，均无足用，必须要有强国，国强自己方有地位。希望诸同志抱定牺牲自己为国为民的决心，谋国家之富强，其人数固不需多，即今日到会诸同志，果使齐心合力已足成功。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454.)

· 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之计，其教者之善诱，学者之攻苦，孜孜不倦，远非我所能及，我国文化落后，国势阽危，愿求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诸生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今日学生，为将来国家之主人翁，从此立定志向，振奋精神，努力作人，努力向学，艰苦卓绝，恪守规纪，必须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实学问，方不负养士初衷，才可负救国重任。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2卷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672.)

· 方今我国文化落后，危机四伏，非才无以救国，非学无以成才，往者诸兄，和衷共勉，甚慰寸心。此后尤望对于校务，努力整顿，严格管理，设系宜切合需要，不必求多。招生须程度相当，不可滥取。注重实际，增益效能，庶几在校得一真才，在国即多一救亡分子。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2卷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673.)

· 目前推行人格教育的问题，已引起一般从事教育事业者之严重注意……在今天，办教育的人是必须首先来培养青年纯正的人格，鼓舞青年向上的精神，那只有以身作则的从自己作起，才好作青年的模范人物。倘自身尚不能敦品励行，又将何以教人？其每因一己的不道德，不正当，不严肃，而予多数青年以不良影响，那真不知要造出多少罪孽！会使得青年们生活堕落，误入歧途，为社会的蠢虫，且为国家之累。以今日中国，还能受得住这样的教育吗？反之，如果能因你痛下“十年树

人”的苦心与工夫，而替国家造就出来几个人才，他们会对人类社会多所贡献，他们会作了复兴民族的战士，那不就是良好教育之所赐吗？这里有两路：切望诸位能走向救青年救国家的路径，万不要葬送青年，摧毁国家，那就要健全了自己，去推行人格教育。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775-776.）

• 过去的教育路线确是不无错误，只是造就出一些只能消费的分子，造就出来许多助长内乱、剥削民众的官僚买办，形成了今日国家的危困，真未始不是几十年来教育失误的结果！今后的中国社会需要生产人才，需要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人才，切盼负教育之责者能努力质重于量的生产教育之发展！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779.）

• 每一个中国人应当这样的深信着：处于如此危难境地的我们，今后诚无时无地不在牺牲中，必须经过大量的无数的牺牲之后，才容或能重返我们的故乡，取得我整个民族的复兴，所以我们对于以前养尊处优的自私自利的生活，应该虔诚的从内心表示忏悔。假设我们今日能痛下救国家救民族的最大决心，那坚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诚意，来承担一切苦痛。当着我们下大决心之初，也就是当着承担这一切痛苦之始，我们必须绝对减缩我们自身的生活享受，在艰苦中训练我们自己，充实我们自己；对于我们所作的事业则唯有埋头苦干，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其结果容或因为我们忍受了一切苦痛，而是适足解除整个民族的无尽头的苦痛。

因此，这与其说是从困苦中去奋斗，更莫如说这是我们
从死路中开辟一条生路！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701.）

• 我们深知运动的最大目的是在倡导体育，而不是
只在个人或少数人出风头。倡导体育的最大目的是在造成
复兴民族的生力，而不是在奖励体育上畸形的发展。在过
去一般倡导体育的人士，是多半注意到青年学生的体育训
练，而一般青年学生也多半是在学校里对于体育的兴趣特
别浓厚，离开学校之后，每和运动绝缘，忽视了自身的健
康，这种现象是必须力加纠正的。我们应确认国民体系必
谋绝对普遍的发展，而在每一个国民的人生过程中，都须
永远注重体育的讲求，那才能造成一个健康而有生气的
民族。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825.）

• 国家衰弱到今日地步，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语云：“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要努力复兴民族，整顿国家，
必须由小处一点一点做起，必要用许多时间与力量。人人
应抱正但求耕耘，不问收获之决心，去努力苦干，实干，
而后可以有效。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838-839.）

• 我们的公民教育和实施公民训练，必须要注意到两点，
第一，要注意我们国际的地位；第二，要注意我们社会的
情况。我们必须按照我们国际的地位和社会的情况来进行，
因为我们国家地位和社会的情况之不同，

所以总理就创造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来适合我们的国际地位和社会情况。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不能独立，民权不平等，民生不充裕，实施公民教育，就是叫我们来做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充裕。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887.）

• 任何可以牺牲，国家利益不能牺牲……我们东北大学学生，有他特殊的使命——回故乡。所以我们造就学生出来，非但要有专门学识，还要训练他们比专门学识更深的基本工作。将来复兴民族使命，要使举国都企望在东北大学学生身上，学生要没有这种勇气，不必在东北大学……诸位想想，复兴民族之责任，固是在全国人民的身上，但东北青年所负责任，比较重大，若不自己勉励自己，去苦干，去创造，将来指望什么？所以我盼望诸位，由感慨变作兴奋，国家光荣，在我们身上，国家失败，是我们未作好，如果大家能抱定这种心理去，我想我们的失地，总有一天是我们的。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953.）

• 教育为民族存亡所系。中国今日社会问题，最严重者，莫过于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此严重关头，整个社会当集中力量以推进教育，教育行政组织，应纯粹以教育事业的迅速推行及效力的普及为中心思想。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1015.）

• 我父亲死后留下很多遗产，留下很多钱，我把这

些钱差不多都捐出来了。建设东北大学是我自己拿的钱，还有教育经费，都是我私人拿的钱。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那时我的脑子里想：一个国家要强，主要靠造就人才。教育为基本。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2卷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1153-1154.)

B 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聘任的部分主任教授以上的著名学者

(1) 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童隽、蔡方荫教授等

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中国著名建筑大师。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7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192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1928年9月回国，应聘到东北大学任主任教授，在东北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任系主任。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7年参加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1950年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有《清式营造则例》《宋营造法式》《中国建筑史》等。

林徽因（1904—1955），女，福建省福州人。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192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美术系。1928年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28年9月至1931年9月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

的设计工作。

童隽 (1900—1983)，1925 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8 年获硕士学位。1930 年回国，应聘到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授，讲授图案等课程。1944 年曾任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工学院、南京大学教授。他曾参加上海金城大戏院、南京下关电厂、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等建筑的设计工作。主要著作有《江南园林志》《新建筑与流派》《造园史纲》等。

蔡方荫 (1901—1963)，江西省南昌人。土木建筑结构专家。1925 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建筑系学习，获学士、硕士学位。1928 年在美国纽约建筑公司任设计工程师。回国后，应聘到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授。主要讲授阴影学、建筑工程理论等课程。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1949 年后，历任重工业部顾问工程师、建设工业部建筑科学研究所副院长兼总工程师。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建筑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专著有《普通结构学》《变截面刚构分析》《装配式楔形铰接刚架》等。

(2) 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教授

刘仙洲 (1890—1975)，河北省完县人。著名机械工程学家和教育家。1914 年入香港大学工学院学习机械专业，获工科学士和“头等荣誉”毕业证书。1924 年任北洋大学校长。1928 年至 1931 年应聘到东北大学任机械系教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3) 化学家、化学教育家——庄长恭、余泽兰、纪

育沅教授等

庄长恭 (1894—1962)，福建省福州人。中国著名化学家。1924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科博士学位，并担任该校化学院研究员。1925 年至 1931 年应聘到东北大学任理科兼工科化学系主任、教授。长期从事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工作。1948 年 4 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余泽兰 (1893—1956)，福建省古田人。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1918 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2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农艺化学博士学位。1926 年至 1931 年在东北大学理科化学系任教授。后到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任主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北省立医学院、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要论著有《护生素》《酸根分析新系统》等。

纪育沅 (1899—1982)，浙江省宁波人。中国著名有机化学家。美国耶鲁大学博士。1928 年至 1931 年任东北大学理学院有机化学教授。历任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和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研究所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药学系主任，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等职。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4) 数学家——冯祖荀

冯祖荀 (1880—1940)，浙江省杭县人。中国现代数学教育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02 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学期间，被选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留学，攻读数学，获理学学士学位。从 1912 年 10 月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任数学系主

任、教授等职。1926 年，应聘到东北大学任数学系主任、教授。

(5) 农学家——李先闻、刘崇乐教授

李先闻（1902—1976），四川省江津人。中国著名农学家。192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8 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回国后，1931 年任东北大学教授。离开东北大学后，历任河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到台湾以后，历任台湾糖业公司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在水稻、甘蔗的育种改良方面，有很深的研究。

刘崇乐（1901—1969），福建省福州人。中国著名昆虫学家。1924 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教授。1929 年应聘到东北大学生物学系任主任、教授。1935 年创办清华大学昆虫研究所。1949 年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昆虫系主任等职。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6) 物理学家——钱临照、何育杰教授

钱临照（1906—1999），江苏省无锡人。中国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家。1929 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30 年到东北大学理学院物理系任教授，主讲理论物理等课程。1934 年到 1937 年留学英国。他首先发现体心立方单晶体中射线星芒现象是滑移面的转动规律。他研究《墨经》中的物理学，为我国科学史方面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他撰写了《晶体中位错理论的基础》等多部著作。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何育杰（1882—1939），浙江省宁波人。中国早期物理学家、教育家。1907 年获英国孟哲斯德大学物理硕

士学位。1909 年回国后，历任京师大学堂格致科教习，北京大学理工学院物理系主任、教授，主讲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7) 著名大律师、国学大师章士钊、黄侃、梁漱溟教授等

章士钊（1881—1973），湖南省长沙人。中国著名大律师。曾先后赴日本、英国、美国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主编《民立报》。1916 年，任讨袁军军务秘书长。次年在北京主编《甲寅》日刊。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广东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1930 年 5 月，任第一届东北大学委员会委员和文学学院院长、教授，讲授“逻辑”“墨子”。九一八事变后，到上海当律师。1949 年国共和谈中国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成员，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黄侃（1886—1935），湖北省黄冈人。世称国学大师、著名音韵训诂学家。1905 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08 年回国，参与创办《大江报》。1928 年被聘为东北大学教授，讲授词章、训诂、经史，他所著的《训诂学讲词》创立了中国新训诂的理论体系。同时，他在经学、新赋、哲学、文学、史学诸方面，也都有很高的造诣。

梁漱溟（1893—1988），广西省桂林人。1911 年毕业于北京顺天高等学堂。1917 年 10 月就任北京大学教习。在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乡治”主张，开始从事乡村建设运动。1928 年应聘到东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任教授。1931 年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院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员、国民参

政会参政员。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任秘书长。1946 年作为民盟代表，参与国共和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和北京大学教授等职。

(8) 体育方面的专家有宋君复、郝更生教授等

宋君复 (1897—1977)，浙江省绍兴人。1916 年入美国柯培大学学物理，毕业后，进美国麻省春田学院专攻体育。1922 年回国。1928 年到东北大学教育学院体育专修科任教授。1932 年，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教练，与刘长春一起参加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1936 年被批准为国际篮球裁判。著有《体育原理》《刘长春短跑》《女子篮球训练法》等。

郝更生 (1899—1975)，江苏省淮安人。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历任中华大学、东吴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体育教授、系主任等职。1929 年被东北大学聘为体育专修科主任、教授。国民党政权时期，曾任体育督学，掌管全国体育行政。先后主办过第三、五、六届全国运动会。

此外，尚有教育学院留美心理学家陈雪屏教授、国学家马宗芎教授、统计学家孙宗钰教授，等等。

○ 《汉卿捐助奉省中小学教育基金董事会章程》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汉卿捐助奉省中小学教育基金董事会。

第二条 本会设立之要旨如下：

甲、接收张汉卿先生承先打元帅之遗嘱，将遗产现

洋五百万元捐充教育补助费，此款永远作教育补助费之基金，不移作他项用途。

乙、保管该款存储于东三省官银总号生息。

丙、支配该款所生利息补助奉省公立中小学教员俸给及其他足以促进教学效率之事业。

丁、接收其他用于教育事业之款项、财产等，其保管及支配方法均由本会酌量规定之。

戊、考查本会所补助教员或事业之成绩。

第三条 本会设董事 15 人，均为名誉职。第一次董事由捐款人张汉卿先生及其推请之人任之，其后每遇缺出由董事会推聘。

董事任期，捐助人为永久董事，其他十四人于本会开会时抽签定之，内四人任三年，五人任四年，五人任五年，以后董事均五年一任。

第四条 本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执行委员一人，由董事互选之。

第五条 本会一切事务由执行委员会商承董事会主持之，并得视事务之繁简酌聘职员若干人助理会务。

第六条 本会视事务之需要对临时聘用专员，实地考察、编作报告，备支付补助费之参考。

第七条 本会会所设于奉天省城西华门外省教育会。

第八条 董事会常年于六月、十二月各开会一次，日期由会中临时酌定。遇有特殊事项随时召集会议。

第九条 本会会务设小学部、中学部及体育部，其细则另定之。

第十条 款项之分配及发给办法另定之。

第十一条 本章程得于董事会议，经董事三分之二

提议修正之。

D 张学良创办的三所著名中学

(1) 奉天同泽中学

创办于 1925 年夏，张学良与郭松龄先以城东东山嘴子军营内作为临时校舍，由张学良个人解囊出资现洋 60 万元，作为学校永久资金，存入裕民银行生息。聘请郭松龄的秘书齐士英为校长，筹备一切办学事宜。齐士英系铁岭县人，早年留学德国，热心于教育。当年 7 月开始招生，招考初中学生二级，8 月 5 日开学上课。同泽中学在招生时做了一番宣传，向省城及各县教育公所致函，检送招生广告、招生简章和报名单。发给各县教育公所的函文如下：“逕启者：查敝校组织成立，业经呈请教育厅批准在案，慈拟于本年暑假期间招考初中学生二级。惟创设伊始，信用未著，真相莫明，用特检同广告三纸，招生简章三份、报名单三页，函请贵所查照，务希揭示周知，并转行各校分发各级，使学生等届期来省投考。实纫公谊。此致 × 县教育公所 私立同泽中学校启 七月十五日。”

1925 年 7 月，张学良与郭松龄曾联名呈请奉天省代理省长王永江，将北陵东北大学校址西邻之 120 亩陵地拨作校舍基地，建筑教室、宿舍以及体育场、校园等。不料，当年 11 月 23 日，郭松龄率部倒戈反奉，同泽中学校长齐士英、教务长阚驻臣等，因为与郭松龄有交往，自动离职他去，学校停课，提前放寒假。1926 年 3 月，张学良重新呈请执照建筑校舍，后将校址改在小河沿，7 月落成，8 月续招新生。1928 年张学良又拨巨款

扩建教室、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礼堂、科学馆等。

(2) 同泽女子中学

1927年10月，张学良继创办奉天同泽中学后，又创办了同泽女子中学。学校校址起初设在大西门内肾阳县胡同之公余俱乐部、军署稽查处及军务处仓库管理部三处房舍。1928年3月正式开学，考取学生80人，分为初中、补习两个班。聘王捷先为校长。王捷先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爱国家，重教育，他宁肯放弃海外的优越待遇，受张学良的委托来管理学校。王捷先校长上任后，锐意治理学校，成绩卓著。经几个月的修整，学校初具规模，1928年7月8日，学校召开成立庆祝会，同时展览学生几个月来的课业成绩，表演体育节目。同泽女子中学的学制，实际上由补习班一年为基础，初中等于四年。学校的组织机构中，董事会为最高机关，聘任校长统辖全校事宜。在校长领导下，设教务课、训育课和总务课三门课。图书室有监护人一名，卫生室有护士一名。学校的经费开支由张学良供给。创办伊始，每月支领现洋2050元，作为经常费用，领取办法与同泽男中一样，均由三四方面军团部军需处领取。1928年暑假后，因班级增多，教员增加，每月经常费增到现洋2928元。后因军团部撤销，该校经费改由司令长官署处支领，遇有特别开支，则须呈请张学良批准后，再至军需处领取。

(3) 海城同泽中学

这是张学良在其原籍海城创办的学校。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出面召集省城任职的海城籍热心教育的人士，说明拟在海城建立中学的宗旨，与会者热烈响

应。会议决定以“同泽”为名，在海城兴办一所完全中学，旨在培养桑梓子弟励精图治，振兴中国，同仇敌忾，共报国恨家仇。会议推张学良为董事长，成立董事会。由校董事会推荐孙恩元为校长，筹备建校事宜。张学良出资现洋 40 万元，作为开办经费。同年 10 月成立学校筹建委员会，由 9 人组成，皆为县城的知名人士、巨商、士绅。海城县各界闻知张学良在家乡开办中学，群情振奋，都愿鼎力相助。根据董事会的意见，要求学校设在县城环境幽静、交通便利的地方，经过协商，定在海城东南部玉皇山东南园子为校址，购地 230 余亩，于 1929 年 4 月开工。1929 年 7 月，校舍虽然未全部建成，便开始招生考试。1931 年春，四幢大楼及附属建筑全部竣工，校舍四周绿化初步完成。同年夏又招收高、初中学生各两班，实现了原计划，共有 12 个班级，学生 400 人，教职员 30 余人。海城同泽中学的学生恪守张学良制定的“诚朴勤劳”的校训。生活极为俭朴，勤工俭学，刻苦读书，全面发展。

E 张学良亲自担任校长的两所大学

(1)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始建于 1923 年 4 月 26 日。创建的具体承办人是王永江。1923 年 7 月东北大学开始招考新生，分别收取文、法、工预科各三个班，共计 310 人。1928 年 8 月，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兼任校长后，确定了“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的办学宗旨，主张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1929 年在张学良决策和资助下，东北大学的发展

规模空前，设文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教育学6个学院；张学良还捐款修建了文学院和法学院教学楼、体育场、图书馆以及化学馆和一批实验室。东北大学是一所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大学。1931年正当东北大学兴旺发达时期，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沈阳。东北大学师生被迫流亡到关内。先后迁徙北平、开封、西安、四川三台等地。在此期间，广大师生积极参加爱国抗日运动，在一二·九运动中，起到了先锋和骨干作用。1946年11月，流亡了15年的东北大学回到沈阳。1949年2月，在东北大学工学院、理学院（部分）的基础上，成立了沈阳工学院。1950年8月，定名为东北工学院。1993年3月8日，东北工学院复名为东北大学。

② 东北交通大学

1927年春，北京交通部鉴于东北各省交通人才缺乏，遂在锦县创办交通大学，并定名为唐山大学锦县分校。派郑林皋为校长，于9月19日举行大学成立及开学典礼。当时预科、补习各一班，共计学生90余人。1928年暑假添招预科、补习各一班，加上原有学生，共四个班，计160余人。1929年，学校奉令，改归东北政务委员会直辖，添设副校长1人，并由该会推张学良兼领校长，汪兆璠为副校长，改称东北交通大学。当时，原拟兼办工科，后变更计划，先办交通管理科。将各班有志学习工科学生80余名拨送东北大学及其他大学肄业。1930年2月，汪兆璠他就，改聘于世秀为副校长。1931年4月，建筑大礼堂、图书馆，行将落成，九一八爆发，未克完全竣工，并于是年改运输、商业两门为运务系、商务系，并新增财务系共三个系。

参 考 文 献

- [1]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2.
- [2] 林阔. 张学良全传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9.
- [3] 唐德刚,王书君. 张学良世纪传奇 (口述实录) [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 [4] 毕万闻. 英雄本色 :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34.
- [5] 宁恩承. 百年回首 [M].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
- [6] 张永滨. 张学良传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254.
- [7] 王云鹏. 张学良轶事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0.
- [8] 解放日报 (西安),1937-01-05.
- [9] 张副司令讲演集 :第 3 辑,第 80 页 第 1 辑,第 21 页.
- [10] 张德. 心理学 [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363-364.
- [11] 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 :第 2 卷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2.
- [12] 东北大学校刊 :总第 98 期,1934.
- [13] 武汉日报,1934-05-17.
- [14]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概览. 沈阳 辽宁省档案馆,1929 :8.
- [15]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工厂概要. 沈阳 辽宁省档案馆,1930.
- [16] 刘恩铭,薛景平,韩索林. 张学良将军生活纪事 [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27.
- [17] 王永存. 张学良人格面面观 [M].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234.

-
- [18] 辽宁省档案馆.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 第8册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 [19] 孙景悦, 董慧云, 张秀春. 张学良与辽宁教育 [M]. 香港: 香港同泽出版社, 1993: 326.
- [20] 丁晓春, 魏向前. 张学良与东北大学 [M].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3: 36.
- [21] 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辽宁文史资料: 第7集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3: 124.
- [22] 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 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 [M]. 香港: 华文出版社, 1993.
- [23] 周逸. 张学良文集: 上卷 [M]. 香港: 香港同泽出版社, 1996.
- [24] 周逸. 张学良文集: 下卷 [M]. 香港: 香港同泽出版社, 1996.
- [25] 王道俊, 王汉澜. 教育学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59.
- [26] 张学良. 对独立第四十旅、骑六师第十一旅、绥署特务团的讲话. 军事周报 [N]. 1935 (7).
- [27] 史万兵. 论张学良的教育经济思想及实践 [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6): 436.
- [28] 齐红深. 东北地方教育史 [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186.
- [29] 刘兆伟, 马立武, 王凤玉. 东北高等教育史 [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0: 106.
- [30] 马毅松.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结构 [J]. 思想教育研究, 2002 (2).
- [31] 张学良. 和平统一为切要之途 [N]. 大公报 (天津), 1931-05-22.

- [32] 魏向前,丁晓春.对张学良教育思想的探讨[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38.
- [33] 王海晨,胡玉海.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上[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 [34] 董慧云,张秀春.张学良与东北新建设资料选[M].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3.
- [35] 武汉日报,1934-05-17.
- [36] 东北大学校刊 第9卷,第8期.
- [37] 盛京日报,1928-09-18.
- [38] 沈阳日报,1993-04-03(2).
- [39] 谷建春.教育主体论刍议[J].求索,2001(3):81.
- [40] 王庆生.东北大学大事论[J].辽宁文史资料,1991,(33):78.
- [41] 刘信君.中国东北史 第6卷[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280.
- [42] 陈贇.关于教育现代化的研究[J].当代教育论坛,2005(5):11.
- [43] 朱寅年.中国教育离现代化还有多远?[OL].www.ybvod.com/news-show.asp,2005.
- [4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27.
- [45] 查尔斯·赫梅尔.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45.
- [46] 刘尧.中国教育不公平现象[OL].www.edu.cn/20020510/3025877.2005.
- [47] 沈阳文史资料 第2辑,140-141.
- [48] 张友坤,钱进主.张学良年谱: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453.

-
- [49] 武育文,维远,杨玉芝.张学良将军传略 [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313.
- [50] 相从智.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17.
- [51] 张魁堂.张学良传 [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4.
- [52] 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索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9-13.
- [53] 王啸.教育即自由 [J]. 上海教育科研,1999 (8):45.
- [54] 孙传宏,孙元涛.教育:难解的乌托邦情结 [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 (4):78.
- [55] 崔新建.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J]. 人民教育,2004 (4):12.
- [56] 王岚.张学良现代教育观 [J].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0 (2):77.
- [57] 王虹.科教兴省与创办一流大学:张学良兴办东北大学的历史启示 [J]. 辽宁教育研究,2001 (9):15.
- [58] 张学良.九一八前学校忆顾 [M]. 南京:民国出版社,1943:34.

后 记

《张学良教育思想研究》一书是东北大学文法学院“985工程”创新基地“科技与历史”子课题（东北地方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由东北大学张学良研究中心邱秀华策划研究和组织撰写，2004年开始进行资料整理工作；2005年2月草拟本书的编写提纲，在此基础上，召开了第一次该提纲的讨论会，并确定了参与本书的编写成员和阶段性任务及其基本要求；2005年9月18日张学良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本书的编写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两年多来，在学校和学院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在同行和部分研究生的积极参与下，在东北大学校史志编研室和校友总会、校董会的鼎力相助下，经过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现在，这本书就要出版了，我们谨代表参与本书编写的同仁，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首先，感谢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著名学者彭定安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了编写大纲和书稿，并作了序一；感谢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著名张学良研究专家胡玉海教授欣然为本书作了序二。其次，感谢东北大学校史志编研室的同志们，特别感谢王国钧教授在百忙之中对本书有关史实逐章逐节地认真核实，并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点拨。最后，感

谢东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的古小丹、樊丽明、李正鸿、于桂荣、金钟哲等同志以及研究生韩书杰、刘锋、庞春阳、高唤男、王莹喆等在搜集资料、初拟书稿编写大纲以及在撰写部分初稿时提供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其中，于桂荣和刘锋在查找有关张学良的人格教育和群育资料以及初稿写作时，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在本书校对时，王莹喆、屈顺利、林青、李莉莉、王雪松等在引文出处核实方面，做了认真的校对。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和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我们对这些文献资料的作者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由邱秀华提出总体框架设计，章毛平对全书结构的合理构建提出了独到见解。各章执笔人员分别是：前言，章毛平、邱秀华；第1章，章毛平、邱秀华、尤丽；第2，3章，邱秀华、石文斌；第4章，章毛平、张中波；第5章，邱秀华、章毛平、罗冰；第6章，邱秀华、孟凡胜、李军星；附录，邱秀华、章毛平。最后由邱秀华、章毛平对全书文字进行了修改、定稿。

本书篇幅不大，只有十几万字，前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其中有的章节反复修改过多次。尽管如此，这部书可能还存在不少缺点、缺憾和不足，诚请各位专家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作 者

2006年8月18日